

甘肃史志



2015.3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机关党委与双联扶贫村 党组织开展结对共建活动



按照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关于开展省直机关基层党组织和双联扶贫村党组织结对共建活动精神，9月23日上午，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机关党委邀请双联扶贫村甘谷县大庄镇杨家坡村和付家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先进党员代表和致富带头人代表来我办进行座谈交流。

会议学习了党章部分内容，三个基层组织相互介绍和交流了党建工作情况，省委农工办张选民处长对双联行动、精准扶贫等方面进行了政策宣讲和辅导。

办党组书记、主任李虎最后讲话，充分肯定了此次活动的重要意义。他强调：一是要加强我办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结对共建活动，进一步加强机关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双联村党支部和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不断增强服务群众、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和工作水平。三是要全力做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两个村的帮扶工作队要密切配合村党支部，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任务，抓紧抓好。我们要共同努力，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双联行动及精准扶贫等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车安宁、李振宇、孙奇明，副巡视员李拾良和办公室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了座谈会。

下午，办机关党委负责人及相关人员陪同两个村的代表赴全省双联先进村—武山县马力镇北顺村学习考察双联行动及精准扶贫工作。

努力开创地方志工作新局面

钱旭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为《规划纲要》)发布以后,全省地方志系统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的热潮。《规划纲要》的发布,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地方志事业的重视,是对广大修志工作者的一个巨大鼓舞。《规划纲要》是国家对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绘制了宏伟蓝图,是推进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纲领性文件,为地方志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标志着地方志事业进入全面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全省各级政府和地方志工作部门要以《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为契机,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努力开创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一要提高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李克强总理批示要“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刘延东副提出要切实做到“一纳入、八到位”。这些指示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创造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我们要倍加珍惜,进一步提高对地方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工作使命感和紧迫感,把贯彻落实《规划纲要》与深刻领会、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全省地方志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二要科学规划。《规划纲要》明确了地方志工作在国家发展改革大局中的目标任务,提出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基本形成地方志编修体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工作保障体系“五位一体”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全省各级政府和地方志工作部门要充分调研,认真谋划,制定出台切合实际、操作性强的本地本部门的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具体的落实措施,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推进各项工作。

三要加强领导。各级政府和地方志部门要发挥《规划纲要》的航标导向作用,建立健全做好地方志工作的各项保障机制。地方志工作要坚持和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坚持“一纳入、八到位”的工作机制,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各级政府工作任务,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要落实与地方志机构相适应的人员编制,配齐配强地方志机构领导班子。要依法将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改善地方志工作条件和图书资料收藏保管条件,以做好修志编鉴、出版、开发利用、信息化建设、资料文献保存等工作。

四要提升能力。要完成《规划纲要》中提出的目标任务,必须重视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要完善培训制度,分级实施对地方志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志鉴主编(总纂)的专项培训,实现修志编鉴人员岗前培训全覆盖,要建立修志人才专家库,面向全省地方志系统及高校、科研单位征选从事方志学科理论研究和修志实践人才的人才,建设一支专兼职结合的高素质的地方志编研队伍。

五要开发利用。《规划纲要》将坚持修志为用,提高全社会读志用志水平作为地方志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为此,要不断加强对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拓宽服务渠道,增强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手段,更好地贴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贴近人民群众需要。要充分发挥地方志资源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重要作用,利用各类媒体广泛宣传地方志成果,推动方志文化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推动城乡方志文化建设,培养地方历史记忆。



甘 肃 史 志

季 刊

2015 年第 3 期
(总第 23 期)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 号

卷首语

努力开创地方志工作新局面钱 旭(1)

特载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2015—2020 年)的通知(4)

盛世修志 助力中国梦王伟光(8)

为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而努力
.....李培林(11)

工作论坛

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方向毛珏琚(13)

泽被传统精蕴 纂述时代新章朱克雄 毛存显(18)

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不断取得史志工作新成绩

——全国方志系统先进集体正宁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侧记
.....(24)

志鉴编研

论分志志稿的审查验收倪 平(26)

《庆阳市志》编纂过程中基本内容的归属范畴及层次辨析
.....张芹鹤(29)

《阶州直隶州续志》编撰特点及其价值陈郑云(33)

史地考证

“仇池”地名初考袁智慧(37)

录

- 镇原境内的宋代御夏古城何等强 王博文(39)
- 仙姑和仙姑寺牛学伟(44)
- 解读罗川张芹鹤(48)

乡土民情

- 江西古戏台的乡土社会杨沂柳(51)
- 西北地区端午汉人门口插柳条考辨潘硕珍(54)
- 《红楼梦》里的丧葬习俗潘硕珍(55)
- 西汉水上游婚姻形式析述彭战获(57)

历史回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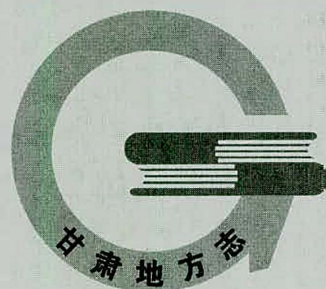
-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一位县长安·贯布什嘉贺红梅(66)
- 轰动陇东边区的盗钱案赵田广(73)
- 拯救独臂红军战士刘嘉伟银开源(76)

志苑随笔

- 假如没有中国的抗日战争车安宁(77)

简讯

- 省志办组织书画家赴甘谷县大庄乡杨家坡村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
.....(79)
- 康乐县“三个一”全面填补地方志工作“三空白”(79)
- 首部《榆中年鉴》(2012—2014)出版发行(80)
- 《康乐县志(1986—2005)》评议会召开(80)



《甘肃史志》编委会

- 主 任:李 虎
- 副 主 任:车安宁 钱 旭
李振宇 孙奇明
- 编 委 委 员:张正龙 李拾良
贺红梅 石为怀
- 主 办 单 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肃史志》编辑部

- 主 编:李 虎
- 副 主 编:钱 旭
- 编辑部主任:贺红梅
- 责 任 编 辑:梁兴明 陈 谦
孔令奇 石战涛
司德芳 高天成
王 旭
- 本 期 责 编:孔令奇
- 联 系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
南路 51 号统办一号楼九楼
- 邮 编:730000
- 电 话:0931-8960622
- 电 子 邮 箱:gsdfz911@163.com
- 印 刷:甘肃省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 电 话:0931-896038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通知

国办发〔2015〕6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2015年8月25日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

为推进全国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充分发挥地方志工作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结合当前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划纲要。

一、发展基础与机遇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历史悠久,连绵不断。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经过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不懈努力,地方志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以修志编鉴为主业、各项工作协调开展的事业格局,拓展了方志文化的内涵,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了独特作用。

(一)工作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基本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逐步形成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各级政府工作任务,“认识、领导、机构、编制、经费、设施、规划、工作”到位(以下统称“一纳入、八到位”)的工作机制。

(二)法治建设取得新进展。2006年国务院公布施行《地方志工作条例》,各地相继制定和完善地方性法规规章,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责任,加强地方志工作机构履行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的职责,确保地方志工作依法开展。

(三)编修成果不断丰富。目前,首轮修志结束,第二轮修志进入关键时期,已出版7000多部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2万多部行业志、部门志、军事志、武警志、专题志、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等,1900多种、1.5万多部地方综合年鉴,1000多种、7000多部专业年鉴,大量地情文献。这些与现存的8000多种、10万多卷旧志及其整理成果,共同构成了一座以国情地情为主要内容并

不断丰富地方志资源宝库。

(四)理论研究逐渐深化。紧密结合修志编鉴实践,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已出版各种志鉴理论著作 1000 多部,发表论文 6 万多篇,取得显著成果,有力地指导了地方志工作开展,推动了方志学、年鉴学学科建设。

(五)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推进。全国已建成国家方志馆 1 个、省级馆 15 个、市级馆 60 多个、县级馆近 200 个,省级网站 26 个、市级网站近 200 个、县级网站 470 多个,方志工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迈上新台阶。

(六)存史育人资政作用日益彰显。通过修志编鉴、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地方志编修已发展成为为国存史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记录当代、保存历史、传承文明、发展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推动海内外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等方面,成绩日益突出、作用日益显著。

目前,全国地方志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和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但也存在着制约事业发展的问題,主要是:事业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少数地区和部门对地方志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够;相关法规规章落实不到位;机构不健全,编制、人员和经费不足;志书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人才队伍青黄不接,人员素质亟待提升;信息化与方志馆建设比较滞后;方志文化的作用有待彰显等。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科学发展和深化改革,采取有效措施,认真予以解决。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按照“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党和国家对地方志工作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全国地方志事业迎来重要发展机遇。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地方志工作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明确在发展改革大局中的目标任务,科学规划,积极创新,有序推进地方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进取,改革创新,依法全面推动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繁荣。

(二)基本原则。

1. 坚持正确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通过编修和开发利用地方志成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

2. 坚持依法治志。国家地方志工作机构依法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国地方志工作;省、市、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依法履行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职责,加强编纂业务工作。

3. 坚持全面发展。以修志编鉴为主业,统筹兼顾理论研究、开发利用、信息化建设、方志馆建设、旧志整理等工作,实现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4. 坚持改革创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修志的优良传统,认真总结地方志工作的经验教训,深化改革,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方法创新。

5. 坚持质量第一。坚持存真求实,确保地方志质量。正确处理质量与进度的关系,将精品意识贯穿于地方志编纂出版工作全过程,严把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文字关、出版关,编纂出版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地方志成果。

6. 坚持修志为用。发挥地方志资源优势,全面提升开发利用水平;拓宽用志领域,提升服务大局能力,为党政机关、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服务;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读志用志水平。

三、总体目标与主要任务

(一)总体目标。到 2020 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加快信息化和方志馆建设,做好第三轮修志工作准备,加强对社会修志的指导和管理,基本形成地方志编修体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工作保障体系“五位一体”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努力开创地

方志事业发展新局面。

(二)主要任务。

1. 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到2020年,完成第二轮地方志书规划任务,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全部出版。在抓紧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的同时,全面总结第一轮、第二轮修志工作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第三轮修志的组织管理、运作模式、续修方式等,为启动第三轮修志做好资料收(征)集、队伍培训及理论准备等工作。

2. 大力推进地方综合年鉴工作。到2020年,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

3. 重视军事、武警及其他类专业志鉴、民族地区地方志、乡镇村志和地方史编纂工作。加强对已开展和准备开展志鉴编纂工作的行业、部门、单位等的业务指导和管理。支持民族地区做好地方志编纂工作。指导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做好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组织编纂工作。具备条件的,可将地方史编写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统一规范管理。

4. 深入开展旧志整理工作。编制全国旧志整理规划,编辑旧志联合目录。具备条件的地方应编辑出版历代方志集成,分类整理旧志资料。加强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公共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的交流与合作,开展旧志点校、提要、考录、辑佚等工作。

5. 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制定方志、年鉴理论和方志学、年鉴学学科建设规划,建立和完善方志、年鉴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力争到2020年形成较为成熟的方志学和年鉴学学科体系。充分发挥方志期刊和各级地方志学会的作用,活跃学术研讨,推动理论建设。加强与相关学科交流合作,开展地方志编纂、地方志事业发展等重要理论问题研究,编写方志学、年鉴学通用教材及各分支学科研究论著。总结历代一统志编纂经验,开展编修一统志的可行性研究。

6.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重视人才选拔、培养

和使用,加强专兼职结合、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和引进一批高端人才,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地方志编修、研究队伍,弘扬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方志人精神。

7. 深化地方志质量建设。严格执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有关要求,制定质量管理、质量监督等规定,完善地方志质量评议、审查验收制度,严把质量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设立志书、年鉴及优秀学术成果评比奖励项目,逐步将志书、年鉴纳入国家及地方有关图书奖评比。

8. 强化地方志资料建设。加大依法收(征)集地方志资料力度,建立和完善地方志资料收(征)集、保存、管理制度,推行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并形成常态机制;运用社会调查、口述史等方法,大力拓展资料收(征)集范围和渠道,建立能够全方位适应地方志编纂、地方志事业发展和方志文化建设需要的地方志资料保障机制。

9. 加快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分级建设、资源共享、安全保密的原则,制定全国地方志事业信息化发展意见,充分利用已有信息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加快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步伐,支持民族地区地方志信息化建设。逐步建立地方志全文数据库。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不同载体的地方文献收(征)集、保护和开发利用,推动信息标准化工作。实现国家、省、市、县四级地方志资源共享,面向社会提供优质服务。

10. 提高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加强对地方志资源的深加工,拓宽服务渠道,增强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手段,更好地贴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贴近人民群众需要。做好《中国地情报告》、《中国方志发展报告》、《中国年鉴发展报告》编纂工作。发挥地方志资源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重要作用,利用各类媒体广泛宣传地方志成果,推动方志文化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推动城乡方志文化建设,培育地方历史记忆。

11. 扩大学术交流与合作。采用多种形式,加强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国外的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档案机构与图书馆等单位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服务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推介一批高质量地方志成果,充分展示地方志的当代价值及永恒魅力,推动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增强方志文化影响力。

四、保障措施

(一)法治保障。推动《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贯彻落实,逐步建立健全地方性法规规章。加大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的宣传、执行力度,定期开展执法检查,依法纠正、查处执行不力和违法行为。

(二)制度保障。健全地方志工作机构主导、社会各界有序参与修志编鉴的途径和方式。加强督促检查,健全和完善目标考核责任制、督查通报制,强化责任落实;健全和完善地情资料收(征)集及管理、修志编鉴业务制度和主编(总纂)责任制,确保在篇目设计、资料收(征)集、总纂统稿、志(鉴)稿评议、审查验收、出版发行、报送备案等环节上均有章可循、有序推进,保障志鉴质量。

(三)经费保障。改善地方志工作条件和图书资料收藏保管条件,做好修志、编鉴、出版、科研、开发利用、信息化建设、资料文献保存等工作,加大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地方志工作的支持力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将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四)队伍保障。建立国家级、省级地方志专家库。探索地方志人才培养、引进等政策和措施,探索将方志学人才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方式方法。完善教育培训制度,分级实施对地方志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志鉴主编(总纂)的专项培训,实现修志编鉴人员岗前培训全覆盖、培训工作常态化;

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联合开展地方志专业方向研究生教育,举办专业进修班,支持地方志工作人员接受专业继续教育。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建立干事创业的激励机制,营造良好氛围。

(五)宣传保障。利用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地方志工作机构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新举措、地方志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绩、地方志工作者投身现代化建设的新贡献。挖掘地方志资源的现实价值、历史价值,设计宣传主题,创新宣传形式,推出一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地方志宣传精品。

五、加强组织领导

地方志工作要坚持和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坚持“一纳入、八到位”的工作机制。地方志工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要与其有效履行职能、顺利开展工作的要求相适应;按照德才兼备原则和专业要求,配齐配强地方志工作机构的领导班子。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根据本规划纲要要求,制定本地区本部门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或实施方案,切实加强分类指导,加大组织推动力度,全面提高地方志工作水平,确保全国地方志事业平稳、有序、健康发展。

军事志事业发展规划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志指导小组制定。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对本规划纲要落实和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盛世修志 助力中国梦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 王伟光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历史悠久,连绵不断。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地方志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施行后,地方志工作走上了依法治志的轨道,在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年多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地方志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李克强总理提出“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对地方志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精神,推进全国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充分发挥地方志工作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实施“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中作出更大贡献,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这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价值意义、基本内涵和传承弘扬的原则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重要论断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脉络清晰,为新形势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地方志工作者必须把握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要求,坚持改革创新,使地方志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相融相通。

地方志是最深厚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撑,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地方志自成一脉,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魅力,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是最具有民族特征的标志性传统文化形式之一。地方志所记载的内容纵贯古今,横陈百科,有助于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中国地方志讲的就是中国故事,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魅力的有力话语体系,不仅有助于认清中华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了解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观念、鲜明特色,更有助于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配合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推介一批高质量地方志成果,充分展示地方志的当代价值及永恒魅力,推动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凝聚力、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可以说准确呼应了时代要求,提出了全国地方志系统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把中国地方志推介出去的目标,主动把地方志工作融入国家战略,力求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重要作用。

地方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之

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地方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宝贵的思想源泉和最直接的精神纽带。一部地方志就是记载一方水土之上的人和事，就是一方人的精神家园。地方志通过记载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家乡面貌的变化、模范人物事迹等，再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光辉业绩和精神风貌，以真实资料和生动事实，激发人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证明，地方志在教化人心、巩固信仰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推动力量。《规划纲要》强调通过编修、开发利用地方志成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突出了地方志的育人功能，通过发掘历史智慧，在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育文明风尚、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发扬光大，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二、地方志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智慧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只有“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国梦的首要前提是“国家富强”“国家好”，只有国家治理好了、建设好了，国家才会富强，民族才会振兴，人民才会幸福。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地方志不仅反映了我国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社会实际情况，还记载了各个地区的气候、地貌、山川、城镇、矿产、动植物等分布情况，成为我国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记载的重要资料宝库、文化宝库、知识宝库，记载了前人和当代人的实践活动和智慧经验。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老师，可以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可以启迪

后人。他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他还说：“历史记述了前人积累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记述了他们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想与智慧，记述了他们经历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2006年，习近平同志在温州市苍南县考察台风“桑美”灾后重建工作时，调阅了《苍南县志》，并在与当地领导座谈时大段朗读了书中关于台风的记载，告诫地方干部要以史为戒，认清台风活动以及影响浙江的规律，科学决策，不断提高防台风抗台风和处置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还专门要求报送《上海通志》，以备查阅。地方志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智慧经验，各级领导干部是带领我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也是治理国家的核心力量，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善于利用地方志中所记载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善于从前人留下的思想宝库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珍贵滋养，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和科学执政的水平。《规划纲要》有助于推进地方志事业的全面发展，更好地发挥地方志的功能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治国理政水平，为推动“四个全面”重大战略部署的实施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三、全面落实《规划纲要》对推进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

地方志工作要在“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发挥更大作用，发展再上新台阶，关键是落实《规划纲要》对推进地方志事业发展所作的顶层设计。

要增强对落实《规划纲要》自觉性和主动性的认识。《规划纲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刘延东副总理提出的“一纳入、八到位”（即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工作任务，认识、领导、机构、编制、经费、设施、规划、工作到位的工作机制）为依据，立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有计

划、有步骤地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进行了部署,这种顶层设计具有不可替代性。“一纳入、八到位”是从地方志事业发展现实需要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地方志事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提出来的,是对解决好地方志工作中具有普遍性、关键性的高度概括。《规划纲要》出台,是贯彻落实“一纳入、八到位”要求,在地方志工作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地方志工作法治化的具体行动,也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必然要求。是否按《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办,直接影响着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水平,也是衡量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是否重视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标准。

要充分发挥《规划纲要》的指标导向作用。地方各级政府应按照“一纳入、八到位”总要求,认真落实规划纲要的部署,制定相应的地方志发展规划,依法治志,保障地方志工作的基本条件。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应围绕“为谁修志、修什么志、怎样修志”这一根本问题,坚持正确方向、履职尽责、真抓实干,以修志编鉴为核心,统筹兼顾地方志各项工作,把既定的科学目

标、好的工作蓝图变为现实,努力实现地方志事业全面可持续发展。社会各界人士应提高对地方志重要性的认识,多了解地方志工作,多支持地方志事业发展,积极参与地方志开发利用工作,以地方志为基础创造更多的优秀文化成果,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要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强调了创新在发展中的重要性。《规划纲要》提出了地方志工作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同时也提出要拓宽用志领域,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能力,为党政机关、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服务。全国地方志系统应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树立勇于创新、不断创新的精气神,努力做到思想上不断有新突破,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工作上不断有新举措。在完成好修志编鉴主要任务的同时,要积极拓展地方志工作领域,不断拓展地方志工作内涵。如通过编修乡镇村志、发掘乡土文化资源,履行好地方志承载乡愁、延续历史文脉的重要使命。

(接 17 页)

设,进行地情信息法制环境建设,才能使数字方志馆建设迈上新台阶。

结语

自上世纪 90 年代地方志系统开始信息化建设以来,全国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只有抓住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地方志网站和数字方志馆建设工作,努力建设统一、科学、开放、高效地方志网站和数字方志馆,地方志信息化就会事半功倍。

参考文献:

1. 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发挥省情数据库优势推动山东地方志工作网络化建设[J]. 中国地方志, 2001(6).
2. 刘刚. 建设“数字方志”传承华夏文明[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3(3).
3. William Y. Arms 着, 施伯乐、张亮等译: 5 数字图书馆概论 6,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0 年版。

(作者单位: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为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地方志事业发展 综合体系而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李培林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这是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第一部规划性文件,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对于确保地方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规划纲要》是国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文化领域的一项重大举措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历史悠久,连绵不断。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取得了丰硕成果。2006年,国务院颁布施行《地方志工作条例》,地方志工作走上了依法治志的道路,逐步形成了以修志编鉴为主业,理论研究、开发利用、信息化建设、方志馆建设、旧志整理等工作协调开展的事业格局,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还存在着诸如事业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少数地区和部门对地方志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够、相关法规规章落实到位、机构不健全以及编制、人员和经费不足等一些制约事业发展的问題。如何进一步加强统筹安排、协调推进各项工作,日渐成为全国地方志工作面临的十分紧迫的重要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部署,对地方志工作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在发展改革新形势下,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的重要讲话精神,李克强总理关于“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重要批示精神,为国存史,在记录当代、保存历史、传承文明、发展文化以及为经济社会发

展与治国理政提供历史借鉴、智力支持等方面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成为全国地方志工作面临的重要的时代课题。

《规划纲要》出台,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国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文化领域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带领全国地方志工作者紧抓时代机遇作出的响亮回答。《规划纲要》明确了地方志工作在国家发展改革大局中的目标、任务,有助于有计划、有重点地推动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有助于充分发挥地方志工作存史、育人、资政的重要作用,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作出更大贡献。

《规划纲要》描绘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

《规划纲要》以落实“一纳入、八到位”为突出主线,描绘了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一纳入、八到位”,即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工作任务,认识、领导、机构、编制、经费、设施、规划、工作到位,是刘延东副总理在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会议代表座谈时明确提出来的。这既是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精神的具体要求,又是对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各项规定的总体凝练和具体深化。准确把握落实“一纳入、八到位”这条主线,就能理清思路,明确目标,稳步推进,完成《规划纲要》规定的各项工作任务。

《规划纲要》共分为发展基础与机遇、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与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等五个部分。《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

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加快信息化和方志馆建设;做好第三轮修志工作准备;加强对社会修志的指导和管理工作;基本形成地方志编修体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工作保障体系“五位一体”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努力开创地方志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围绕总体目标,《规划纲要》从推动解决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出发,提出了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大力推进地方综合年鉴工作等11项主要任务和法治、制度、经费、队伍、宣传五方面保障措施。

《规划纲要》是对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目标明确,措施有力,是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地方志工作的行动纲领。

《规划纲要》在创新引领发展思维下体现出的特点亮点

《规划纲要》强化了以修志编鉴为主业、统筹兼顾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理念。一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质量第一,把努力编修出更多地方志成果放在突出位置;另一方面,提出要到2020年基本形成“五位一体”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通过协调安排工作任务,把“五位”有机联系为“一体”,实现统筹兼顾、全面发展。

《规划纲要》明确了修志编鉴主业的核心目标任务。一是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完成第二轮地方志书规划任务,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全部出版”。在时间节点上,这既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相契合,也与《地方志工作条例》关于“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的规定相符合,具有落实依法修志、整体协调推进全国修志进度的意义。二是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实现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这进一步细化了《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规定,为落实依法编鉴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理顺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管理体制、扩大覆盖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规划纲要》适当拓展了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工作范围。《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了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责,其中不包括对各类专业志鉴编纂、社会修志和地方史编写的指导和管理工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各类专业志鉴编纂、乡镇村志编纂日渐普遍,地方史编写活动也日益增多,如何加强指导和管理工作成为一大难题。面对社会各界对有关修志编鉴活动加强业务指导和管理的强烈需求,《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对已开展和准备开展志鉴编纂工作的行业、部门、单位等的业务指导和管理工作”“指导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对适当调整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工作范围进行了确认。同时,《规划纲要》还与中宣部办公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近期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史编写出版工作的通知》作了对接,将该通知中“具备条件的,可将地方史编写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统一规范管理”的条款写入《规划纲要》中。

《规划纲要》就做好第三轮修志工作准备作出了部署。全国首轮修志是在理论和实践准备均显不足的情况下上马的,是边摸索边工作,有很多经验教训。第二轮修志虽有首轮修志的经验为基础,但编纂工作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仍较为突出,加上受机构改革调整、人才断档等因素影响,有不少缺憾。有鉴于此,《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在抓紧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的同时,全面总结第一轮、第二轮修志工作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第三轮修志的组织管理、运作模式、续修方式等,为启动第三轮修志做好资料收(征)集、队伍培训及理论准备等工作”。与此相应,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强调要做好经验总结和前期准备,对在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后实现全国整体启动第三轮修志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规划纲要》确立了要走依法治志的道路。《规划纲要》将地方志编纂、管理、开发利用等工作均纳入“依法”开展的范畴,用“依法治志”的概念替代了“依法修志”的概念,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志的有机结合,不断加强法治建设,依法开展地方志工作。

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方向

毛珏瑒

摘要：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对于充分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推动地方志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内容包括地方志网站建设、数字方志馆建设和办公自动化建设，重点是地方志网站和数字方志馆建设。虽然全国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一些成就，但仍存在许多不规范不科学的地方，究其原因是对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缺乏明晰的认识，而建设统一、科学、开放、高效的地方志网站和数字方志馆，正是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发展的方向。

关键字：地方志 信息化 网站 方志馆

编修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优秀传统文化，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地方志的作用在于“存史、资政、育人”，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志工作主要指编修地方志书。志书是地方志的主要物质载体，地方志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对地方志书的内容的开发利用。毋庸讳言，由于地方志书大多动则上百万字，内容冗长，携带不便。加之语言过于讲究客观真实，显得平淡寡味，难以卒读，地方志编修出来后往往束之高阁，乏人问津，地方志开发利用的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而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地方志事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一、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意义

2006年5月，国务院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县级以上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应当积极开展社会用志途径”“修志为用是《条例》精神的最高体现”。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刘延东先后对地方志工作讲了话，做了批示，他们把地方志工作的作用、意义提到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

心的高度，“修志问道，以启未来”是对地方志工作作用和意义的高度概括。地方志工作重要作用的发挥，除了不断提高志书质量，编修出精品佳志外，更重要的是不断开拓社会用志的途径，让更多的人认识地方志、了解地方志，进而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地方志资料。随着网络技术、数码存储与传输技术等电子信息技术的全面普及与发展，使得人们对志书信息的存储、查询、利用等方面有了更新、更高要求，只有加强地方志工作的信息化建设，才能更有效、更快捷地读志用志，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地方志还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之一，持续不断的编修地方志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地方特色文化、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方式。但是，地方志文化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致命缺陷，如编修时间过长、时效性差、影响范围有限等。这与传统地方志的纸质载体形式和地方志编纂方法有关。克服这些缺陷的有效途径是大力开展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在志书收集资料、编纂、出版发行、开发利用的各个环节都充分利用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等信息化技术手段，提高工作效率，扩大地方志工作的影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指出“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2011年在山东济南举行的全国地方志系统信息化建设经验交流会上，中指组办公室副主任刘玉宏指出：“现在是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地方志系统深入开展信息化建设，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大力发展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尤其是地方志网站和数字方志馆建设，是传统地方工作向现代转型的发展方向。加强以地方志网站和数字方志馆建

设为首的地方志信息化工作,不仅丰富了地方志工作的内容,转变了地方志工作的形式方法,更大大增加了地方志工作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不仅能在信息时代能够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而且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实现大国崛起中贡献不可替代的传统文化力量。

二、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特点

21世纪是信息化的社会,信息化是不可避免的时代潮流。古老的地方志工作可以借助信息化的力量焕发新的活力。信息化的概念起源于60年代的日本。进入70年代,西方社会开始普遍接受“信息社会”和“信息化”的概念。我国的信息化工作虽然起步稍晚,但很快就运用到各行各业的工作当中。在1997年召开的首届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对信息化概念下了定义:“信息化是指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根据这个定义,笔者认为,地方志信息化是指利用现代通信、网络、数据库等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地方志、年鉴编修、开发和利用工作。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具体内容指地方志网站建设、数字方志馆建设(包括数据库建设和移动数字平台建设)和办公自动化建设三大部分。建立统一、规范、资源共享、移动高效的全国地方志网站群和数字方志馆系统应是当前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方向。

相比传统地方志工作主要以纸、笔为媒介,以书本、报刊杂志为载体记录、传播、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滞后性与局限性,地方志信息化后,具有数字性、开放性、移动性、高效性的特点,可以克服时空障碍,实现地方志信息在全世界范围内快速存储、整合、交流,不仅为方志人进行地方志编纂和开发利用工作提供新的平台,也能为读者提供实时、便捷的服务。

数字性:指地方志各种文献载体被数字化,包括各种旧志、古籍、志书、年鉴、地图、缩微资源、视听资料等,变成计算机可以识别的电磁信号,以资料库的形式存储于数字方志馆中。可以建成志书、年鉴全文本数据库、影像库、专题数据库、书目库、

相关文献库五种数字方志库,将文字、声音、图像等信息进行统一存储处理和输出。这些数字信息比传统纸质印刷品所占的存储空间小很多,还具有检索方便、快捷,传播迅速的优点。

开放性:利用单位的区域网络以及国际互联网,读者可在世界各地的互联网查阅任何一个开放的地方志网站和数字方志馆的信息。

移动性:能利用微博、微信等软件或移动数字平台向手机、MP3/MP4、PDA等移动终端发布面向特定读者的个性地情信息,如当地天气、当地旅游景点介绍、历史上的今天等,以盘活地方志资源,提高地方志利用效率。

高效性:实现地方志信息化,可以通过网络通讯系统进行信息传递,速度快,效率高,信息可及时交流与反馈,有利于地情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三、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现状与应对措施

当今世界不断受到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革命的冲击,古老的地方志工作只有顺势而为,借助新兴科技的力量走“科技兴志”之路。《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应当积极开拓社会用志途径,可以通过建设数据库、网站等方式,加强地方志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利用上述数据库、网站查阅、摘抄地方志。”《条例》顺应历史潮流、适应时代需要提出加强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历史要求,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从《条例》规定中可以看出,地方志网站和数据库建设是信息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笔者认为,网站建设更是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因为网站是各种地情数据库的集中展示平台,也是实现用户与地方志机构高效互动的主要媒介。

(一)地方志网站建设现状及应对

全国信息化工作开展以来,地方志网站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据中国社科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在《发扬成绩 谋划长远 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介绍:截至

2014年4月,全国已建成国家级地方志网站1个、省级网站26个(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市级网站近200个、县级网站470多个。山东、广东等省已建设省、市、县三级地情网络群,实现全省联网、资源共享。由于地方志信息化工作还在起步实践阶段,专业人才缺乏,全国地方志网站还普遍存在着各地发展不平衡、不规范、不系统的现象,难以实现全国联网、资源共享,因此一个科学实用的网站应该做到名称规范化、功能变量名称科学化、栏目简洁化、内容特色化、发展移动化。

1. 名称规范化

网络存在的方式,决定网络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即使是地方志专业网站,因其面向的对象是全球互联网世界,拥有标准规范化的名称既便于网络搜索又利于体现网站的专业性。全国26家地方志网站名称多不统一。如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采用“中国地方志”作为网站名称;其他省级网站有安徽地方志、辽宁省地方志、江苏省地方志、浙江省地方志、四川省地方志、天津市地方志网、湖南省地方志网等;称**方志网的有天津市地方志网、湖北方志网等;称**地情网的有北京地情资料网、新疆地情网、广西地情网、陕西地情网、山东省情网、河南省情网、广东省情网、内蒙古区情网等。还有以机构名称直接做为网站名称的,如山西地方志办公室、香港地方志基金会、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上海方志办(上海通)。其他地方特色名称的如江西的中国赣网、黑龙江的中国龙志网。

这些名目繁多的网站名称,也许对于当地人来说耳熟能详,可以轻松做为登陆地方志网站的线索。对于全世界互联网用户来说,很难确定这些名称所属网站性质,不利于网站推广,如中国龙志网、中国赣网等;机构名称是专属名词,如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地方志办公室等,也不适合作为网站名称。地方志是号称“地方百科全书”,作为各地地方志专业网站,应该突出的是地方性及方志专业性,因此名称上以省级名称加上地方志为最佳,如:江苏省地方志、浙江省地方志、四川省地方志等,清晰明了,非常便于查找和推广。

2. 域名科学化

域名是上网单位和个人在互联网上的唯一标识,起着识别作用,便于他人识别和检索某一企业、组织或个人的信息资源,从而更好地实现网络上的资源共享,其划分有严格的界限。除了识别功能外,在虚拟环境下,功能变量名称还可以起到引导、宣传、代表等作用。通俗的说,功能变量名称就相当于一个家庭的门牌号码,别人通过这个号码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你。

目前地方志网站功能变量名称没有统一规范,单纯从功能变量名称很难看出地方志网站性质。如有4家省级网站采用国际商业顶级功能变量名称,分别是新疆(www.xjtonglan.com)、甘肃(www.gsdfszw.com)、广西(www.gxdqw.com)、山西(www.sxdfz.com);采用国内顶级功能变量名称4家,分别是中国地方志(www.difangzhi.cn)、陕西(www.sxsdq.cn)、山东(www.sdsqw.cn)、浙江(www.zjdfz.cn);采用国内商业功能变量名称2家,分别是河南(www.hnsqw.com.cn)、湖北(www.hbdfz.com.cn);采用国内非盈利组织功能变量名称5家,分别是海南(www.hnszw.org.cn)、江西(www.zgganwang.org.cn)、四川(www.scdfz.org.cn)、天津(www.tjdfz.org.cn)及香港(www.hklr.org.hk);国内政府二级功能变量名称1家,为湖南(www.hndfz.hunan.gov.cn)。

地方志被称为“官书”,有一般著作所没有的权威性。地方志网站作为由地方志工作机构主办的政府官方网站,应该在功能变量名称使用上体现统一性和官方性,最好采用国内政府一级功能变量名称。如北京(www.bjdfz.gov.cn)、上海(www.shtong.gov.cn)、内蒙古(www.nmqq.gov.cn)、江苏(www.jssdfz.gov.cn)、吉林(dfz.jl.gov.cn)、辽宁(www.lnsdfz.gov.cn)、黑龙江(www.zglz.gov.cn)、贵州(www.gzdaxx.gov.cn)、安徽(www.ahdfz.gov.cn)、广东(www.gd-info.gov.cn)、福建(www.fjsq.gov.cn)11省市的11家地方志网站,均采用国内政府一级功能变量名称。使全世界用户点开网站便能对网站的性质、功能、可信度有大概的判断。

3. 栏目简洁化

地方志是“一方百科全书”，含有丰富的地情资料信息。在设计地方志网站栏目时，有些地方在网站主页排列了过多、过细的一级栏目，看起来内容丰富，实际令人眼花缭乱，难以查找所需信息。如山东省情网，有“新闻中心、公告、山东史志人、俯瞰齐鲁、影像山东、数字山东、方志新成果、图说山东、政策法规、志鉴论坛、史志博物馆、省情数据库、学术专著、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文化村镇、文化遗产、齐鲁民俗、齐鲁文化、走进齐鲁、区域研究、图片成果展”共22个一级栏目，有些栏目可以合并，如“俯瞰齐鲁、影像山东、图说山东”等；有些属于典型政务类网站栏目，如“新闻中心”；真实、准确、快速播报时政新闻是地方志网站短板，此类栏目可以改成“方志信息”“方志工作”之类，以扬长避短，突出地方志专业特色。

地方志网站作为专业性网站，其内容重点在于充分展现地方文化和地情信息，以实现地方志的价值功能。它不具备也不需要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全覆盖网站，笔者认为地方网站应以方志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大力建设数字方志馆内各种地方志数据库以“存史”，集中全面展示省情地情以“资政”，突出宣传地方优秀人物、地方特色文化以教化“教化”，在网站主页以少而精的一级栏目提纲挈领，涵盖地方志丰富的内容。如江苏省地方志网站：

在首页仅用“江苏概况、地情文化、方志之窗、江苏省方志馆、数字媒体”五个一级栏目就概括了一般地方志网站所有的地情信息、地方志工作、数字方志馆（数据库）三大模块的内容，细分的二级栏目隐藏在一级栏目之下，页面简洁大方。增加“互动交流”一级栏目，充分发挥了网站相较传统媒体的开放性、平等性、互动性优势。并在首页用三分之二的页面图文并茂的滚动展示江苏地方志发展历史，极具视觉冲击力和专业特色。

4. 内容特色化

地方志网站体现地方志专业特色，是由网站的专业性质的决定的。体现在网站内容上大多数地方志网站都有方志理论研究、方志工作、省市县三级志书、年鉴内容。地方志网站同时还是展现地

方历史文化，助力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最权威最全面的窗口，是否具有地方特色，是地方志网站生命力的所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志网站都有极力展示、宣传地方文化的意识，几乎每个省级地方志网站都有省情概览、魅力*省、市县概况之类的栏目。建议在突出地方特色可以更加细化，为某一地方特色专设栏目介绍，如福建多台胞台属，网站专设“闽台缘”栏目；山东自古人文鼎盛，网站开设了“学术专著、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文化村镇、文化遗产、齐鲁民俗、齐鲁文化、走进齐鲁、区域研究”等栏目全面介绍历史文化特色；四川特设“巴蜀文化、抗震专题”栏目。使地方志网站专业性与地方特色性相结合，增强网站的吸引力和宣传效果。

5. 发展移动化

移动互联网，就是将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体。是一种通过智能移动终端，采用移动无线通信方式获取业务和服务的新兴业务，包含终端、软件和应用三个层面。移动终端指手机、板计算机、MP3/MP4等手持阅读器。据工信部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至2014年1月，我国手机用户已达12.35亿人，占全国人口的90.8%。其中使用智能手机人数超过5亿，手机保持第一大上网终端地位。我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进入全民时代。PC和手提计算机做为上网终端，有价格高、体积大，笨重携带便的弱点，移动互联网代替传统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工具，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在网站建设、数字方志馆建设方面开发适合在移动终端上显示的页面格式、文本格式、软件系统。同时利用微博、微信等软件及时推送读者关心的地方志信息，以扩大地方志工作的影响力。这方面的工作全国地方志系统刚刚起步，只有广西省在2014年8月开通了“广西地情移动平台”，率先在全国探索地方志工作的移动化、智能化。北京、吉林、浙江金华等少数地方志机构开通了地方志微信、微博。

(二) 数字方志馆建设现状与对策

伴随地方志信息化建设不断向广度深度发

展,数字方志馆的概念应运而生。数字方志馆是将志书资料信息以数字化形式,通过网络信息接受公共查询,使人们很方便地共享地方志书资源。数字方志馆也是面向对象的数字化多媒体数据库,与实体方志馆不同,数字方志馆的存储介质已不仅是印刷体,它存储的载体有光盘、录音带等各种类型的数字化、电子化装置。截至2015年4月,全国已开通地方志网站的26个省级行政区域中,只有北京市建立了独立的“数字方志馆”网络平台;上海地方志系统网站虽然名曰“上海通志馆”,实质还是一个地方志机构门户网站;黑龙江、四川、河南、江苏、浙江五省网站上分别开通“数字方志馆”“方志馆”“网上方志馆”“江苏省方志馆”“数字方志馆”栏目,内容多是介绍本省实体方志馆机构、规模、布展等基本情况,也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数字方志馆”。虽然如此,全国已开通的地方志网站,大都以不同的名称建立了方志数据库,进行了方志数字资源建设(数字志书制作),以不同格式上传了大量旧志、新编志书、年鉴。如山东省,早在1996年,就建设了国内最早的省情数据库(山东省情网),设有88个专题数据库,至2001年已数字化地情资料3亿多字;? 广西省建有地情数据库,下建281个分库,分专题收藏广西三级志书、年鉴、地方志期刊、地方志论著和地情书,并支持全文阅读和检索。

全国图书馆系统由于收藏有大量旧志,并有国内外建设数字图书馆的丰富经验,也建设了一批数字方志资源。如上海图书馆建设的“上海文典库”主要收录地方文献,包括上海年鉴等,共收录1914年至1999年有关上海各行各业发展的年鉴114种,部分内容可在馆内网浏览、打印和下载;国家图书馆在2002年正式启动了数字方志项目,其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包括全文影像库、全文文本库、书目库及各种专题库在内的大型数字方志资源库。”?而且国图采用数字图书馆方式进行组织与整理方志资源,实现全文、书目(含卷目)、地名、人物、作品、景观、插图、事件等单项与复合检索,支持并实现与其他数字图书馆资源库的关联检索和跨库链接。一些高校图书馆也对馆藏旧志进行

了数据化,以方便科学研究。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旧志3000种左右,目前已开发“线装方志书目数据库”;武汉大学图书馆开发的“地方志家谱数据库”收录近千种数据;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上海地方志数据库”收录北宋至清代的方志近300种。这些已建成的地方志数据库为建设统一、开放、高效的数字方志馆准备丰富的地方志数字资源。

数字方志馆与地方志网站虽然都有地情资料信息的内容,但两者有着不同的功能定位。地方志网站以传播地方志信息、指导修志编鉴、组织地方志理论研究、增进文化交流为创建宗旨,是地方志工作机构对外宣传的窗口。建设数字方志馆,不仅仅是把纸质志书从内容到形式原样做成网络版,也不仅仅是改变地方志信息的物质载体,而是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数据库和馆藏数字化系统,采用多样化的展示手段通过网络达到传播地方志知识、弘扬地方文化的目的。与传统方志馆相比,他不受访问时间、空间限制,能为读者实时提供内容查询、书目检索、全文阅读、版本校刊、网上借阅、新书推荐等多样化服务。多媒体、动画式等多种地情展示手法也会吸引方志馆对公众的吸引力。

创建数字方志馆可以分为方志数字资源建设(数字志书制作)、数据存储与压缩(数字志书保存)、数据加工与挖掘(数字志书资源加工)、信息输出与表现(数字图书馆的开放)、用户服务(数字志书的阅览利用)以及版权保护等多个模块。③如前所述,目前地方志系统大多只是做了“方志数字资源建设”“数据存储与压缩”工作,对数字志书资源加工、数字图书馆的开放、用户服务及版权保护方面几乎没有开始工作。即使是在“方志数字资源建设”方面也存在各地数字方志资源格式不统一,有的采用全文本格式,有的采用PDG格式上传志书,使不同省市甚至一省之内的地方志系统都无法做到资源共享,重复劳动现象严重。这些要求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统一规划、建设全国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技术标准,建立全国数字方志馆系统,各地提高对数字方志馆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加强信息化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转10页)

泽被传统精蕴 纂述时代新章

——平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成立三十年周年顾瞻

朱克雄 毛存显

地方志,简称方志。方,地方,方域;志,记也。方志,就是对一个地方一定时期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如实记载、记述。简而言之,地方志者,地方之全史也,亦可称为地方的百科全书。

1985年10月11日,平凉地区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成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自此平凉地方志工作走过了30年的奋斗历程,迈出了三个大步:第一个10年(1985—1995年),是平凉地方志艰难起步阶段,成立了领导和工作机构,调研摸底制订了计划,为开展日常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个10年(1995—2005年),是地方志工作向纵深发展的10年,《平凉地区志》编修工作于1998年开始启动,7县(市)志陆续出版;第三个10年(2005—2015年),是地方志事业获得大发展的10年,《平凉地区志》2012年7月顺利出版,市县(区)级年鉴、部门年鉴齐头并进,系列地情资料丛书不断推出,形成了编修地方志书、编纂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地情资料书刊、传播地情资料信息的新格局,开辟了纸质、影像、网站立体修志审志用志的新局面,方志馆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志鉴书刊编纂出版硕果累累。

30年来,平凉地方志工作者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关怀指导下,在各县(区)、各部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支持协助下,坚持和弘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辛勤笔耕,无私奉献,已将一项地方志编纂工作变成一项既服务当代又惠及子孙的地方史志事业。

——以《平凉地区志》首发为标志的首轮志书编纂出版工作全面完成。2013年1月6日上午,《平凉地区志》首发式暨全市修志工作会议在市委礼堂的隆重召开,标志着全市首轮志书编纂工作已经画上句号,二轮志书编纂工作全面启动。首部《平凉地区志》编纂工作历经十余春秋,五修篇目,六易其稿,终成卷帙。这部卷帙浩繁、资料翔实厚重的新志,记载了从明代赵时春编纂《平凉府志》之后400多年以来,平凉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充分展现了平凉源远流长的历史,独具特色的山川风物,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对于传承民族血脉,固守精神家园,增强平凉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88年10月《灵台县志》内部印行,1993年6月、1996年3月、1996年8月和1997年8月《静宁县志》《泾川县志》《华亭县志》《崇信县志》先后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10月和1998年11月《平凉市志》《庄浪县志》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平凉地区志》获得省社科三等奖,7个县市志均获得平凉地区科技进步一等奖,除《灵台县志》获得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二等奖外,其它均获得一等奖,《静宁县志》还获得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华亭县志》《平凉市志》还分别获得第五届和第六届省社会科学“兴陇奖”三等奖。二轮县(区)志书编纂工作按计划有序进行,《崆峒区志(1986—2008年)》2014年10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崇信县志(1991—2010年)》通过评审,《华亭县志(1988—2009年)》《灵台县志(1986—2011年)》《庄浪县志(1991—2010年)》完成初稿;先后指导部门完成了《水利志》《烟草

志》《交通志》《工商志》《军事志》《崆峒山新志》《土壤志》《畜牧志》《财政志》《教育志》等专业志、行业志,全市志书编纂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以《平凉年鉴》为龙头、县(区)年鉴和行业年鉴为重要组成的格局已经形成。由市志办负责编纂的第一部《平凉年鉴(2003—2011年)》,2014年12月由甘肃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崇信年鉴(2013年)》《庄浪年鉴(2013年)》《平凉市崆峒区年鉴(2012—2013年)》《灵台年鉴(2013年)》《静宁年鉴(2007—2011年)》等均已正式出版。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省政府《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和省政府与市政府鉴定的《地方史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有关规定,市上和7县(区)今年可实现年鉴编辑出版全覆盖。

—以“走进平凉四本书”为代表的平凉历史文化丛书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厚爱。市志办将历史地情资料研究、编写作为扩大对外宣传,促进文化名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先后组织编写了《名人墨珍咏平凉》、平凉历史文化丛书之《平凉文物》《平凉名胜》《平凉人物》《诗咏平凉》和《道释崆峒》等地情资料丛书。《平凉文物》《平凉名胜》《平凉人物》《诗咏平凉》被人们称为“走进平凉四本书”,无独有偶,只要打开平凉门户网站,点击“走进平凉”栏目,映入您眼帘的就是这四本书的图像和电子版。《名人墨珍咏平凉》荣获全省史志优秀成果文史类一等奖。

—以发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旧志搜集整理工作已见成效。先后组织点校出版了明嘉靖《平凉府志》,明万历、清嘉庆《柳湖书院志·崆峒山志》,清乾隆《泾州志》,清顺治《灵台县志》《崇信县志》,清乾隆《庄浪县志略》,清康熙、乾隆《静宁州志》。这些志书和历史文化丛书已经成为研究平凉、推介平凉、了解平凉的重要窗口,成为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以《条例》《规定》颁发为起点的平凉地方志事业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国务院2006年5月颁布施行《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甘肃省人民政府于2009年1月颁发《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标志着地

方志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轨道,实现了从行政推动到依法修志、依法治志的转型。《条例》和《规定》施行以来,各级政府依法履职尽责,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当中,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地方志工作机构依法开展地方志工作,工作领域大大拓宽,由编纂一本志书扩展到多个方面的地方志事业。省政府与市政府鉴定了《地方史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按照《责任书》要求加强对续志工作的督查指导与审查验收,市县(区)地志办除对行政区域志加强指导外,还普遍把专志和乡镇志纳入管理范围,进行督查指导,保证编纂质量,呈现出依法修志、依法治志的良好工作局面。

—以专兼人员相结合的方志队伍得到较快发展。首轮修志开始时,从事地方志工作的人不多,有过修志经验的人更少,多数人是仓促上阵。二轮修志启动以来,首轮修志的许多业务骨干因为年龄原因陆续退出工作岗位,一些年轻同志相继补充进来。参与修志的除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人以外,更多的人来自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高等院校、国有企业等单位。为了提高修志人员的素质,通过参加各种培训,使修志队伍得到发展。如今,市、县(区)两级修志机构拥有100多人的专兼职队伍。他们中间既有管理骨干,也有专家学者;既有模范人物,也有受到人事部门和地方志工作机构联合表彰的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这支队伍不仅是新编地方志工作得以轰轰烈烈开展的重要原因,而且本身也是30年地方志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

平凉地方志30年发展历程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感受和启示,归结起来主要是:

—党委政府的重视关怀是做好地方志工作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后,新编地方志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在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进行的。只有各级党委、政府把修志工作纳入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挂帅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并随时指导工作,及时回应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请示和报告,协调解决人员、办公条件、经费等方面的困难,才能确保正常工作的有序进行。

—部门单位社会各界的支持配合是做好地方志工作的基本保障。新编地方志工作涉及各行各业,包含方方面面,仅靠方志部门单打独斗,难以继,做好地方志工作需要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积极配合,大力支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做好地方志工作的重要宗旨。地方志工作的目的说到底是应用,而应用的主要体现形式就是服务——为党委、政府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后人服务,更要为今人服务。从史志事业资政、存史、教化的三大功能来说,位居第一位的是资政。放在当代来解释就是要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搞服务。“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史志工作领导体制,也决定了史志工作的服务对象首要的就应当是党委、政府本身。

—依法修志,打造精品是地方志工作者的永恒追求。法规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遵从,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和价值所在。只有具有科学性、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名史”、“佳志”,才能流芳百世,为当代人资政,为后人所借鉴。因此,地方志工作者必需依法依规编史修志,把法治思维和质量意识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

—敬畏历史、敬畏先人、敬畏文化是地方志工作者的起码遵从。历史,历久弥新,是宝贵的财富,是可贵的资源,是珍贵的宝藏。地方志工作者必需牢固树立敬畏历史、敬畏先人、敬畏文化的理念,才能传承好历史文化,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时代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途中,为人民、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谱写新的辉煌。

—甘于清贫、甘坐冷板凳并把冷板凳坐热是地方志工作者的良好心态。修志工作是一项连绵不断的事业,需要新陈代谢,薪火相传。从改革开放后的首轮修志到现在,前前后后参与过修志的人中,有的从进入地方志工作机构的门直到离退休,从没有离开过修志岗位,有的甚至倒在修志岗位上;有的来到地方志工作机构时还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而当离开时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有的从加入到地方志工作队伍的那天起就编写志书,直到离开时仍没见到志书出版,但他们依然无怨

无悔,不计名利,萑路蓝缕,黄卷青灯。

三十年风雨历程,三十年励志创业,三十年奋力拼搏,三十年成绩非凡。平凉新方志编纂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今天内容丰富、作用突出的地方志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鉴往知来,任重道远。在全市“加快转型升级、促进科学发展,建设小康和谐文明平凉”的新征程中,作为地方志工作者,必须正视地方志事业所面临的在全球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在全国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全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这一难得机遇,按照李克强总理“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重要批示,立足平凉、放眼全国、把握大局,积极吸收借鉴各地地方志工作的经验做法,善于分析研究新阶段地方志工作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问题、面临的新任务,采取切实可行、积极有效的措施办法,努力推动全市地方志事业实现转型升级。

—在构建地方志事业全新格局上实现转型升级。善于在新的格局下思考、谋划、安排、推进地方志工作,主要是“强化三个认识”:一是强化地方志工作不再是单一或专项工作,而是一业为主、多业并举、全面发展的事业的认识。过去,地方志工作机构承担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编纂志书,后来接管了综合年鉴的编辑出版,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作性质单一,工作领域狭窄,工作格局有限,被称作“一(志书)两、(志书和年鉴)本书”。而现今,在全国范围内,地方志工作已经形成了志书、年鉴、资料库、方志馆、地情网和开发利用“六位一体”的工作格局,加上方志刊物、方志学(协)会、方志理论研究,又被概括为“九位一体”。无论是“六位一体”,还是“九位一体”,这都说明地方志工作格局已经发生转型。面对这一转型,我们必须积极适应、全力顺应,做到与时俱进,尽快实现思想和工作的提升,达到转型升级。要破除地方志全部工作就是编书出书、就是编纂志书和鉴书的陈旧观念,摒弃干其他工作就是不务正业的错误认识,在做大做强志鉴主业的基础上,按照志、鉴、库、馆、网、刊、会、研、用“大方志”格局来布局谋篇、整体推进,在方志的舞台上干出一番事业。二是强化地方志工作

不再是临时性、一次性、阶段性工作,而是需要世世代代、连续不断进行的经常性、持续性工作的认识。一轮志修编工作基本结束后,国家立即启动了二轮志编纂,并明确规定今后20年左右修编一次,还要求在本轮志编修期间适时启动下一轮志的资料长编工作。此外,由于年鉴及库、馆、网、刊、会、研、用等工作的展开,地方志工作内容越来越丰富,工作节奏越来越紧凑,日常性、年度性、阶段性工作有机结合,经常性、持续性特征日益显现。为此,我们必须破除临时思想和短期行为,树立长期作战的思维意识,注重谋划中长期发展,并将其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确保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三是强化地方志不再是可做可不做或做多少算多少的自选动作、软任务,而是必须做、必须做好的规定动作、刚性任务的认识。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正式颁布施行,标志着地方志工作从此进入了依法修志的新阶段。《条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这说明,各级政府有责任设立地方志工作机构,并且要给与该机构相应的级别、职责、编制、经费。《条例》的出台,使各级政府做好地方志工作的责任更加明确,使各级地方志机构的职责更加清晰。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开展工作,不折不扣地履行使命。

——在构建地方志事业全新文化产品生产方式上实现转型升级。目前,全市编纂出版了一大批志书,包括部门志、专业志、行业志、山水名胜古迹志、乡镇村志、地情书、年鉴,并整理一些旧方志。这无疑是一项辉煌的成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更是一个基础、一个开端,也是新时期地方志工作向高质量和高效益事业发展转变的基本前提。今后重点是突出“三抓”:一抓精品。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必须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进度服从质量,严把资料关、体例关、史实关、保密关和审核关。志稿形成后,要仔细推敲,反复打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认真加以修改完善,不能因为赶进

度、急于出版而降低志书的质量标准,更不能为限期完成任务而草率收场,使质量不高甚至粗制滥造的志书出版发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出台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就是针对目前业已出现的某些重进度、轻质量的不良苗头,从总体上对提高志书质量提出的统一标准和要求。我们要善于运用这些意见和规定尤其是借助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来推动方志产品质量的管理,组织实施精品工程,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佳志、良志、传世之志。二抓活动。活动也是产品。地方志文化活动有着传统地方志文化产品不可媲美的社会吸引力和影响力。除了地方志界的学术研讨活动外,我们要更加重视策划组织一些体现地方志特点、发挥地方志优势,便于各方参与、助力地方发展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如围绕建党、建国、建市等重大节点开展的宣传纪念活动,志鉴书籍走进社区活动,以及配合地域精神提炼和弘扬、地方形象对外宣传推广、先进模范人物评选、招商引资、城市建设、会展旅游、抗灾救灾等开展的活动。三抓传播。主动加强与新闻媒体的互利合作,善于运用大众传媒宣传地方志工作知识和成果,推介地方志资源,放大地方志声音。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地方志信息转化为电子书、网络版等社会喜闻乐见的载体形式,通过地方志馆、网站等平台,广泛提供给社会共享。还要以志书资料为基础,参与创作文学作品,制作电影、电视剧。

——在构建地方志事业全新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上实现转型升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履行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资料、组织整理旧志和推动方志理论研究,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五个职责。这就标志着地方志部门已经由修志单位、志鉴编纂单位向地方志工作机构转变。与此相适应,地方志工作的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也随之转变,必须靠“提高四个能力”来适应:一是提高“管”“办”结合的能力。在组织实施好本级工作的同时,重视抓好对有

关部门和下级机构工作的指导和管理。二是提高运用规划推进工作的能力。认真做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以规划的制定和落实执行好法律法规,同时以规划明确地方志机构的工作任务、工作程序和配套经费,让管理者和执行者有章可循,不因人事变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兴废。三是提高依法督促工作落实的能力。依法敦促地方政府负责人和有关部门履行修志职责,依法向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及个人征集地方志资料,依法严格审查验收志书、保证志书质量,依法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四是提高应用激励引导机制的能力。定期开展地方志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评选表彰,开展志鉴评奖和质量评比,开展地情开发利用成果展览和作品评优评奖,不断增强地方志工作队伍的自豪感、责任感,充分调动和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在构建地方志事业既能垂鉴后世更能服务当代社会全新功能上实现转型升级。地方志的功能是“存史、资治(资政)、教化(育人)”,“存史”主要用于垂鉴后世,而“资治”与“教化”则主要体现于服务当代。因此,修志不能只是为了“存史”,有益后世,更应服务当代,可以在为地方发展战略研究和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为爱国主义教育、地情教育提供教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为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研究资料和经验教训,为地方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起到宣传作用,为旅游开发提供新的资源等方面发挥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为此,必须着力强化“四种意识”:一是强化用志意识。修志的目的完全在于用志,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目的。无论是“存史”,还是“资治”、“教化”,说到底都是用志。用志是新时期地方志事业的新特点、新发展,用志是服务当代、以志为鉴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克服修完志书就万事大吉、束之高阁“一修了之”的错误做法,走出把开发利用修志成果当做可做可不做工作的认识误区,通过编写简志、专题书、地情丛书、地情刊物,在媒体上开辟地方志专栏,制作志鉴书光盘,开办地情网站,建设开放地方志馆等多种形式,积极研究和开拓社会读志用志途径。二是强化融入

意识。要转变地方志是边缘部门和边缘工作,靠近不了“中心”,进入不了“大局”,帮不上忙使不上劲,摆不上位置引不起重视的错误认识。积极主动贴近中心、融入大局,努力在服务大局中认知地方志的责任与价值,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地方志工作的位置,在服务大局中发挥地方志的社会功用。当前,要主动融入加快转型升级、促进科学发展、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大局,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局,融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大局,融入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平凉特色文化名市和“平凉智慧城市”的大局,融入加强和改善民计民生、建设幸福美好新家园的大局。“有为才能有位”。只要我们以对历史、对未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有思路,有作为,有成效,就一定能展示出地方志独有的魅力。三是强化地情意识。地方志信息是关于一个地区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的信息。地方志工作就是区域信息工作,地方志工作者就是地情信息工作者,地方志机构是一个地区综合信息的整理者、整合者、储存者、发布者和把关人。所以,我们要努力将地方志书编纂成地情书,将地方志网站办成地情网站,将地方志馆建成地情馆,将地方志工作机构打造成地情记载、研究、开发和管理机构。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地情研究活动,准确把握国情、省情、市情、县情、乡情、村情,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地情资料保障、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四是强化惠民意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实现地方志工作社会功用的转型升级,就必须树立“地方志为民”、“地方志惠民”的新观念,主动登上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开辟服务窗口和渠道,提供独具特色和魅力的地方志文化服务;必须放下居高临下的“教化”姿态,在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对地方志文化和地方历史文化的需求中发挥好提高人、塑造人的作用;必须改变“官书官看”的旧观念,注重增强地方志工作的大众性和志书编纂的社会性,编纂出版更多的“公民书”。

——在构建地方志事业全新工作力量上实现转型升级。地方志机构要转变组织方式,从闭门修志转变到开门修志,统筹协调处理好“点”、“线”、

“面”的关系,建立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开放性、整合型工作队伍和力量,为圆满完成工作任务提供坚实保证。一是注重“点”的建设。“点”就是地方志人才队伍。在采用封闭编纂模式的时候,主事的地方主官都用延聘的办法,从社会上选择那些有德才的人士来担任编纂工作,事竣人散,是一种因事择人的人才选用模式,不担当培养的职责。地方志工作机构实行常设之后,特别是随着依法修志、开放式管理、强化服务功能之后,地方志工作机构要代表地方政府履行地方志工作职责,开展多方面的工作,对地方志工作者的要求大大提高,单靠面向社会选用的人才工作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到了这个时候,地方志机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长期担负或者部分担负起过去由地方主官履行的修志职责,如果没有相应的专业技能和决断能力就不能胜任岗位要求,在制定和落实编纂方案、实施项目管理、确保编纂质量等方面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地方志工作机构要转变人才选用模式为人才培养模式,完善培养、教育和奖励人才工作制度,加强对专业修志人员定的期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按照志书编纂、年鉴编辑、地情开发管理的方向,依据学习型、研究型、创新型、服务型的标准,建立一支具有一定专业 and 理

论功底、又具有实践能力的地方志常备力量。二是注重“线”的建设。“线”,就是地方志战线。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指导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建立专兼职地方志工作队伍,负责开展本地本部门的地方志工作。同时,通过举办业务培训、成果展览、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提高整条战线的战斗力、凝聚力。三是注重“面”的建设。要学会从“大地方志”的理念来理解“地方志人”的概念,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推进方志力量建设。这样的“地方志人”,既包括从事地方志编纂的各专门机构的组织者、领导者、行政管理者、编纂人员和地方志学家,也包括各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文化机构、新闻单位及其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热心者、爱好者、研究者。为此,我们要注重培育和建立多种载体和平台,比如传统的编辑出版地方志刊物、建立地方志学会,比如现代的地方志馆、地情信息网站、地情研究会,打破专业和区域界限,鼓励和吸纳社会各界学有专长的人员以各种方式和渠道参与地方志工作。此外,制定管理办法,设立专项资金,确定重点项目,扶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更是一种行之有效、值得推广的做法。

(作者单位:平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接 25 页)《正宁宫河姚氏家谱》《正宁永正王氏家谱》《宁县米桥王氏家谱》等计 12 部。通过专业培训、和专家学者“华山论剑”、史志编纂,职工整体素质明显提高。

六、服务中心,积极有为,工作面不断得到拓展。2003 至 2004 年,编辑印制正宁县参加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彩色宣传折页 2 册。2004 年 10 月,编辑印制《正宁县首届苹果节节会指南》,策划设计苹果节节徽。2007 年,配合县旅游局,完成重点革命遗址立碑保护 8 处。2009 年 8 月,策划建成永和镇罗川村碑廊,撰写记事碑文,立碑 11 通。当年,还策划建成宫河镇街道文化墙、县城北环路文化墙。2010 年 7 月,主持完成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旧址、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习仲勋旧址的布展。2011 年,配合县邮政局,策划印制《人文正宁,辉煌历程》集邮册,一方面宣传

推介正宁,一方面为县邮政局完成产值 65 万元。配合县委宣传部编竣画册《印象正宁·魅力之旅》,配合县委农村部策划建成乡村文化墙。2012 年 6 月,主持完成县人武部“正宁县革命斗争史”展室布展。完成永和镇党委《廉政大讲堂》布展,建成山河小学文化墙。2013 年,配合古城罗川开发,编竣《千年古城罗川》电视专题片文字脚本。2014 年,主持完成县档案局《正宁记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室布展和县检察院《警钟长鸣》展室布展。目前,正在开展对 1931 年至 1949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刊载陇东分区、关中分区红色史料的整理挖掘工作,可望来年正式完成。同时,编纂《庆阳市发展改革志》,已完成工作量的百分之九十,来年可望正式出版。

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不断取得史志工作新成绩

——全国方志系统先进集体正宁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侧记

2003年6月,成立临时机构《正宁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2007年7月,成立正宁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制5人。几年来,在省市方志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下,该办凭着高度的文化自觉、执着的历史担当、炽热的人文情怀、顽强的奉献精神,在全省率先完成二轮修志任务,率先实现志鉴并举,率先建立网站,先后两次作为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检查点迎接考核,赢得正宁县委县政府、省市方志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地方史志成果两项获甘肃省史志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获庆阳市第二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一人获“全省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

一、有为争有位,地方史志工作真正落实“一纳入五到位”。2003年6月正宁县志办成立时仅有3名抽调人员,借用县政协几间楼房办公,经费不多,更谈不上购买办公用车。几年来,依靠扎实的工作实绩,正宁县史志工作逐步得到正宁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2007年7月,成立正科级建制、属部门管理机构的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兼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红色旅游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黄帝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县规划委员会公众委员等职。县委、县政府研究相关工作,注意吸收其参加,听取意见建议。地方史志工作经费列入年度县财政预算,按时拨付。2007年起,地方史志工作纳入县委、县政府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体系。2010年12月,县上拨款11万元,为其添置“大众志俊”工作用车一辆。2012年初,县委书记吴丽华在县委委员扩大会上赞其“单位小而有所作为”。主任王立明连续16年在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等次,荣立三等功两次,十多次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全县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先进个人”“全县读书学习先进个人”“优秀党员”“陇原先锋岗”等称号;

2011年6月被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聘为兼职教授。2014年7月,县委、县政府在“清房”后,让在外租房多年的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搬进县政府机关办公。工作人员中先后有3人提拔为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1人选送市直机关工作,1人选拔担任《庆阳市志》副主编。除常规设备外,摄像机、单反相机、投影仪等一应俱全。正宁县史志工作真正纳入地方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实现机构、人员、经费、场所、设备“五到位”。

二、志鉴并举,地方史志工作实现全方位覆盖、无缝隙衔接。一是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按照省政府办公厅2004年2月下发的《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转〈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关于甘肃省第二轮修志工作规划和甘肃省志第二轮编纂方案的通知〉》规定,正宁县“第二轮志书”编纂任务是完成一部上限为1980年的续修志书。但该县史志工作者顺应广大干部群众要求重编一部体例完善、贯通古今、内容丰富新县志的热切期盼,从2005年7月开始,仅用5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上溯上古、下止2006年《正宁县志》的编纂,于2010年11月出版。其质量上乘,装潢精美,赢得社会各界和省内外方志同仁的好评,被县委、县政府选作礼品馈赠嘉宾,各地购买交换者接踵不绝。并指导完成《正宁县卫生志》《正宁县教育志》初稿编纂。二是连续5年不间断出版《正宁年鉴》。2010年6月,在终审《正宁县志》的同时,启动《正宁年鉴》编纂。上限紧接新编《正宁县志》下限2006年,下限为2009年,于当年底出版。此后,做到每年编纂一本《正宁年鉴》。至2014年8月底,已出版《正宁年鉴》5本,分别是2007—2009卷、2010卷、2011卷、2012卷、2013卷。其编写内容紧接《正宁县志》,做到志书、年鉴编纂全方位覆盖、无缝隙衔

接。三是旧志整理成果丰硕。2005年6月,点校的清乾隆《正宁县志》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2008年12月获甘肃省“旧志类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年11月,编纂出版《民国正宁县志辑校四种》。2013年,点校的清乾隆《新修庆阳府志》《庆阳府志续稿》分别由中华书局、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前者2014年7月获“庆阳市第二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14年5月,完成被誉为“西北史学巨著”、总字数210万字、慕寿祺纂《甘宁青史略》的点校。

三、深入挖掘,地情资料编纂年年有新成绩。

2004年起,编纂出版《正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正宁史话》《正宁人文风物知识日历》《正宁人物春秋》《正宁史论》《正宁县国土资源志》《庆阳市国土资源志(1986—2010)》《正宁县志(光盘版)》《陇东革命故事连环画丛书:红色南梁(文字脚本)》《政区大典·正宁县》《正宁县第一中学志》《正宁县重点革命遗址简介》《正宁金石录》《正宁民间文艺大系》等书籍14部(盘),总字数达850万字。其中《正宁县国土资源志》2010年12月获甘肃省“志书类优秀成果二等奖”;部分研究成果被正式出版的《庆阳通史》吸收入书。同时,积极撰写文史稿件,刊发、入书出版的有203篇,其中《日本馆藏甘肃方志知多少》等9篇刊于《甘肃史志》,《刘少奇过新正》等7篇刊于《庆阳党史研究》,《从正史对黄陵县、正宁县的记载中看黄帝冢在正宁县的必然性》等51篇刊于《黄帝文化》等杂志,《历代文人宦迹游踪中的庆阳》等136篇收录于政协庆阳市、正宁县、宁县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

四、多方并举,强化发挥存史资政育人职能。

一是送书宣讲,普及地方史志知识。几年来,先后向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庆阳市政协文史馆、驻兰正宁籍同乡会、县乡学校、退休领导、副高级以上职称干部赠送《正宁县志》《正宁史话》《正宁史论》《正宁人物春秋》《正宁年鉴》等图书4700多册,价值105万元。为各乡镇及县团校、县检察院、县政府办等机关宣讲地方党史、地方志法规18场(次),发放宣传单5200页,听众约1.5万人(次),

激发了人们爱家乡、爱祖国的美好情感和依法配合、积极支持志鉴编纂的自觉性。二是率先作为,建立正宁地方史志网。2011年5月4日,正宁地方史志网建成,这是庆阳市乃至全省最早建起的县级地方史志网站。几年来不断完善,现设方志法规、地情信息、志鉴编修、旧志整理、理论研究、旅游胜地、黄帝文化、人物春秋、历史事件、革命遗址、志鉴出版、方志机构等12个栏目,成为宣传地方史志工作、提升地方知名度的新平台。三是依托报刊电台,制作专题节目。在县电视台开办“知党史·忆先烈·争先锋”正宁党史人物展播专栏,共播出32期。在《民主协商报》《黄帝文化》《牛苑》等报刊发表文章50多篇,宣传县域历史文化,并配合县电视台制作旅游开发、民俗等专题片3部。四是加强阵地建设,建成地情资料馆。2014年10月建成的地情资料馆占地面积20平方米,安装图书密集架4列16组,上架图书2983种、4500余册。主要有地方志类183种,年鉴类56种,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类428种,黄帝文化研究类34种,县籍闻人著作类180种,历史典籍类117种,工具书类431种,统计资料类89种,专业杂志类15种,校志校史类34种,电子读物类36种,文史资料类60种,组织史资料类12种,地图画册类90种,文艺类111种,社科类65种。已面向社会无偿提供查阅、摘抄、复印服务。

五、推行“走出去”战略,积极参加各类培训研讨,史志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几年来,有5人先后参加省史志办在兰州、浙江、天水等地举办的地方志、年鉴编纂培训班。并积极参加“南梁烽火与中国革命研讨会”“庆阳市历史学会历届年会”“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范仲淹学术研讨会”“党在陕甘边根据地执政经验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岐黄文化研讨会”“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文化资源高层论坛”等活动,提交论文55篇。其中23篇获市级以上优秀论文奖,42篇刊于《范仲淹研究》《庆阳党史研究》等市级以上刊物。同时,6次受邀到市直单位、兄弟县(区)“传经送宝”,指导、审评《庆阳市林业志》《庆城县公安志》等志书5部,编纂、指导(转23页)

论分志志稿的审查验收

——以《陕西省志·建设志》为例

倪平

分志,也叫专业志、行业志,是省志的主体工程。第二轮《陕西省志》编纂规划调整为1部15卷5大类75分册(分志)。如国土资源志、环境保护志、建设志、物价志、政协志、妇女志、科技志、文物志、人口与计划生育志等等。

分志志稿审查验收(以下简称志稿审验)是修志过程的重要环节和程序,是保证和提高志书编纂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二轮《陕西省志·建设志》是第二轮《陕西省志》第五卷经济(三)中的一部重要分志(专业志),是1999年9月出版的首轮《陕西省志·建设志》的续修志书。该志书上限为1996年,下限为2010年,共15年。由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编纂。截至2015年1月,该志书已编纂主体篇目:城乡规划、城市建设、勘察设计、建筑业、房地产业、村镇建设、建设科技、建设教育、建设社团、建设法制、建设信息化、管理机构、建设人物,共13篇、41章、144节。连同卷前部分(彩页、序言、凡例、前志简述、概述、中英文目录、彩页)和卷后部分(大事记、附录、参考文献、供稿单位及供稿人、索引、编后记),共计80万字,即将进入审查验收阶段。现结合二轮省志建设志编纂工作实践,对志稿审验作以初浅探讨。

一、志稿审验在修志过程居重要地位

首先,志稿审验是法规所明确规定的。1997年5月8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二届三次会议讨论通过,颁布实施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其中要求“各级地方志应严格执行审查验收制度”。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发的第467号令《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志稿的审查验收也有明确规定:“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列入规划的地方志书经审查验收,方可公开出版”。

2007年9月29日,陕西省政府颁发的第124号令《陕西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第十条规定:“地方志书实行审查验收制度。省编纂的地方志书实行分志单独审查,设区的市、县(市、区)编纂的地方志书实行整体审查。”第十一条规定:“省编纂的地方志书各分志和设区的市编纂的地方志书实行初审、终审两级审查验收制度。”

其次,志稿审验是由志书的性质所决定的。地方志书(包括省志分志)是由各级地方政府及部门主持编修的资料性文献,是官修之作,记载的是一地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历史现状。因此,省志分志记述内容是否准确可信,势必会影响其权威性和读志用志。此外,省志各分志内容涉及方方面面,而且有的内容还比较专业,需要进行包括专家在内的审查验收。因此,对分志志稿进行严格的审查验收,是发现和解决问题,保证志书质量的必要环节和重要举措。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就曾多次强调志书要“高标准、多评议、缓出版”,“志稿写出来,先不要急着出版,要反复推敲,反复评议,反复修改”。实践证明,每一次评审都会发现问题,都能使分志志稿质量上一个台阶。

二、志稿审验的依据、机构及内容

(一)依据。志稿审查验收,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中指组字[2007]1号)、《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中指组字[2008]3号)、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和《陕西省第二轮三级志书行文规范》《陕西省第二轮三级志书印刷规范》等为依据,对分志的观点、体例、内容、记述、资料和行文等进

行全面审查把关。

(二)机构。根据《陕西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省志各分志实行两级审稿制:

1.初审,由各分志(专志)承编单位编纂委员会审稿,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处派人参加;

2.终审及验收,由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负责组织,省地方志办公室代行编委会职能。

(三)志稿审验的内容。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是保证志书质量的基本要求,也是省志分志审查验收的重要内容。《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的志书质量总体要求有9个方面,即“观点正确、体例严谨、内容全面、特色鲜明、记述准确、资料详实、表达通顺、文风端正、印制规范”。志稿审查验收除“印制规范”以外,其他都适用。

1. 初审、终审的主要内容

①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否符合党的现行路线、方针和政策,体现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和新经验;三是否符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和要求。

②体例。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否坚持志体,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述而不论;二是志书体裁是否运用得当,以志为主(述、记、志、传、图、录、索引8种体裁);三是篇目设置是否符合“事以类聚,类为一志”基本要求,科学分类与现实分工的关系处理是否妥当;四是整体布局是否结构合理,结构严谨,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类目的升格或降格使用适当。

③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否真实全面记述事物(行业)发展的历史现状;二是否内容完整,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三是否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反映事物基本特征内容,记述有深度。

④记述。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是否区域、时间界限明确,越境不书和不随意突破志书的上下限;第二、是否记述事物、事件和人物,寓观点于记

述之中;第三、是否志书中同一名称、事实、数据、时间、度量衡、术语的表述,前后一致;第四、是否内容记述不机械重复,交叉记述的事物,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体现自身特点;第五、是否坚持生不立传,以事系人原则。

⑤资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否人志资料真实可靠;二是否资料使用充实、齐全,无重大缺漏和断限现象;三是否取材排比具有科学性,突出了地方、专业和时代特点。

⑥行文。主要有4个方面:第一、是否采用语体文,记述层次清楚,文从字顺,气势流畅;第二、文风是否简明明快,严谨朴实,避免了流水账、报告式和工作总结式的写法;第三、是否纪年、称谓、数字和计量单位、专用术语符合行文规定;第四、是否图表运用得当。

2. 初审、终审的重点及要求。

初审、终审是两个不同的审查阶段,侧重点也是不同的。

①初审由省志各分志承编单位编委会负责,重点是把握政治关、体例关和史实关。

②终审由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负责组织,带有全局性和全面性,重在全面审查。在把握好初审阶段政治关、体例关和史实关的基础上,突出内容全面、记述准确、特色鲜明、行文规范和符合保密要求等。

③终审稿报送要求。1.分志志稿在报上一级审查时,须有简短、明确的书面报告,一式5份,并加盖单位公章。2.报送的终审稿必须“齐、清、定”的要求。齐:将正文、图表、注释等,必须一次交齐,不得有遗漏及待补的附件和待补的数字等;清:文字、图表及照片清晰、整洁;定:必须是定稿,不再做大的改动。

3. 志稿验收的内容及要求

志稿验收也是一种审查形式,即对通过终审的志稿修改情况进行验收。其主要内容及要求是:

①检查分志志稿是否齐备(包括中英文目录、图照),不齐备的应予补齐后再进行验收。

②检查报送资料是否齐全并符合要求,不合格者退回补齐或重新修改后,方可进行验收。

③全面审读,严格把好政治关、体例关、史实关、记述关、行文关和保密关。重点是审查分志志稿的政治观点是否正确、资料是否准确详实等。

三、志稿审验应注意的问题

(一)分清志稿评审与志书评议的区别。志稿评审是在出书之前,为的是肯定编纂成绩,指出存在问题,以提高志书的质量。而志书评议是在出书以后,为的是总结经验教训,丰富完善方志理论。因此,志稿评审,要在肯定志稿优点的基础上以讲问题为主,好比医生看病,既要讲“病症”,又要开“药方”。问题讲的越具体越好,如何修改要讲出自己具体意见。

(二)善于批评。志稿评审主要是讲问题,但也要注意评审方式方法,不要小题大作,造成评审不欢而散。评审既要讲真理,又要讲面子。无论是领导,还是专家,都要从提建设性意见的角度、探讨商榷的态度来评审志稿。从而实现知识互补,资料共享,摆事实讲道理,把评审志稿当作学术问题对待,从严审稿。

(三)善于倾听。被评审者既要有虚怀若谷的

胸怀,也要有海纳百川的度量,要有闻过则喜的品德,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不能只求说好话夸夸其谈走过场。评审意见越多越是好事。即便在评审中丢了面子,但想想将来出版时少了差错,那就是挽回了面子。善于倾听,在评审中不能听了不同的意见,立马打断别人发言,作过多地辩解,只会把评审会变成了辩论会,这就适得其反了。

(四)择善而从。评审的意见很多,由于掌握的标准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不是所有的意见都是正确的,甚至会出现外行话和矛盾意见。基本原则是坚持真理,择善而从。

总之,志稿评审是分志志稿编修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帮助修改志稿、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否把好志稿的评审关,直接关系到一部志书质量的优劣。因此,志稿总纂合成后,必须经过严格的评审修改程序,才能定稿付梓成书。

(作者单位:陕西省住建厅建设志编辑办公室)

(接 32 页)

上报的特殊资料,一些学者文人送达的个人研究,一些领导推荐的思想文化成果,我们都做了备存,以待采用。有关老区工作会议资料,有市政府报送的,有市委报送的,还有主要衔接联系部门报送的,记在哪里,比较妥当,此事关乎全局,我集中整理,突出重点后,最后我们一致认为;由省委、省政府牵头负责召开的老区会议,对庆阳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放在政府一章、或市委一章都不相宜,只有列入附录,才算妥当。有关温家宝总理对于庆阳老区的几笔批文,散见于多处,我先以《落实温家宝总理批示,夯实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整理,最后,也由主编审定编入附录。总之,各个方面都进行了采撷,筛选,穷尽了诸多领域。时限内庆阳全境文化巨匠、思想大家、文艺精英的

最新、最高成果,在我们苦心孤诣的研究后,由集体决议,承奉给大家。后面,几经审议,留在志书里,当是最为公允,最为公平的文化裁决。单是最后的庆阳全市地名对照表,以其精细、实用、权威,为这部志书的恢弘交响,砸下了重重的一锤。我们双手展示的也许是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我们拉起的将是一种贯通过去,通达未来的历史进取。“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文化积淀,有着丰硕的文化成果积淀,有我们自己不绝如缕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这是我们民族振兴和文化发展的基石与起点,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历史财富与资本”

(作者单位:正宁县委党校)

《庆阳市志》编纂过程中基本内容的归属范畴及层次辨析

张芹鹤

2008年4月,《庆阳市志》修编委员会与全市80多个部门、单位签订分志编修工作责任书;2009年4月,市志修编委员会办公室,借用编辑3名,组建《庆阳市志》编辑部;2010年底,完成《庆阳市志(1986—2007)》全部志书的资料长编并初稿编写修改验收工作;2011年4月,接受市政府决定,市志下限延至2010年,重新启动承编部门、单位补充编纂;2013年12月,市志编辑部完成全部市志初稿,并通过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有关领导、市志修编委员会全体成员、周边市州史志办办主任、市志主要承编单位、审核单位负责人、七县区政府(区)县长、志办主任、市内修志专家学者约60人参加的全市初审;2014年10月,市志编辑部完成全志初审修改意见,并通过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终审。2014年11月,《庆阳市志(1986—2010)》,由中华书局出版。

《庆阳市志》,逾时6年,中间穿插过一次下限延伸,两次人员调整。幸赖全市市县两级政府大力支持,全市100多个参编单位通力合作,全市数百名兼职和专职工作人员,夜以继日,不厌其烦,采集资料,编写资料,报送资料,为全志编纂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掩卷而思,《庆阳市志》资料全面、厚重、翔实、珍贵,是一大特色;聚焦发展,探索规律,客观记述,又是一大亮点;改革开放,百业兴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在全志中得到记述;西部名城,陇上煤都,资源大市,革命老区,旅游胜地,在志稿中得到彰显。全志编纂过程,说到底就是对于志书所涉及的全部资料加工和处理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实则是在实施一项艰难、庞杂、复杂、艰辛的历史文化工程。说是工程,就得总揽全

局,就得高屋建瓴,就得设计划,扣进度,讲质量,精益求精!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志书是一部面向全国,走向世界,通达未来的,由地方党委政府组织编修的地情性资料书,其综合性、典型性、权威性,乃至科学性,当是其它任何本地地情书籍莫可匹敌,因此,编纂初始,我们就做到了高度重视,严谨对待。

一、从篇目设计入手,拟定出《庆阳市志》编纂第一阶段(初稿)目标任务分解表,下发各编辑工作人员,推动工作,基本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2009年4月,组织市志办、编辑部8名人员,采用分工承包,上门辅导、培训,直接帮助、反复督查等办法,帮助各部门设计篇目,搜集资料,编纂资料。其前,两名《庆阳地区志》副主编,根据前志拟定的篇目,指导各部门资料采集,遇到了困惑。因为机构增减,行业变更,职能拓展等,原定篇目,在与时俱进上做得不够。我们及时研究,采用“微调”办法,转化路径,从资料到篇目,在占有、处理、加工资料的过程中,提炼出新篇目,使篇目更具时代特点,并恰到好处地反映改革开放社会背景下新的志书内容。开始,我们未选择大编体、中编体,而直入小编体,一是前志作为庆阳地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其探索、开拓的意义和功用远远没有完结,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责任义不容辞;二是采用小编体,就是讲究实对实,而避免空见空。为什么如此说,打个比方,资料就是各种物品,篇目就是装物品的仓库,大编体,中编体就是仓库大了,县市级志书采用小编体,利于各种资料科学定位,码齐排放。这是我从县志、市志编纂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在指导实践中,我曾批评那些动不动就

抬出大编体、中编体的模式,而内容实则干瘪的部门志为“虚设层次,重屋架构,至为繁冗,涉嫌重复与交叉,会导致内容混乱”。一句话,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一方面,各章之间依照逻辑关系拼块并前后排列。分类和排列得当,也很重要。参考其他志书,结合本地情况,考源流,分主次,评估升格与降等,再三推论,然后确定为自然地理、建置、资源环境、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后经多次审定推究,志书出版时正文为政区建置、自然地理、自然资源与生物、环境保护、人口与计划生育、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邮政、电信、农业、林业、畜牧、水务、水土保持、农业机械、地方工业、电力、石油化工、煤炭、商务、供销、旅游业、财政、税务、金融业、计划项目管理、国土管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国有资产管理、审计监督、统计管理、粮食管理、物价管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人民代表大会、地方人民政府、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与社会团体、军事、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扶贫开发、教育、科学技术、气象工作、文化、文学艺术、文物、新闻报刊、广播电影电视、档案、志鉴谱牒、卫生医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育、人民生活、人物计64章。另一方面,节目安排,有降节为目的,有升目为节的,有前后调配的,有补填的,有删减的,均有缘由。编辑3人,一周一会,反反复复,个人改稿和集体改稿相结合,涉及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的问题,采用集体会议讨论确定或暂时搁置等办法处理。新章节目,多由我研究拟定,指导编写,最后加工成章,如石油化工、志鉴谱牒、人民生活等。各章涉及的第一节,多为机构。行业工作,多是在机构所属人员,依照上级政策法规,组织实施,兑现完成的。机构置于全章之首,较为合理。然而,机构变更,包括设置、合并、裁减,25年间,略显复杂,再加上涉及市县,甚至乡镇,不同的管理级别,跨越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一个章,如畜牧、水务,单机构拥有的文字量约3000字。作为市志,颇费考量。参阅前志,应全尽细。我学习研究,最终采用“卡两头,留主干,述变化”的方法予以解决。既体

现了市志记述的范围层次的完整性,又留予给县区志恰当的记述内容与空间。“卡两头”,就是记清记全1986年、2010年,此行业机构的全称,内设、下辖机构名称并人员;“留主干”,就是每个行业或部门,都有一个主要管理机构,主记,记清记全,至于升格的,析出的,非主要管理机构,不必细记;“述变化”,机构变更,随着地改市,市变区,乡变镇等,均有变化,必记一笔。同时,对市级机构,县级机构按块处理,提纲挈领,简洁醒目,要言不烦。

二、资料是全志构成的最基本元素,对于资料到资料长编,再到初稿的形成,我们所做的锲而不舍的努力,最终结出了正果。和以往编纂志书不同,《庆阳市志》编辑部,始终坚持精干有为编修力量,以三两个编辑为核心,避免人浮于事,以提高工作效率。大量的资料,来自于参编单位提供。为了提高所送资料的可用率,激发采编人员的积极性,我们及时分发由庆阳市志修编委员会办公室编发的《实用修志手册》,建立联系电话,确定工作关系,搭建交流平台,以不定期《史志通讯》形式互通信息,交流经验,推动工作。起步阶段,全市就形成:一是领导普遍重视。各部门基本建立健全了工作机构,落实了人员、场地、设施、经费等,使资料采集、整理工作全面展开。二是任务分工明确。按照《庆阳市志》篇目大纲要求,各部门根据行业业务变化、参考变更标准,调整提纲,分解任务。为如期纂好部门志,做好了保证。三是资料采集全面、广泛,达到了应搜尽搜。断限以内,立足全市,涉及本行业的所有以至相关的资料,都克服困难,采集入志。四是修志精英大荟萃,表现为人才济济,体现为老中青结合。一些部门的行家内手,业务骨干,出面担当。前志编修的一些老同志再度出山,使行业专业志编修与市志部门志供稿,相与进行。五是在盛世修志,众手成志的大背景下,地方大专院校一些专家学者的参与,为市志编修增添了文化品味。六是部门主修,市场运作,整合全市有限的修志资源,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顺应时代潮流的一种有效的工作方式。具备此种修志条件,我认为,首先,我们工作的起点就高。各部门相继送达的数万,十多万,甚至30多万资料,对我

们的“删繁就简”能力，“标新立异”水平，提出了严正考量。我们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真正是夜以继日，食不甘味，在资料堆里打滚，在效率和质量的天平上滑行。我们像双面判官，既要评判资料，又要评判自己。采用掐头去尾法，先是掐去前头，即是去掉是是非非的序，概述（多属专业志），以至超过了上限的资料；去尾，掐去行业志后面的人物部分，送给专人编纂，同时掐去逾越了下限的资料。其次，是消肿去臃法，即穿靴带帽的，铺垫过度的，前后重复的，说明的，评议的，总结的节、段、句，一删去。一切计划、规划、设想中的事、事件、数字，也减少记述。因为志书所记，是发生了、发生过的事。其他旁逸斜出，枝枝蔓蔓的句子，尽可能地删去。同时，扣住记述性质的内容，采用记述的语体。对于保留的资料，要科学分类，确定其归属；对于记述的重点，要使其尽可能的突出，对于表现特色的资料，独有的，稀缺的资料，全部保留，这是本志的光华部分。我们还采用合并同类项法，特别是一些多年性质上相近、相类的事物、数据，可以合并记述。如若干年合作医疗款的报销金额，若干年福利彩票的销售金额等等，没有政策、措施、设施上的变化，可笼而统之，若干年合并着记述。总之，对于资料的取舍增补，反复修改，往往一章一节，少则五六次，多则十来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多重反复。我在《从资料长编到初稿的多重反复》一文中有所论述，见《甘肃史志》2012年第二期。通过资料长编，我们深入到各个部门工作的内部，对部门工作的性质、内容、规模、质量、效果等等，有了更其全面和深刻的认识。经过修改，改成了初稿。也就是说我们的编目大纲，经过多次调整修改，十分清楚；记述重点，经过多次反复钻研辨析，依类归体。当然，一些涉及主次、详略，甚至政治观点的问题，只有在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在新的修志理论指导下，去鉴别，去认识，去记述。例如，《水土保持志》中，记述世行贷款二期项目工程的后面，记到用该款项给四个村，800多名妇女两年做了免费体检。这一笔尽管是客观发生的事实，但记入志书，必有负面影响。另外，旧事物的消退，新事物的壮大，其间的发展、逆转、甚至是倒退，是

客观事物自身规律的必然反映，不是因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各个历史时期的提法不同，实质上是一回事。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部门一统到底，其资料容易找到；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其资料有很大的隐蔽性，不容易找到，即使找到，也有更多的不客观成分。这是这一历史阶段志书编纂中的一个难点，但要克服困难，多些手段和方法，争取找到第一手资料。例如，国有企业改革、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重点，尽管有大量职工下岗，是社会的阵痛，但更是社会进步。认识上必须旗帜鲜明。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认识，我始终把把握着眼于社会的进步，着眼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着眼于管理制度的创新等。也就是编纂志书，能够始终体现出时代的发展方向 and 积极意义以及宪法至上的精神。

三、人物记述仍是市志记述中的厚重部分，但在坚持标准中，做了实事求是的甄别和分类，通过3000多名庆阳优秀儿女在各行各业贡献业绩，展示了他们在国家、社会层面上的发展领域和历史高度。2008年4月，庆阳市委、市政府办公室联合发文，通知各县区单位，为全市人物志编纂提供资料；2011年3月，《庆阳市志》修编委员会办公室在庆阳电视台、《陇东报》发布启事，要求各界人士提供相关人物资料。提出凡在限内，已故及在世的庆阳籍和在庆阳工作过的客籍人士，符合条件的，均在征集之列。期间，年届70岁的老前辈付宏民，不顾年老多病，多次深入县区，走访知情人，完成了大量传略人物资料采集。其固执和不妥协的品性，用发信、打电话、上门索要等方式，弥补了许多亡故人物、在本籍已没了亲己的人物的资料。截至2013年9月，经过多方努力，克服偏见（有些部门只提供本籍人士，而排挤外籍人士入志；有些单位只提供自己了解到的人物，即使本籍人物，在外卓有建树的，也不挖掘提供。如《文学艺术》承编单位，只提供庆阳市文联所属9个协会之内所属人物，至于庆阳籍在外，在国家级层面上的文学艺术人物，因为联系有难度，就不再提供）。以各县、各部门上报资料为基础，约100万字；结合各部门所

报人物,知情人送报资料越10多万字,最终经过修改、删减、提炼,形成《庆阳市志》人物志主体。即《庆阳市志》第六十四章,分传略、简介、名录人物三节,计22万余字,占全志文字稿180万字1/9强。其中传略人物,领导干部135人,闻人学者82人,英模知名人士57人;简介人物,领导干部400人,闻人学者335人,英模知名人士26人,企业精英38人;名录人物,烈士69人,获得省部级以上各行各业先进人物1018人。可以负责的说,《庆阳市志》,所记人物,均侧重实职、业绩、级别,扣硬指标。这些人物,经历了世纪风云,社会沧桑,以自己的奋斗业绩,成了志书中的精华部分,闪烁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不朽光彩,是昭示后贤,激励世人的碑石教材。编纂过程中,我们首先精减记述文字,对于人物通讯式的用事例、故事表现人物的内容段落,甚至评价性、说明性、抒情性句子尽可删去,力求去伪存真,去芜存实。一些涉及性别、民族、学历、政治身份的,剔除雷同,保留特别。一些学习经历、虚职、兼职,本部门、行业的奖励,省一级的人大、政协、党代会代表资格,非特殊,也删去。评审稿发放后,《庆阳市志》中的上志人物,经过反复研究,标准较之先前拟定的标准做了上调,传略人物稍宽,简介人物从严。最后一阶段,征询《庆阳市志》顾问意见,反复酝酿,将前面列为不够标准的部分老教师、老文艺工作者、老科技工作者、老医生、社会知名人士,个别特殊事迹烈士,还是录入了人物传略。就是说,传略人物节内闻人学者与知名人士,条件相对宽泛,着重体现收录人物的特殊性和在当地社会活动中的贡献或者对后人的教育意义等。至于简介人物,除了英模与知名人士、企业精英,均侧重业绩贡献、社会影响外,其他人物就扣硬件,讲标准,绝不宽延。名录人物,可能出乎了许多人们的意料,原来我们设定的副高职称人物、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等要人名录的人物,一并删去不录。必录的获省委省政府、中央部委、国务院部局及有关单位表彰奖励人物,也做了大量甄别、分类、整合。有些奖,有“贪天工为己有”之嫌,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婚育新风进万家”“农业建设扶贫开发暨帮县扶贫工作”先进个

人;有轮流坐庄,平分秋色的奖项,如连续几年,某部门领导替换,都会自然而然地获某方面奖项;还有某类奖,如“2005年全国宫内节育器避孕效果调查先进个人”等,无疑奖项随意,含金量大减。我们一应整合,以极简名录收录,实为明智之举。为市志的人物收录立了样板,做到了宁缺勿滥,达到了提魂聚气效果。古人曾云:“大浪淘沙,方显出英雄本色”若《庆阳市志》中的人物,堪与英雄比肩,当会体现出这本志书的不同凡响的况味。

四、附录所撮要的地域文化的丰富和自信,所展示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非凡意义,所探求的农耕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精神内蕴,恰好给《庆阳市志》这个文化博览园,开辟了最后一厢珍贵的橱窗。人类自知自觉的行为,所形成的种种印迹,所生产的有形的无形的物品,都包含着诸多神秘神奇的创造和创新因素,都会成为人类赖以发展和进步的基础。《庆阳市志》附录,开始设计,分为文献、史论、碑记、辑录、书目、编志始末6类。最后成志,分为重大事略、文存、考证、序言碑记、其他、地名对照表。编纂之初,同样立足全市,广览博采。庆阳市政协文史委,坚持“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和“三性”(统战性、资料性、可读性)原则,收集抢救、挖掘整理并编发《庆阳文史资料选编》157期,结集出版《庆阳文史资料选辑》4辑,其中《胡耀邦视察庆阳地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视察扬黄工程》《一个时代的结束—庆阳市告别窑洞小学记实》《一个外国人眼中20世纪初的庆阳(上、下)》等,以及市政协组织编纂出版的《庆阳历史文化揽胜》《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庆阳先周历史与农耕文化论丛》等,对《庆阳市志》的附录编纂提供了主体资料。以此为基础,由我指导相关人员,对1986—2010年《陇东报》中的文史研究文章、重大事件通讯报道、重要会议有关决议、特定时期领导讲话、年度国民经济统计公报、以至典型的具有地域人文气息的文艺作品,进行复印、扫描、整理,历时一年,复印汇编1200多页,备存待用;再则,对《庆阳开发与建设》中的可用资料一并复印、扫描、整理。当然,地改市文件,庆阳招商引资政策,一开始,都众口一词,纳入视野。至于部门(转28页)

《阶州直隶州续志》编撰特点及其价值

陈郑云

摘要:武都,史称阶州,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清光绪年间修纂的《阶州直隶州续志》,其书纲目清晰、内容宏富,内容上至先秦,下至清末,涉及地域达陇右、陕南和川北诸地,是研究武都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献资料。本文将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探讨《阶州直隶州续志》的编撰特点及其资料价值。

关键词:阶州直隶州续志 地方志 文献价值

前言

地方志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在中国古籍文献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除了正史以外,了解地方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地方志不仅反映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社会实际情况,而且全面详细地记述了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民俗、地理、人物、矿产、动植物等历史情况。

地处甘肃东南部的武都地区,是甘肃通向陕西、四川等省的交通枢纽,三省经济、文化的汇集之地,历史文化积淀厚重。“武都”一词最早见于《华阳国志》,其《蜀志》记载:“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武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更作《史邪歌》《陇归之曲》。”此故事的时代背景约在周显王在位年间(公元前368~前321年),但“武都”作为行政机构设置的名称,则见于《汉书》。据《汉书·高后纪》载:“(高后)二年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汉书·五行

志》载:“高后二年正月,武都山崩,杀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乃止。”说明在公元前186年武都一带发生地震,武都道山崩,地震造成760人死亡。武都道建于何时,史书无明确记载,但最晚当在惠帝二年(前186年)之前。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中认为:“武都疑秦已置县。”有可能在公元前279年秦国置陇西郡时,与故道、下辨道、上禄道等同置。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灭南粤后,又发兵击西南夷。据《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南粤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苻侯,冉駹皆震恐,请臣置吏,以邛都为粤襦郡,作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由此可知,汉武帝时期设立武都郡,以后历代或为郡、或为镇、或为州。唐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29年)武都改称阶州,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代。

地方志是专门记述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情况的文献,其体裁相传源自司马迁的纪传体。东汉·班固写《汉书》另创“志”体。“志”与“史”虽名异但体裁相同,因此按时间顺序记述地方社会历史情况的文献则以“志”为名,其意实在于“史”。志书记载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情一应俱全的全面、系统、准确的社会大观的综录,可谓包罗万象、卷帙浩繁、信息密集、史料丰富,是这一地方地地道道的“百科全书”。武都地区自秦汉以来,建置复杂而又多变,社会人文历史也多有变化,因此用方志来记载其变迁也多有必要。

就现存资料来看,武都最早的志书为明万历《阶州志》,此后历代地方政府都比较重视地方志

的编撰工作,有清康熙《阶州志》、乾隆《直隶阶州志》、嘉庆《武阶备志》和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其中,《阶州直隶州续志》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资料详实,极其珍贵,1987年经曾礼、樊执敬校注后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现收入曾礼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阶州志集校笺注》中。

一、《阶州直隶州续志》的编纂背景与过程

在《阶州直隶州续志》修纂之前,已有明万历年间余新民修、蹇逢泰纂的《阶州志》,清康熙年间祖肇庆纂修的《阶州志》,乾隆年间葛时政纂修的《直隶阶州志》,清嘉庆年间吴鹏翱纂的《武阶备志》。叶恩沛于光绪九年(1883)至十一年(1885)任阶州知州,认为“州志”是“一郡要务”,在政务闲暇之际,详为采访,购得乾隆年间葛时政纂修的《直隶阶州志》一部,然而“迄今百数十年事迹,未经补续”,于是命郡贡生吕震南会同郭维城、苏蕴芬续编州志。在修纂过程中,以葛时政纂修的《直隶阶州志》为底本,其缺略的部分以《武阶备志》及《甘肃通志》补充,每修成一卷,必呈叶恩沛审阅,修纂“越十月而告竣”。

《阶州直隶州续志》修成后,叶恩沛为之作序。从其序言落款时间看,《阶州直隶州续志》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中冬(十一月)开始纂著,到光绪十二年(1886)中秋(八月)“越十月而告竣”的,其书之所以名为《续志》,大概是由于上承葛时政的《直隶阶州志》,吴鹏翱的《武阶备志》,下增其两书所本无的近事因而标名《续志》。

二、《阶州直隶州续志》的结构、体例与内容特点

第一,在结构体例上,吸收前代方志的优点,全景式地记载了武都地方社会历史、文化经济、地理沿革、风土人情等全貌。《阶州直隶州续志》主要采用记事本末体横排纵述各项内容,共分三十三卷,卷下根据内容设各类目平行排列,相互独立。今移载全志卷目如次:卷一图考、卷二山川、卷三建置沿革、卷四疆域、卷五城池、卷六公署、卷七学校、卷八风俗、卷九户口、卷十田亩、卷十一赋役、卷十二关梁、卷十三祠祀、卷十四物产、卷十五古迹、卷十六兵防、卷十七纪事、卷十八释铺、卷十九

祥异、卷二十调恤,卷二十一职官表、卷二十二封赠、卷二十三名宦传、卷二十四群雄、卷二十五选举、卷二十六人物、卷二十七忠孝、卷二十八贞烈、卷二十九隐逸、卷三十流寓、卷三十一艺文、卷三十二杂识、卷三十三番夷。

第二,在修撰内容上,考据周详,去伪存真。《阶州直隶州续志》自刊印行世,迄今百余年,一直受到史志学界的重视。编撰地方志书,是一个十分艰巨繁重的工作,叶恩沛《阶州直隶州续志序》云:“阶州,古武都地。历代以来,建置不一,沿革屡变,欲於千数百年后,考旧址,搜轶事,勒为志乘,简则不免挂漏,详则恐其冗繁,甚矣其难也。”而吕震南撰作,“以《葛志》为底本、其缺略则以《吴书》及《甘肃通志》补之”,自己又“详为采访”,补往续新独能旁搜远绍,取精用弘,因而,《续志》更为人推重。1932年,张维在《陇右方志录·序》中,特别强调:“吕震南《阶州志》,峻削清严,乃儒者之书。”又于著录此志的案语里,着重谓其“询称名著”。《阶州直隶州续志》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于此可见一斑。张维《陇右方志录》在著录《武阶备志》的时候,曾经援引《阶州直隶州续志》的《凡例》说:“郡人吴鹏翱著《武阶备志》一书,亦迄明而止,考据精详。辩论《禹贡》水道,而于本郡沿革分合之迹,无不洞悉端绪,绘图列说,稗汉、沔、恒水,源流考证,一目了然。即后有作者,无出其右。”《武阶备志》中这些卓越的成果,在《阶州直隶州续志》里,被继承保留下来,“仍仿吴志旧图”。这样,就不仅“庶不没前辈考据之苦心”,而且使这部志书博采众长,取精用弘,自成家数,是为甘肃地方志中前所未有的“名著”。

第三,以封建道德观念为标准选择人物志。对于名宦人物的选择,《阶州直隶州续志》严格遵循编撰原则,对于要收录的人物仔细核查,在卷二十二《名宦》中,只选取那些德高望重、功勋卓越的“循良”之辈。对于符合封建道德观念的忠孝节义之人和事迹也详加记载,在卷二十七中单列《忠孝》、卷二十八中单列《贞烈》等,以昭旷典而垂不朽。在卷三十一《艺文》中分上、中、下三部分,专门收录阶州、文县、成县的名人诗文,其收录“有关切

要者,如名臣之功绩、骚客之题咏”的文章方可入选志书。

第四,对历代统治者的歌功颂德。《阶州直隶州续志》认为:“历代分封、敕赠,皆以笃本支、崇有功……极恩荣之盛事”,因而在方志卷二十二中单列《封赠》一节,对历代武都地区人物受封赠的事迹予以记载,以表达对统治者的感激之情。此外,历代地方志中都有历代灾祥的记载,《阶州直隶州续志》卷十九《祥异》一节,对历史上武都出现的祥瑞内容进行了记载,如记载:“梁乾化二年六月,麟见文州”,“宋建隆元年正月,龙见玉垒关”等,通过天降祥瑞对统治者多歌功颂德。

三、《阶州直隶州续志》的价值

《阶州直隶州续志》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其贯通古今,综合反映所记述武都地域内自然、社会、人文、习俗等领域的实际状况,涉及面广,内容具体,对了解所记述地区的社会历史、风土人情有独特的功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文献资料价值。《阶州直隶州续志》在纂修中搜罗汇集了大量有关武都地区的历史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一般成熟定型的方志都设有“建置沿革”目,吕震南在《阶州直隶州续志·凡例》中说:“(武都)建置沿革,古今各有不同。汉、晋、六朝,名目纷如。历唐、宋、元、明,屡经裁割,非汇萃子诸家地理之书,不能得其详悉。”所以说,该志在撰写建置沿革时,曾经前代方志的建置,郡县治城邑考,统属分合表,次第以阶州、西固、文县和成县,历叙其始置,历代分合、统属演变和当世承、裁、并、领的现状,并且将这种建置沿革,分别时代,表列于前。这样,就更加方便读者披览,收到展卷一目了然的效果。如此汇集前人成果,汲取精华,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此外,各卷还加了大量的按语,对卷目的一些历史地理概念、名物典章及历史人物加以考证说明。有的地方作者还作了评论分析,如《阶州直隶州续志》卷十六《兵防》下按语云:“国家有百年不用之兵,不可无一日不备之虑。阶属跨连边徼,番汉杂居,羌夷屡为边患,练兵之道,宜急讲也。考古兵制,按今营规,则夫干城捍卫,愆饬严防,尤所望于司戎行者。

志兵防。”诸如此类论述不仅难免繁冗芜杂之讥,有矜奇炫博之嫌,但放在今天方志编纂和研究者普遍不曾通读经史,国学根基比较薄弱的背景下看,这些资料又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显得弥足珍贵。

2.历史文化价值。关于前秦政权发源,据《阶州直隶州续志·卷之二十四·群雄》记载:“前秦(苻洪),夏有扈氏之苗裔。子孙强盛,世居武都,为西戎酋长。始,其家池中生蒲,长五丈五,节状如竹。时感异之,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汉建安二年(198年),魏武伐蜀,迁武都氏民于天水、略阳、陇坻之间,蒲氏遂为略阳临渭人。有怀归者,为部落小帅。妻姜氏,产子名曰洪,字世广(时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蒲氏迁略阳六十五年而生洪)。怀归卒,洪代为部帅。好施,多权略,骁勇善骑射,率部入陇山,为氏王。后遗使降晋。永和六年(公元350年),晋以洪为氏王、征北大将军、督河北助军事。洪以讖文有草符应王。又其孙背有草符字,遂改姓苻氏。自称大单于、三秦王。降将麻秋焜洪,子健将秋斩之。洪临死谓健曰:‘吾所以未入关者,以为中原可指时而定。今不意为竖子所困,中州汝兄弟所能办。关中形胜之国,进可以统一天下,远可以保全秦陇。吾死之后,便可鼓行而西。’言终,卒,年六十六。健即位(351年,占关中,据长安,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大秦,改元皇始。352年,称帝,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追尊为‘惠武皇帝’。”这就说明,前秦早期先祖生活在武都,“魏武伐蜀,迁武都氏民于天水、略阳、陇坻之间”,武都应为前秦政权的发源发祥地。所以说,《阶州直隶州续志》在记录前秦政权早期活动,补充正史记载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3.文学研究价值。我国古代文献资料中收录有历代文人诗文词曲的总集、别集,例如《全唐诗》《乐府诗集》等,其宗旨在于网罗一代、一人诗文之全,对于零句残篇也不遗余力,但限于时代、资料等原因,往往有所遗漏。各地方志大多有艺文志之类记载,收有各地文人的作品。如果加以梳理,就可以用来补正这些文集。《阶州直隶州续志》现存卷三十一“艺文”类,收录了唐代到清代文人墨客

有关武都地区的诗词文赋碑铭等各类文学作品,诸如杜甫、元稹、苏轼等著名诗人作品亦在收录之列,这对于保存文学史料、订补勘误辑佚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4.旅游文化价值。发展旅游业,使潜在的旅游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旅游资源,这是必须加以重视的研究课题,在这方面,作为历史文献的地方志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考虑历史文化遗产的资源化利用时,应充分重视地方志的有关记载,以求事半功倍之效。《阶州直隶州续志》卷十三祠祀、卷十五古迹、卷十四物产、卷十七纪事、卷二十四群雄、卷二十六人物、卷二十七忠孝等,分别记载了武都地区的名胜古迹、名人轶事等历史人文资料,对于当前武都旅游产业发展具有宝贵的开发价值。武都旅游目前以自然风光与人文为主,虽然获得了旅游界的好评,但是人文资源挖掘不够,使得旅游业发展后劲乏力。如果能够重视地方志所记载的历史人文资料,加以整理开发,将对本地的旅游事业起到推动作用。

结语

有清一代,是地方志纂修的繁荣期、方志学理论构建的成熟期。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在继承前代方志特别是《直隶阶州志》《武阶备志》的基础之上,在结构、体例、内容上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创新。同时本着严谨务实的编撰原则对文献材料进行考据,去除不实之言,详求博考,真者存之,缺者增之,成为研究武都地区人文社会、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的基本素材,实属传统地方志中的珍贵文献。

参考资料:

- [1][西汉]班固撰.《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2][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M],济南:齐鲁书社,2010.
- [3][清]叶佩恩、吕震南撰,曾礼、樊执敬校点.《阶州直隶州续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
- [4][民国]张维.《陇右方志录》[M],北平大北印

书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

- [5]刘光禄.《中国方志学概要》[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
 - [6]王德恒.《中国方志学》[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 [7]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 [8]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济南:齐鲁书社,1990.
 - [9]来新夏.《方志学概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 [10]来新夏.《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M],合肥:黄山书社,1988.
 - [11]巴兆祥.《方志学新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 [12]曾礼主编.《武都县志》[M],北京:三联书店,1998.
 - [14]曾礼校注.《阶州志集校笺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
 - [15]焦红原.《陇南文化》[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
 - [16]田仁信主编.《武都史话》[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
 - [17]王干一.《略论〈阶州直隶州续志〉》[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 [18]牟实库.《甘肃地方志述略》[J],图书与情报,1982年01期.
-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仇池”地名初考

袁智慧

摘要:仇池山,是陇南历史名山;“仇池”,在古代也泛指仇池山及其周围地区,相当于今陇南市的地域范围。仇池山及仇池地区是古代白马氏族的家园,魏晋南北朝时建立过仇池国,延续300余年。本文对仇池山及仇池地区的名称、范围以及仇池地名的读音等作以探讨。

关键词:仇池 地名 初考

仇池山,位于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南50公里处。万山丛中,有一奇山,拔地而起,形似舰船,呈南北走向,两河相夹,三面环水。山的北面与别的山脉连接,但地形地貌相对独立,连接处地形为牛脊式山梁,民间称为“天桥”,两侧悬崖绝壁,天桥宽度不足两米,地貌为红色丹霞。西汉水从仇池山西面向南流,又转而东流,从山的南面流过,山的东面洛峪河由北向南流,在山的东南脚汇入西汉水。山的四周悬崖峭壁,难以攀登,山顶上地形平缓,有田地,有泉水,有村落,村木茂盛,风景优美。最高峰名为伏羲崖,海拔1793米,伏羲崖与仇池山脚的相对高度791米。^①

仇池山,是一座历史名山,古代史籍多有记载。仇池山及其周围地区,是古代白马氏族的居住中心;魏晋南北朝时氐人杨氏家族以此为中心建立仇池国。汉代典籍中称之为“仇夷山”。《开山图》记载:“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西汉司马迁《史记》和东汉班固《汉书》把仇池山地区称为“武都”,即指“武都县”和“武都郡”^②。武都县,也称“武都道”,是“武都郡”治地,具体位置在今西和县洛峪镇。《汉书·地理志》还记述,“武都县”有“天池大泽”^③。《三国志》为西晋陈寿所著,书中称仇池地区为“武都”和“百顷”^④。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述仇池地区时说“有瞿堆、百顷险势,氐

僂常依之为叛。”^⑤同时也记述“武都县”有“天池泽”。这与《汉书》记载基本一致。此“瞿堆”,即仇池山;“百顷”,为仇池山东侧的西高山;两山地形、地貌相似,而且后者面积更大,山顶田地更广,居民更多。现在,仇池山有3个小自然村,构成一个行政村,西高山为一个乡,有22个行政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也将仇池山称之为“瞿堆”。^⑥并对“瞿堆”地形、位置作了较详细的描述,而且,明确指出“瞿堆”,“《开山图》谓之仇夷也”。

“仇池山”和“仇池”之名始于南北朝时期。当时已出现了郭仲产《仇池记》专著。《仇池记》中记述“仇池百顷,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竦起数丈,有逾人功。仇池凡二十有一道,可攀援而上。”^⑦同时,郭仲产《秦州记》和范晔《后汉书》也有“仇池”之名的记述。《秦州记》记载:“仇池山,本名仇维山,形似覆壶,上广百顷,下周数十里,高二十余里,壁立千仞,分置均调,竦起数丈,有如人工也。”^⑧范晔《后汉书》记载:“有白马国,氐种是也。”“白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居于河池,又名仇池,方百顷,四面陡绝。”此外,当时另有辛氏《三秦记》也记载:“仇池县界,本名仇维,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沧洛二谷之间……。”^⑨由以上记述可知,仇池山,本名“仇维山”,又称“河池”。

隋唐时期,仇池山被称为“百顷堆”和“仇池山”。《隋书》(唐代魏征等撰)中称为“百顷堆”。^⑩杜佑《通典》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均记为“仇池山”。^⑪《旧唐书》(五代时后晋刘昫监修)记载:“上禄(县)……白马氏之所处。州南八十里仇池山,其上有百顷地,可处万家。”^⑫上禄县,为成州治地,即今西和县城所在地。从《旧唐书》记载来看,仇池山

也应包括今西高山在内,有“百顷地,可处万家”。唐以后仇池山之名一直延续。

宋代绍兴年间,有人立了一块石碑,取名《仇池碑记》,后来,碑佚,碑文留存至今。碑文中说:“仇池福地,本名围山,《开山》谓之仇夷,上有池,古号仇池。……上土下石,屹然特起,界于苍洛二谷之间,有首有尾,其形如蛙,丹岩四面,壁立万仞,……”^⑬宋代《仇池碑记》所说“仇池福地,本名围山”。此“围山”是何意义?有趣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仇池山下修梯田时出土围棋,材料为石质,年代尚未确定。围棋起源很早,先秦时期已有。伏羲诞生在仇池山,围棋棋局与伏羲时代的《河图》、《洛书》图案极其相似,“围山”之名是否与此有关呢?近现代仇池山一带民间有一种游戏名为《狼吃羊》,类似于围棋,或许就是围棋的原始形式。当地方言中,“wei”和“yi”读音相通。如,“马尾巴”的“尾”,既读“wei”,又读“yi”,这与“仇夷山”,又叫“仇维山”相似。围棋,古代也叫“弈”,下围棋,叫“对弈”或“弈棋”。仇池山,又称“围山”和“仇维山”,也叫“河池”,又是伏羲诞生之地;伏羲女儿也称“宓妃”,是洛神。曹植曾作《洛神赋》。仇池山下的河流名叫“洛谷水”等等,这一切都是多么的巧合。由此,笔者大胆猜想,围棋是否发源于仇池山。

总之,仇池山在历史上有多个名称。围山、仇维山、仇夷山、瞿堆、百顷山、百顷堆、河池等等。不同时代,名称不同。这些都是就山而言,地域范围很小,包括今西和县大桥乡仇池山和西高山乡所在地西高山。“仇池”之名,有时范围不限于一山,泛指以仇池为中心的大片地方。两汉时期,仇池山地区设立武都郡,管辖地方较大。西汉“武都郡”管辖九县,范围相当于今西和、礼县、武都、康县、成县、徽县、两当,以及陕西省凤县、略阳县等地。东汉“武都郡”管辖七县,范围相当于今西和、成县、徽县、宕昌,以及陕西凤县、略阳等地。所以,史书中称仇池地区为“武都”。汉以后多称“仇池”,所指地域与汉武都郡差不多,与杨氏仇池国的活动有关,范围不固定。^⑭

最后,再说说“仇池”地名中“仇”字的读音。

目前有两种读音。一种读音为“qi ú”,与姓氏

有关。认为仇池山曾有仇维道人居住过,以姓氏命名此山,读为“qi ú”。乾隆版《西和县志》记载:“仇维,周时人,居仇池,池为三十六洞天之一,后仙去,山又名仇维。”^⑮民国版《西和县志》从此说。^⑯《辞海》也将仇池山的“仇”注音为“qi ú”。今西和县蒿林乡有“仇”姓,当地人读为“ch ó u”,不读“qi ú”;此外,本县工作人员中也有宕昌籍“仇”姓者,读为“q í”,也不读“qi 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仇”注为“巨九切”。由此可知,汉代“仇”读“jiu”,仇池,读“jiuchi”。今仇池山洛峪河谷有黑虎峡,古代称“鹫峡”,仇池山主峰山脉最高峰为香山,清代香山碑文中称为“鹫岭福地”。这里的“鹫”与“仇”在汉代读音“jiu”相一致。^⑰今西和方言中把仇恨的“仇”读成“sh ó u”。仇池山的“仇”,与“仇恨”之意关系不大,按照现在当地方言中的姓氏读音,应读“ch ó u”。追溯古代,可读“ji ū”。至于乾隆版《西和县志》所载周代有仇维道人居住仇池山之事实,依据何在?有待查证。

参考文献:

- ①杜万鼎主编《西和县志》,1997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②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 ③班固《汉书·西南夷传》。
- ④陈寿《三国志》。
- ⑤常璩《华阳国志》。
- ⑥郦道元《水经注》。
- ⑦⑧⑨李祖桓《仇池国志》。
- ⑩魏征《隋书》。
- ⑪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 ⑫刘煦《旧唐书》。
- ⑬曹居贤《仇池碑记》。
- ⑭张维《仇池国志》。
- ⑮⑯乾隆版《西和县志》(任尚蕙著)、民国版《西和县志》(朱绣梓著)。
- ⑰新版《辞海》。
- ⑱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作者单位:西和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镇原境内的宋代御夏古城

何等强 王博文

镇原县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南部,东邻延安,南眺西安,西接兰州,北界银川,古代时是“北控大漠,南屏关中”的战略要地,它“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系于此地”。秦时此地为北地郡,汉治安定郡设临泾县,唐宋为原州。就交通而言,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人们常称“茹河道”。这条道路从关中出发,经淳化县,登子午岭,在董志原东部今北石窟下塬,逆茹河东进,经镇原的彭阳、开边、固原的杨城、彭阳、古城镇、固原,出萧关至河西走廊。北宋时期,镇原一带属原州管辖,与西夏相毗邻,属于陕西的沿边地区,也是西夏通往关中的必经之路。为了抵抗和御防西夏入侵,北宋王朝特别是范仲淹知庆州时,在原州境内修筑了许多城寨,这些城寨在抵御西夏入侵和保境安民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今,在镇原境内现存的北宋御夏古城、堡寨、遗址等遗存比较丰富,它成为我国多民族发展的历史见证。为了进一步研究北宋时期对西夏的防御体系,笔者对镇原境内北宋时期的彭阳城、开边城、新城城、西壕城、柳泉城、药葫芦城、殷家城等遗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与探究。

彭阳古城

彭阳古城位于太平镇上城行政村东山自然村南约 50 米处的茹河北岸二级台地上,东距蒲河、茹河交汇处的北石窟寺 5 公里。东至东城壕,南临茹河,西至大庄壑岬,北依东山。本次调查城址东西、南北长约 260 米,面积近 7 万平方米。此城平面呈正方形,傍河依山而筑,城墙均为黄土夯筑而成,现已破坏严重,门向不清(据当地老人回忆,城东、西有两门,南有便门,四角各有角楼一座)。现

残存东墙北段长 50 米,残高 8 米,底宽 8 米,顶宽 3—4 米,夯层厚 0.15—0.20 米,护城河宽 25 米,深 1.5 米,东墙南段已不存,仅见护城河深 6 米,墙基走向明显;东北角墩呈正方形,底边宽 14 米,西北角墩尚存,高 8 米,只见残角;西墙被公路破坏没有痕迹,紧临深沟,沟深约 25 米,也是傍河为畔;城南傍河没有高墙,但筑有女墙,距河床高 20 米,河为天然屏障,其险足以固城;北侧城墙长 200 米,残高 8 米,底宽 10 米,顶宽 5—6 米,护城河宽 30 米,深 1 米,夯层内夹杂有汉代灰陶绳纹瓦片,说明现存城墙有汉代遗存,系宋代重筑过;地表散布有宋代耀州窑青釉刻花、印花瓷碗、碟等器物残片,也有元明清时期的白底褐花及青花瓷片,但在古城西边也发现了大量汉代灰陶罐、绳纹筒瓦、板瓦等遗物。曾出土有铜镜、铜币和刻花青釉瓷碟、盘,还出土宋代“重修西禅院记碑”,记载了唐宁州丰义县址就在此地。据《嘉庆重修一统志》(以下简称《一统志》)记载:“彭阳县汉属安定郡,晋袭旧址,魏属原州,后改属云州,隋废。唐代又改丰义县。贞元四年(788 年)韩游环请筑即此城。宋又复称彭阳县,后废。故县城在镇原县东八十二里处。”清李从图总纂、张辉祖原纂《镇原县志》,道光二十六年刊本(以下简称《辑志》)记载:“彭阳在县城东八十里,遗址尚存。”由此推断,此城为汉(彭阳县)、唐(丰义县)、宋(彭阳县)三代古城,元明清曾沿用修缮使用过,是西汉和唐宋时期重要故县旧址,也是一座重要的军事边城。1993 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彭阳古城在宋代是“茹河道”上防御西夏的重镇,1993 年在古城南屯字镇阳宁村出土一枚北宋

铜印章,印文九叠篆,为“强猛第八副指挥使之朱记”11字,铸造十分精美。印背楷书“熙宁四年”及“少府监制”。“强猛”为熙宁七年(1074年)正月诏颁的禁军名额中侍卫步军司一个军的番号,此军当时屯戍庆州。“指挥”是北宋禁军中最重要的军事编制单位,往往一指挥约辖500人,其统兵官是指挥使和副指挥使,军队的屯戍和调遣常以指挥作为基本单位。虽然“强猛”正式诏颁见于熙宁七年,但镇原发现的这枚军印说明,熙宁四年(1071年)强猛第八指挥已经设置。当时彭阳县北宋时属原州辖区,为当时宋夏的边境所在。宋与西夏虽于庆历四年(1044年)达成和议,但此后两国仍征战不断,宋为抵御西夏入侵,在边境必然派兵驻守。此印的发现,说明强猛军曾经在原州彭阳县一带驻守,是当时宋夏边境战争的历史见证。同时,在彭阳古城附近还出土了一枚金代九叠篆“都统之印”,也就说明这里在金代时仍为军事战略要地。

彭阳古城地处川道,不足300米宽,扼守茹河道,人马只能从城内穿过,它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之一,扼守“茹河道”之要冲,匈奴、西夏入侵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而来的。汉代从长安出发沿云阳(陕西淳化县)、登赤须之长坂(今子午岭斜坡)、入义渠之旧城,过泥阳,沿蒲河、茹河经彭阳(镇原太平汉彭阳城)、安定(镇原城关汉后河古城)、扶夷(镇原开边汉张庄古城)、朝那(宁夏彭阳县古城镇故城)后出萧关(宁夏固原萧关古城)至高平,是古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也是古代通往北部边境的主要军事通道。在这条道路两侧,发现了大量秦汉遗存,唐宋古城(寨、堡)及烽火台,还有北魏及唐宋石窟,均在茹河交通线上,所以称“茹河道”,说明这条古道在历史上一直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载“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郡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奴这次入侵正是走的这条道。当时在要道设县城,足见其地位之重要。宋时又在这里继续设县,其目的是防御西夏入侵关中。北宋时期,原州一带与西夏战事频繁,位置十分重要,交通运输成为支撑边防,卫国保民、发展经济的一大

关键,故形成了直通边塞、四通八达的转运路线。在这条通道北侧的庙渠文夏出土了许多北宋胡人牵驼图雕砖和武夫牵马图雕砖,这些遗物证明当时的骆驼、马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曾经在这条道路上往来频繁。彭阳古城地处军事要冲和丝绸之路要道之上,在这里设置县城,战时可以扼制茹河道,和平时期可以掌控丝绸之路的过往商旅,查验文牒等。

西壕古城

西壕古城位于镇原县孟坝镇西壕行政村吴沟畎自然村向北200米的塬边上(即西壕街道北侧)。东至鱼梁梁,西至学校,北临西壕沟,南连公路。本次调查时城址南北长约280米,东西长约280米,面积近8万平方米。此城平面呈正方形,地势平坦,城墙保存较好,均为黄土夯筑而成,门向破坏不清。现残存东侧城墙长260米,底宽7-8米,顶宽2-5米,夯层厚0.12-0.20米,壕宽约20米,深6米;东北角有角墩,方顶内凹,顶部边长4米,残高10米,保存较完整;西侧城墙破坏呈土垄状,断断续续,紧邻深沟;南侧城墙修街道破坏只剩墙基,断面文化层丰富;北侧城墙长150米,底宽6-8米,顶宽3-5米,夯层厚0.10-0.20米,顶部凹凸不平,墙中间有18米的豁口,可能是城门,城壕宽约20米,深6米,城墙上女墙高1米,宽0.8米,坍塌呈锯齿状;东西、东南、西南角墩,保存一般。古城被新农村建设和新修砖瓦厂取土破坏严重,修砖瓦厂时出土成套耀州窑瓷器。采集到标本有瓜棱形白釉瓷碗、耀州窑豆青瓷碟、明、清青花瓷碗等器物残片。同时出土有宋代熙宁重宝、政和通宝、崇宁重宝、大观通宝、乾道元宝,金代正隆元宝,隋五铢等铜钱。调查时,在此城南侧紧依还有一座古城,虽然城墙破坏无存,但出土唐代遗物特别多,农民种地砖瓦残片满地,相传唐朝时候这里是一座城池,即西壕古城,据说是唐时武则天之子——驴头太子的封地。《辑志》载:“县北六十里,宋为寨城,今存。明于此置镇,今移集与孟坝镇。”《元丰九域志》:“州北四十里。今孟坝镇西壕行政村。”由此可知,此城为宋代遗存,延续时间比较长,是北宋原州临泾县管辖五寨之一——

西壕寨。

柳泉古城

柳泉古城 位于三岔镇石咀行政村向东 100 米的柳州自然村茹河南岸上。东接十八岷,南依柳州城山,西邻石咀自然村,北临蒲河。本次调查城址南北长约 400 米,东西宽约 200 米,面积约 8 万平方米。此城呈不规则形,依山势而就,现已破坏严重,仅残存东北角墙长 50 余米,高 2-5 米左右,宽 5-9 米,夯层隐约可见,其余城墙破坏无存。南侧有一小瓮城,门向不清。此城北临河、南依山,东、西两侧削成距地面高 3-6 米的崖面,横插在蒲河川,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遗址内随处可拣到耀州窑青釉刻花、白釉印花、黑釉瓷片,曾出土大量耀州窑青釉刻花、印花瓷碟、碗,宋代铜钱、石磨盘等器物,也发现大量石块砖瓦、石门墩等建筑构件。上世纪七十年代 309 国道从城中间经过,把城分成两半,文化层厚 1-2 米。《宋史·地理志》载:“庆历中置,西即熟户。”《宋史·兵志》载:“蕃兵县籍内属诸部落寨寨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宋史·宋琪传》称:“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局深山僻远横过寇略者谓之生户。明珠、灭藏、康奴等族北绥宁寨。”《辑志》载:“旧名原,领耳垛城一寨。”《辑志》载:“县北八十里(今镇原县三岔镇与方山乡交界处的清水河桥西),即十八岷地所谓柳泉城。宋时属羌,撒捕渴叛寇原州柳泉镇、环州鹑鸽泉寨,梧州刺史杜澄,内殿崇班赵世隆战歿即此。宋为镇,今废,城尚存,俗讹为柳州城。”

从以上文献资料说明,熟户即属羌也,说明属羌明珠、灭藏、康奴三族居住于此地,此地正好位于原州、环庆、庆州三交的原州一侧。就是今天镇原县北八十里、今十八岷地,即柳泉镇、古名鹑鸽原。因他们有兵数万,那么族人必然众多,居住当在环县、镇原、固原以及庆城相交界的广大地区。这里深居深山,岷岷繁多,地形险要,交通不便,依山傍河,取水方便,易守难攻,西北经过安家川和白家川可以直通西夏,是属羌明珠、灭藏、康奴三族选为部落中心的主要原因。

药葫芦城

药葫芦城 位于三岔镇高湾行政村后河自然

村药葫芦咀,东距三岔镇政府 50 米处,地处安家川河和白家川河交汇后的蒲河北岸二级台地上。东距三岔街道 20 米,南与二郎山相望,西临安家川河白家川河、与高湾后河老爷山相望,北依黑山梁、邻黑山沟。本次调查城址东西长 200 米,南北长 280 米,面积近 6 万平方米。此城平面呈葫芦形,地势险要,城墙保存严重,均为黄土夯筑而成,门向不清。发现南侧残存城墙长 20 米,高 10 米,宽 6 米,顶宽 2 米,夯土层厚 0.11-0.20 米,城内有上下两层窑洞共 40 多孔,城墙以下为削崖而筑,其余三面为断崖,易守难攻。在残留的断面上暴露文化层厚 1-3 米,最上层为布纹瓦片、雨点纹陶片、豆青瓷片;曾出土过耀州窑青釉刻花瓷碗;中间为绳纹灰陶板瓦、筒瓦等残片;下层为夹砂红陶、灰陶鬲、石刀等残片;城址地表散布大量建筑构件及各种瓦片,后期文化层在西边,早期文化层在东边。《重修镇原县志》(以下简称《慕志》)载:“即今县西北十八岷,宋柳泉镇与环县接壤之处。其北有二川,交通西夏。范仲淹议筑古细腰城,断其路,命知环州种世衡、知原州蒋偕董其事。”《庆阳府志》载:“宋范仲淹命威州知州种世衡等筑城,城成隶原州。”《辑志》载:“县西北一百二十里细腰张家,有城址,地名葫芦泉,今名徐家台。宋范仲淹有奏疏。”范仲淹在《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中写道:“惟环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灭藏、康奴三种,居属羌之大,素号疆(强)梗,在原为孽,浸及于环。抚之,很不我信,伐之,险不可入。其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这里说得很清楚,三族是在环州的西南,占据着原州的疆域,在原州为害,也经常侵扰于环州。《宋史·范仲淹传》里有一段文字,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明珠、灭藏劲兵数万。仲淹闻泾原欲袭讨之,上言曰:‘二族道险不可攻,前日高继嵩(崇)已丧师。平时且怀反侧,今讨之,必与贼(为)表里,南入原州,西扰镇戎,东侵环州,边患未艾也。若北取细腰、葫芦众泉为保障,以断贼路,则二族安而环州、镇戎径道通彻,无可忧矣。’其后逐筑细腰、葫芦诸砦。”这就说明明珠、灭藏、康奴三族势力强大,常与西夏相勾连作祟宋境,成为宋朝心腹大患。宋朝庭多次派兵征讨,但

因其地险要,都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宋仁宗庆历元年,范仲淹知庆州,并兼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在他巡边调查下,向朝廷提出在西夏与明珠、灭臧、康奴居住地之间修筑城寨,以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庆历四年(1044年)十一月,在他的支持下,调环州知州种世衡,原州知州蒋偕合兵修建了细腰城,隔断了明珠、灭臧、康奴三族与西夏的联系。这三族失去外援后,不战自服。这三族居住地向北有两道川,这两道川是西夏入侵的要道,也是我们确定细腰城位置的关键。在此城紧邻的北面山上发现一座宋代堡址,当地俗称梁山梁堡址,地处山顶制高点上,视野开阔,安家川和白家川尽收眼底,随时在掌控之中,为药葫芦城通风报信。同时,在山腰发现许多汉、宋墓。此城西侧战国秦长城从安家川南岸跨过安家川河在白家川东的走马梁上通过。这里有唐宋、战国秦汉、西周文化遗存,说明这里很早就为区域的经济、政治中心。古城遗址地处丝绸之路的“蒲河道”上。蒲河是泾河的支流,西北通宁夏及固原。今蒲河河谷地带遗址众多,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是通向北方草原和河西走廊的要径。这里有是河流交汇的要冲,紧依战国秦长城,原是一个重要城障遗址,也是宋代的一处主要城寨遗址,历代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一个重要关口,北距环县演武乡5公里,西与固原紧接,东南距北宋柳泉镇(柳州城)15公里。古城北有二川,一个是白家川,直通北宋时的环州,一个是安家川,直通北宋时的镇戎军,均直通西夏王国。在这里历代设城,既可以防边,又可以当扼控丝路咽喉,同时又能安抚边僻,控制要冲,阻止明珠、灭臧、康奴三族由此二川进入西夏勾结。在药葫芦城西北3公里处,有一台地名徐家台,今名徐台,这与《辑志》记载相吻合。同时,此城东2公里处有一座古城,城墙部分保存很好,出土西夏黑釉梅点瓷碟、宋金时期的遗物甚多,当地人都称元昊城,这个村子也叫元昊自然村,相传是西夏元昊入侵这里而建的屯兵古城。由此推断,药葫芦城极可能就是北宋时期的细腰葫芦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讹传为药葫芦城。

殷家城古城

殷家城古城址位于殷家城乡殷家城行政村转水河自然村西500米处的城台上,东接桑树洼沟,南临白家川河,西接李河,北靠城梁山。本次调查城址南北长700米,东西宽40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此城年久废弃,残塌不齐。它与华池东寨、华池县城壕乡石咀子骆驼城建筑形式十分相似,都依山而建,三面临河及沟,地势险要。西北侧有一小瓮城,仍依稀可辨。现残存东侧半山要城墙长200米,高2-5米,宽4-5米;西墙残长100米,残高5-6米,底宽2-4米,夯层厚0.10-0.18米;南侧西角残存墙体40米,呈锯齿状;北侧残墙长100米,高6米,底宽5米,顶宽3米,保存完整,夯层清晰0.12-0.21米;其余城墙均被夷为平地,墙基隐约可见。采集到标本有黑釉、青釉、折沿灰陶盆等器物残片等,曾出土青釉瓷碗等器物。《辑志》载:“县西北一百二十里,在今半坡刘家,城存。相传魏虎二大破殷天龙于此,其第犹有魏虎儿石像。今殷家城地。”此城位于白家川,西北与环县接壤,东距药葫芦咀城30公里,在宋代地处环州与镇戎军的交界地带,面积十分庞大,应该是一处十分重要的城堡,具有一定的防御西夏入侵作用。北宋时,西夏国崛起威胁北宋,为了抵御西夏南侵,宋王朝在环州、原州、镇戎军交界处选地势险要而宽敞的地段筑军城堡寨,主要是为了加强防守。

开边古城

开边古城位于开边镇开边行政村城子自然村街道南边。东至城壕,南依茹河,西邻秦家沟,北靠秦家岗。本次调查城址东西宽约200米,南北长约600米,面积约12万平方米。此城平面呈长方形,地势较平坦,城墙破坏严重,均为黄土夯筑而成,东、西有门,形制清楚。现残存东侧城墙,断断续续,长60米,高10米,宽4-6米,夯层清晰,厚0.12-0.21米,中间有一城门,形制清楚,城壕宽20米,深2-3米。西侧墙坍塌呈土垄或土堆状,残长300米,中间有一豁口,城壕宽18米,深1-2米,现成土路。南侧城墙破坏只剩墙基,以河为畔;北侧城墙残存80米,高2.8米,宽3-4米,夯层清晰。在城内拣到大量青釉、黑釉、白釉、褐釉瓷片、雨点纹灰陶残片等,曾出土耀州窑青釉瓷碗、碟等

器物。《辑志》载：“县川西三十里，即宋开边寨。城尚存，当地人犹名其地曰开边。宋熙宁二年（1069年）并入新门寨。明改镇，今废。”《辑志》中城址的记载与现存名称和地理位置相吻合，此古城是北宋原州临泾县所辖的五寨之首，东距彭阳故城50多公里，凡过往者必须经过此城，是宋代“茹河道”上通往宁夏固原的重要驿站和城堡。

新城古城

新城古城位于新城乡新城行政村下壕自然村乡政府东100米处的原面中心。东、西、南临耕地，北邻乡政府。本次调查城址东西长600米，南北宽35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此城平面呈长方形，地势平坦，城墙保存较好，均为黄土夯筑而成，东、西有门，形制清楚。现残存东、南、西城墙长共1200多米，残高0.80—6米，底宽4—5米，顶宽1.5—2米，夯层厚0.12—0.21米，其余城墙被夷为平地，部分可见基部。北墙破坏无存，东、南、西角墩保存较好，呈馒头形，高3—7米，南墙马面保存较好，形制可辨。采集到标本有宋代灰陶盆口沿、绿釉印花瓷碗、明代黑釉瓷碗、清代青花瓷碗等残片，曾出土耀州窑青釉瓷碗、黑釉梅瓶等器物。《辑志》载：“县西六十里，城尚存。宋种师道督诸道兵城席苇平（考《慕志》即新城，后赐名靖夏），与夏人战于葫芦河浒即此。宋为镇，熙宁三年省截原载入焉，后为驿，今复镇。”此城是北宋原州临泾县管辖的二镇之首，南紧邻泾州，向西15公里处为宋代曹城古城（寨），西直通固原，沿线发现许多汉、宋、明代烽火台，主要防止匈奴、西夏入侵，可见它在北宋原州时的防御体系里具有重要战略作用，随后元明清延用过，是一座具有较高历史、考古价值的军事重镇。

北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宋夏之间爆发全面战争。为扭转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北宋在西北沿边采取了多项措施。其中，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的进筑战略，在巩固边防、抵御西夏进攻方面，收效最为显著。范仲淹等人不仅积极建

言献策，而且身体力行，在北宋西北沿边进筑战略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范仲淹知庆州时，深入了解地方情况，进行重新布防，要求沿边各地尽快修筑城、寨、堡，而且要步步为营，不能建立孤城，防止被动挨打的局面。从而形成了城、堡、寨、墩相呼应的防御体系，使沿边守军具备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可靠据点。西北沿边的原州、环庆、泾原等地处黄土高原之上，这里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多险关要隘。这种地形，特别适宜于修筑城寨以控制交通要道，进而扼守西夏入侵路径，使其无法长驱直入。实际上，这些城寨多位于险隘关口、交通要道、蕃部聚居区，其作用远不止控制交通要道。这些堡寨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史念海先生直接指出：“这些堡寨实际就是关隘，扼守着西夏向东南进攻的要道。”同时为了加强各城寨之间的联系，沿边各地还修筑了大量烽火墩。通过精心布局，城寨之间形成了坚固完整的作战体系。这些城寨，进可相互策应、主动出击西夏，退可对其进行警戒、监视，还可以方便地进行必要的补充与休整，从此以后西北边防实力因此显著增强。

镇原境内的这些城堡因宋夏之间的敌对关系或被重视或新修建，而对这些城寨的有效经营也就形成了北宋王朝抵抗西夏入侵的一道又一道屏障。这些城址大部分在河谷川台地的最窄处、最险处，并选择一面依山，三面临河（沟），取水方便，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修建，这对抵抗西夏侵略、维护和平和保境安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除上述所述城堡之外，在镇原还发现宋代大量堡寨遗址，城堡如庙渠乡芦家山堡、三岔镇乱山梁堡等；寨子如新城乡杜寨、闫寨、小寨、大寨、孟寨、巨寨、彭寨、孟坝镇周寨、庙渠乡孙寨、张寨和著名的三川寨等；城址如新城乡曹城、方山乡耳垛城等，而这些城寨的产生或多或少与宋夏战争有关，这有待以后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从而为研究原州及北宋时期西北边防军事防御体系提供详实的考古资料。

（作者单位：镇原县政协文史委）

仙姑和仙姑寺

牛学伟

在河西走廊中段，黑河与合黎山蜿蜒交汇的地方，深藏着一座历史悠久，气势恢宏，香火鼎盛的佛道古宇，这就是闻名河西两千余年的古刹仙姑寺。它比建于西夏永安元年(1098年)的张掖大佛寺还早1200多年。

仙姑寺始称仙姑庙。北凉时称仙姑寺，北魏时称仙姑庙，至明清，民间也称仙姑庙为“奶奶庙”。历代庙寺混称，这称谓也和各个时代的政治相联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道的尊重和认知。

亘古以来，由于诸多民族争夺河西互相征伐，仙姑寺几经兴衰，数易其址。今天的仙姑寺，坐落在明清旧址，临泽县板桥镇东柳村一隅的大漠绿洲中，修葺重建于二十世纪末。其规模、布局、建筑风格、雕塑彩绘，供奉神位，均融合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基调，充分展示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民族心态和河西走廊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色，而“仙姑”的传说更展现了河西民族共同的精神崇拜，造就了仙姑寺久经不衰，香火兴旺，闻名遐迩，多民族共同敬仰的历史文化地位。

笔者认为，研究梳理仙姑和仙姑寺的历史脉络，对于加快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建设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何仙姑是汉族民间传说中八仙之一，她苦修积善才修炼成仙，是世传八仙中唯一的女性。原型为一个容貌非凡的女性，经常手持荷花。她的身世有多种说法，其中在流传比较多的故事中，除广东增城说之外，还有广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等多种说法，相传于北宋时期聚仙会时应铁拐李之邀在石笋山列入八仙。令人遗憾的是河西版的何仙姑却往往被人忽视而湮没在岁月的风尘中。

根据民间传说和成书于明末的《敕封平天仙姑宝卷》，后由清初金城(兰州)的谢廪编辑整理，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刊刻发行。方步和先生对《敕封平天仙姑宝卷》真本做了校注研究。他认为，《平天仙姑宝卷》系据临泽县板桥镇一代民间宗教平天仙姑的传说和神异事迹编辑而成，它是河西地区为数不多的土生土长的宝卷之一。《平天仙姑宝卷》曲折地反映了明代河西地区的历史和风情，点出了仙姑庙(寺)始建缘起。原张掖市委宣传部徐永成主编的《金张掖宝卷》中《仙姑宝卷》也说平天仙姑本为东岳泰山青阳宫内仙女，前去西方显化，普渡众生，在现今板桥一带为方便人们过河往来，苦修板桥，感动黎山老母，受黎山老母点化，在合黎山修道，修道将成，一天见河水猛涨，自己所建板桥将被冲毁，便坐在一块即将被冲毁的木板上，逆流而上。仙姑随水而逝，脱凡胎于板桥西十之以外沙滩之上，土人感其恩德，建庙祀奉。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奉命率兵西征匈奴，得仙姑护佑，霍去病得胜回朝奏明汉武帝，武帝封仙姑为“平天仙姑”，传令“大其庙”，再塑金身。据一些年事稍高的人介绍，今天在甘肃古浪、凉州等地也早有有识之士抢救整理《敕封平天仙姑宝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日寇侵华时期，由乡绅出资，在古浪昌灵山建有平天仙姑庙敬奉仙姑。此庙后来毁于文革时期，今遗迹尚存。可见仙姑传说影响之广，宗教情怀由来已久。

历史回眸，与仙姑传说发源地板桥一河之隔的昭武(今鸭暖乡昭武村)是古代月氏人的都城。据《穆天子传》记载，月氏人是秦汉时期从雁门关

西迁到河西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月氏人是“鄂尔多斯”的后裔，最早住在鄂尔多斯。在史前时期，一支东徙中原，一支西徙甘肃，还有一部分西徙到塔里木盆地。春秋时叫“禺知”，秦汉时叫月氏。《张掖史略》也说，月氏人应该是河西的老住户，特别崇信佛教，曾创造了影响世界的犍陀罗艺术。由此可见，月氏人在河西活动时期无疑已经将宗教信仰植入了当地人民心中。据民国三十一年创修《临泽县志》载，县内尚存寺庙道观 25 处之多，而仙姑寺就是其中之一。

谈到仙姑寺，就不得不说仙姑的由来。仙姑究其所来，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甘州府志·仙释》记载，说仙姑，不知道姓氏，在今张掖黑河北岸合黎山修道。目睹黑河水泛滥，发誓要在黑河上建一座桥，方便当地老百姓出行。并对人讲，桥建成的那一天，就是我成道的日子。没过多长时间，桥成之日仙姑淹死在黑河中，羽化在一块片木上，在今仙姑庙附近的黑河上漂泊。许多天过去，鸢鸟不侵，香飘数里外，当地人埋葬时发现一铁片上有“平天仙姑”字样，便为仙姑立了庙。

还有一种说法出自《仙姑宝卷》，说平天仙姑在现今临泽县板桥镇修炼成仙，土人感其恩德，建庙祀奉。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元狩三年（前 120 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奉命率兵西征匈奴，班师返回时被黑河所阻，匈奴浑邪王率精骑数万追袭。霍去病正在彷徨着急的时候，忽见对面河岸上坐一妇人，用手一指，黑河上便有了一座宽绰的桥梁，霍去病带领三军迅速过桥。匈奴兵紧追而至，走到河心，水大浪急，把匈奴人马冲去大半，霍去病得胜回朝奏明汉武帝，汉武封仙姑为“平天仙姑”，传令“大其庙”，再塑金身。

而据民间传说，仙姑原系西汉张掖郡人氏，姓何，其父为郡守部下一武吏，因对夷交战失利削职为民，便带独生女仙姑隐居在现临泽合黎山下改行行医。聪慧的仙姑随父潜心学医，利用针灸和中草药为穷苦百姓治病消灾，深得民心，在板桥一带名声远播。黑河南岸的民众，慕仙姑医术高明，也常到北岸向何氏父女求医治病，但苦于黑河水旺，波涛汹涌，人畜淹死者无数，仙姑立志在黑河架桥

一座，方便南北交通，造福两岸百姓。当时，匈奴人盘踞邻近的内蒙古大草原，冬春之际，驱牛羊骆驼在黑河饮水，偶有病患者也到何氏父女处求医。父女俩不仅是河西内地穷苦人家的消灾救难者，连匈奴人也对何氏父女敬仰十分。后来仙姑立志在黑河架桥，桥成之日，羽化成仙。众乡邻为感念仙姑的恩德，遂在河北一沙丘立庙祭祀。

还有一说。一年秋季，匈奴右地王爷爱子四王子，奉父命到黑河南岸以牛羊贸易粮食、茶叶、瓷器，返回时四王子不慎自船上跌入黑河，船老大相救出水，经何氏父女拯救复生，王爷以重金相谢，何氏父女对金银坚辞不受，道出了欲在黑河建桥但缺乏木料的难处。该王因黑河缺桥险失爱子，鼎力支持何氏父女修桥梁便交通的美意。何氏父女深受鼓舞，昭示民众共同为修黑河桥出力。数年之后，两岸百姓准备大量修桥钱物，匈奴王子又派人自东大山运来百棵松木，解决了极其珍贵的桥梁之材。正待动手修桥，昭武通司看出修桥有油水可捞，特别看准何氏父女是摇钱树，以阻挠修桥为手段，胁迫仙姑嫁与其子。以造福百姓为宏愿的仙姑，为实现修桥的目的，口头答应桥成之日与昭武通司之子成婚。黑河桥竣工之日，昭武通司前来逼婚，仙姑了却了心愿，投河自尽。黑河两岸的百姓包括邻近的匈奴为纪念仙姑功德，在板桥柳树堡（现古长城以北）建庙一座，取名“仙姑庙”。这一叙述与《甘州府志·仙释》记载不谋而合。何仙姑的称谓也由此产生。

那么，何仙姑的何姓是否是无源之水呢？《百家姓》中说，西北的游牧部落“昭武九姓”中，有一支建立了何国，这个国家的人后来就以原国名为姓，并融入了汉族何姓中。根据《隋书》，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支庶各分王，以昭武为姓。汉文史籍称其原住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走，西迁中亚河中地区，枝庶分王，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今天，在仙姑寺毗邻的板桥镇西柳村还有大量何姓居民。可见，民间称仙姑姓何也就不足为怪了。

凡此种种，都说明仙姑和仙姑寺与河西人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说到仙姑寺的始建时间，根据临泽县档案局编修的《香古寺史话》记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40年），属于匈奴驻牧之地的昭武人募资为在黑河之上造桥的何氏女子建庙。因其得道升仙，民间称其为“仙姑”，庙号“仙姑庙”。到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奉命率兵西征，得仙姑护佑，班师得胜回朝奏明武帝，武帝封仙姑为“平天仙姑”，传令“大其庙”，再塑金身。

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据可靠文献记载，仙姑寺历经万历六年、天启三年、民国八年和民国十四年四次大规模的修缮和维护。而民间传说和野史记载的修缮就更多了。

明弘治年间，匈奴窥见河西丰饶，予谋进犯，一群匈奴士兵从仙姑庙前经过，忽闻庙内有刀枪剑戟之声，以为内有伏兵，遂点火烧庙，仓皇逃窜，未伤我内地一草一木。附近百姓因娘娘救了一方民众，又为娘娘新修庙宇，但规模较小。至嘉庆十七年间，巡抚杨博巡视边关，自仙姑庙经过，忽闻仙乐缭绕，半空中似有笙箫细吹细唱，举目仰望，云端里立一位头戴缨络风冠，身穿五色霞帔的女菩萨，渐渐升天而去。杨博回到衙中，方知此地有仙姑庙一座，供奉仙姑娘娘，感应灵验，遂到庙中一游。进得庙来，但见娘娘神像与空中所见无二，方信此庙威灵。因见庙宇矮小，发愿心捐赠银两，将仙姑庙重新修盖一番。

嘉靖四十三年，昔日烧庙匈奴又来侵犯边关。走到仙姑庙，见所烧之庙不仅存在，且比原来更为森严，未闻当年剑戟之声，断定内无伏兵，便进庙探视，点燃殿中宝帐匾牌，眼看中梁着火，方出庙安营扎寨。将至半夜，只见月星隐曜，阴云四合，伸手不见五指。忽听营外喊声四起，杀声震天，似有千军万马从天而降，吓得匈奴人不及甲，马不及鞍，纷纷提刀拿枪乱砍乱杀，至天色微明，才发现不见一个汉兵，大半夜都是匈奴人自相残杀，死者不计其数，匈奴方知仙姑娘娘显圣，遂不敢再来犯汉家边界，仙姑庙从此只有扩建修善，积淀起洋洋大观。

据仙姑庙碑文记载，明万历年间，抚台大司马候公巡视河西，到仙姑庙内，阅匾牌宝帐，读碑文记实，对仙姑肃然起敬，公见庙宇狭小，不足敬仰之意，委托平川守备王经，续建禅房三间，厢房四间，山门一座，并予彩绘美化，还令其随从卫兵在庙内外空地栽植树木。天启三年，守备徐承业谒仙姑庙，见庙宇颓废，募化艰难，许公拿自己的俸银，雇用民夫，创修正殿一座，抱厦三间，重建土地山神二祠，并立碑坊石碣。天启四年，甘州巡道郭总兵求子应验，为仙姑庙增修前殿。崇祯九年，巡抚白某，求娘娘保佑爱女，如愿以遂，又发愿捐奉为仙姑庙增修配殿三间。仙姑庙大规模修缮于1919年，时主持韩道士请来张掖巧匠杨泽，泥木工、塑匠、画师共四十多人，临泽全县分区、乡、保、甲抽派民夫；县境以内三十六渠，摊派木料，重修了仙姑殿和三佛殿及殿堂厢房，山门碑坊一一进行修葺，历时三载，于1921年竣工。开光之日，张掖名士杨子和敬奉一米五高的铁铸狮子一对，立于仙姑殿两侧，仙姑庙一成大统，誉满河西。只可惜，这座历经2000余年，荟萃了七朝八代的闻名西部边陲的两千年古刹，于1952年在破除迷信的浪潮中予以拆毁。今人闻之，如不扼腕相惜。

“玄奘西去足迹留寺沐法雨，罗什东来舍利藏塔播佛音。”在仙姑寺数千年的还有两件事不得不提。北凉时期鸠摩罗什在此译经数年，从此香火日盛一日。弘始十五年（公元413年）大师在长安圆寂，有老僧奉请师牙舍利意欲返回西域，行至临泽昭武地方，老僧病故，当地人遂留大师牙舍利建塔供奉。正所谓“西域得真传系心华夏，北凉播慧根留迹板桥”。后塔毁人亡，遗迹渺然。今天在仙姑寺后矗立的鸠摩罗什舍利牙塔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十方信众重新筹资兴建的。游人每每至此，无不顿生敬仰之情。另一件是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秋天，玄奘西去天竺取经，前后17年，往返之中曾两度滞留仙姑庙（寺），讲经说法，留下了千古美谈。如今在仙姑寺附近还有凉经台、牛魔王洞、火焰山、高老庄等与《西游记》十分吻合的遗迹，令人回味，令人感慨。

千百年来，尽管仙姑庙（寺）的兴衰更迭，屡毁

屡建，但仙姑始终是临泽乃至河西人民心中不灭的神祇，是他们最亲近的精神寄托和信仰追求。

除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敕封仙姑为“平天仙姑”，颇具道教色彩外，西夏国主李仁孝乾祐七年(1182年)在其之下的黑河修桥一座，并立《黑水河建桥敕》碑。其敕曰：“敕镇夷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显隐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昔贤觉圣光菩萨哀悯此河年年暴涨，飘荡人畜，故以大慈悲兴建此桥。”碑文中又称仙姑为“贤觉圣光菩萨”，这一赐封就更具佛教色彩了。一个民间女子，何仙姑在其两千多年的演化中两度受到帝王溢号追荐，实属不易。

明万历丁丑年(1577年)，巡抚大司马侯东莱修庙《碑记》载，“甘镇北堡，名曰板桥，境外庙曰仙姑”。清朝时期，“平天仙姑”信仰更加兴盛起来。乾隆年间钟赓起编纂的《甘州府志·杂纂》在多处地方从不同侧面对仙姑和仙姑庙进行了记载，说明仙姑信仰的影响在当时是很大的。这一时期，仙姑信仰已经超越出临泽板桥的范围，甘州城、肃州城均出现了仙姑楼、仙姑庙。平川之仙姑庙，更有蒙古族头人敬献的匾额，堆积悬挂，仙姑的信仰已超出了民族的界限，被附近的蒙古族人民和其它少数民族群众所接受。文人骚客和诗人笔下也出现了不少对仙姑楼、仙姑事迹、板桥等的描写，《甘州府志·艺文下》记载的有陈宏德的《题仙姑楼》、杨

楷的《题仙姑庙四首》、乔彦的《仙姑板桥》，特别是自《仙姑宝卷》形成以后，由于其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民众中广泛传播，逐渐取代了原来的仙姑传说，对后来的信众产生了深刻影响。民国乃至文革时期，仙姑的信仰一直延续不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为了恢复临泽佛寺文化，有识之士发心在仙姑庙原址筹资修建了寺院。受当时保守思想的束缚，人们一方面想要延续仙姑文化，另一方面又怕背负封建迷信的嫌疑，于是就把在仙姑庙原址新建的寺院取名香古寺，既有仙姑的谐音，又巧妙地规避了复古的责难，也算是聪明之举。

直到今天，仙姑承载的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嫉恶如仇、舍身成仁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追求依然为人们所称道。同样的，仙姑寺虽然更名为香古寺，但作为佛教圣地和旅游景点，人们欣赏和品味的依然是仙姑故事和仙姑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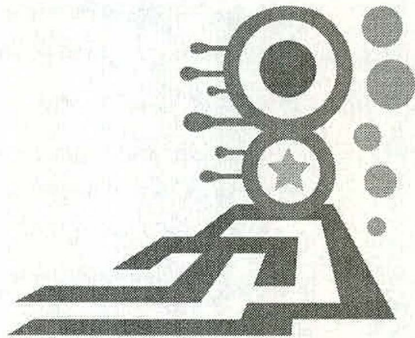
行文至此，笔者认为，作为仙姑文化的重要载体，香古寺应该还原它本有的面貌。作为仙姑的故乡，临泽应该把仙姑作为一张重要的名片，广泛传播。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各界有识之士的挖掘整理，临泽这个仙姑故土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建设中还能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单位：临泽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解读罗川

张芹鹤



如果将正宁看作是一部著作的话，罗川当是他的精华所在。穿过罗川街道，站在城东门，直面小河口，一川清凉的风吹来，你的思维禁不住又一次梦回大唐！风流皇帝李隆基的一阙清梦，引起了一座道观的肇造；27具精雕细磨、栩栩如生的真人（道士神仙分为九品，第六品即为真人）石像，和一具心星造像，共28尊，成了这位皇帝一时的通灵圣物；更成了这个偏僻山川里一件超乎寻常的神秘大事。这就是由大唐朝廷颁旨，在真宁县罗川营造的通圣观，以及内面的陈设供奉乃至由来。

到了宋代，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对道教更加重视，亲自导演“天书崇祀”；要人们相信大宋政权是秉承“天命”的；在宋朝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同样由朝廷颁旨重修通圣观，改名承天观，并立承天观碑。特别一提的是由当朝朝散大夫行尚书兵部员外郎李维（河北人，北宋学者、诗人，曾修续通典《册府元龟》等）奉敕撰写的碑文，这篇碑文如果纳入县域文化史来评估，可以算作是正宁哲学史、文学史的发端之作，典范之作。碑文的用意很明显，有传道的功用，多誉政的色彩。作者知识的博大深邃，自成一统；观点的鲜明透彻，至情至理；语言的概括包容，精练自如，让人一读再读，都觉得余味无穷。再加上此类文体，用赋体，讲究大肆铺陈，大量用典，虚拟夸张在所难免；因此，令人读之，领略、意会、品味的地方居多，而要明白无误，有着真实的难度。全文为5段，从文脉体察，属一气呵成。一段，揭示道教的哲学意义，引出宋真宗对于道教的偏好与崇尚；如“王者得之，而垂拱之化光；百姓用之，而厚生之理遂。”宋真宗这样做的结果，是“自兹厥后，祠宇相望”。二段，点明承天观的由来，人文地理环境，和宋真宗重修此观的真实

用途；“兹县据罗川之上游，实彭原之属邑。气象葱蔚，原隰隐辘。人敦忠义之风，俗勤稼穡之事。轩丘在望，乃有熊得道之乡；豳土画疆，本公刘积德之地。真灵之所翔集，禎祺之所保绥。”对正宁人文历史，地理环境的描述，至精至妙，无以复加，回视关乎正宁的这类结论，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难怪涉及正宁的历史解说，用上这几句话，就是封山之作。评价宋真宗此举，“屡下宽大之诏，聿开疏阔之纲。德洋恩溥，仁洽道丰。远无不怀，迹无不肃。动植咸遂，人神以和”。三段，记述承天观的修葺过程，建筑规模，殿堂陈列，恢弘气象。四段，记述承天观修葺完工后的祭祀流程和壮观情景；5段，用铭文再次阐扬修葺承天观的在世功用和意义。如“集灵之地，实曰罗川。风俗淳厚，原隰绵延。灵宇斯启，彤彩相鲜。年祀寝远，余基岿然。帝宋膺期，惟天所授”。李维在这篇碑文中，对天地人神之间的神秘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解说，这种解说，要从今天的角度去认识，仍是科学的，即遵从自然，遵循规律，讲德修睦，和谐发展。一句话，草木荣枯，万物统分，社会兴衰，人事代谢，有其内在的因果关系。此文的磅礴之势，百年以下，仍是罗川值得解读的一个所在。

明代的一个人，根植罗川，又荣耀罗川，和一棵“亭亭上特，势若参天”古柏“物我同体”，值得追念，值得解读。此人便是赵邦清（1558—1622年），明真宁县人，曾任山东滕县知县、吏部稽勋司郎中等职。因为为官清正廉洁，不畏权贵，疾恶如仇，秉公执法；教民稼穡，兴修水利，倡导种树，广栽桑枣，重视教育，大办学馆……滕县给他建有生人祠，罗川给他立有石碑坊。赵邦清为官之前，是一个由儒文化煎熬出来的文化人；他为官之后，仍旧

脱不了这个清正有为的文化人的底色。他一生留世作品有《鹤唳草》《瞑眩录》《游艺海纳集》《梦遇仙记》《神柏记》。单从《游艺海纳集》所记内容中，可了解到赵邦清的为学不易。赵邦清8岁时，从邻村巩守谦学，及能成篇，从巩裕斋学，继从李崇岗学。大约15岁，从巩寿峰先生学，学举业。后从三水文少白先生学，“闭户岁余，饥寒侵肤，苦极性灵，坎离交媾，悟门顿开，举业始有入处”。及文少白赴京师补官，他又拜付逊斋为师，后又从李克庵为师。立德立学，均有精进。科举考试，的确在《四书》《五经》中兜圈子。不过，赵邦清，潜心攻读，虚心请教，刻苦磨练，万历十九年中举，次年中进士，34岁，登堂入室，还算走的顺利。他在《游艺海纳集》写到“夫国朝设科取士，虽孔孟在，今日必从此出身。故举业不精，是不忠也。邦清随笔日所闻于师友者，集为一帙，名曰《游艺海纳》，未有附以己意，敢自曰：‘我心如海，能纳万善’。”因此，这个集子里，一些师友的做人、作文、做事、处世，以至科考的观点和方法都了无遗漏地做了记载。如文少白先生曰：“作文之法，须宏达深入，宏大，则气象不小；深入，则以我之身直钻入题目内面去发挥，岂有不透彻的。盖题须讲开，方才有许多意味。若只求干净，恐家数狭隘，纵是金玉之句，亦不济事。”李克庵先生曰：“作文之法在不俗、不冗、不浮、不泛，不学套作。题目大了，时时要剂量轩轻。”赵邦清自己总结：“欲做天下真事业，须从天下真学问中来。所谓真学问者，乃性命一件大事。”他对古今政情作以比较，他对自己的作为做了反省，其愤世嫉俗，憎恶贪腐的心情溢于言表。文友杜春芳在《游艺海纳后序》中指出“其为文也，不饰章绘句而理自工，不标门立户而辞自畅，发之于节义。”“余亲见先生手无三分银，悠然自得，不怨不尤，一切尘嚣利名生死皆扫空而之。”他想将此文集留于后人，留给子孙。正如自序中最后一句“聊为子孙举业性命之式”。当时的地方文化人朱芸在《游艺海纳序》中，不胜感慨“今先生道德性命无不窥，文章政事靡不卓绝，而且缙绅、先生、长老靡不师，倘所称虚，受益成其大者。”也就是说，赵邦清一生，将文章、节义、政事统一了起来，其功业和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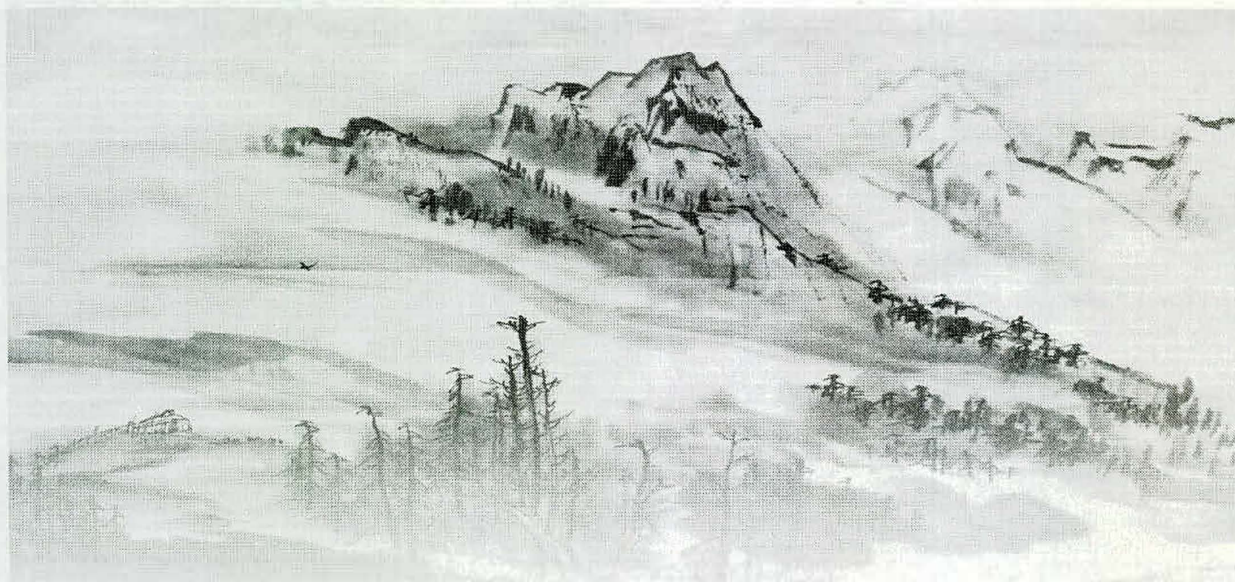
均自成一格，达到了他人所不能比拟的高度。他是不满意的，一息尚存，积极用世。本来就贫病交加了，一俟朝廷起用，便奉诏出任四川遵义道监军参议，病死军中。我望着清官坊上“孤清震世”的评价，心里想，他是用自个儿的性命挣来的，不是欺世盗名，用民脂民膏在官府里买来的。此等文化人，当为同道之高标，万世之楷模，当不为过！

另有一人，在罗川这个偏狭一隅，完成了他人生的建树，特为重要的，是为正宁文化做成了一道大餐。折遇兰，清山西阳曲县人，政治家，学者。乾隆二十五年进士。二十六年（1761年）任正宁知县，编修《正宁县志》18卷，凡32目，14万言。此志是迄今编纂的庆阳境内所有县志中的殊上乘之作。吴一嵩为此志所撰序中，评价折遇兰“奋然有志，于此远稽近考，目涉手批，自出一家言，编而成帙……见其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其中叙事属辞，悉皆整而不烦，雅而不俗，书不失实，质不掩文。或序论以开先，或评断于篇后，无不折衷至是，订正无讹。上下数千年沿革建置之纷，山川人物之备，风俗土产之别，政教祥眚之征，莫不灿若列眉，了如指掌。不禁喟然叹曰：‘折君其良吏而兼良史者乎！’君以山右少年，联捷科第一，行做吏，岁甫二周，道齐有方，教养兼举，民安治理，士沐熏陶，津津乎誉著，循能歌兴父母，固已功懋一时矣。乃复于簿书之暇，珥笔汗青，将正邑之前后古今，洪纤巨细，靡不阐扬美善，记载详明，事则继往开来，文可信今传后，成足以光！”折遇兰才识过人，儒学功力深厚，文笔纵横捭阖，在县志的章前小序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成了这部志书的鲜亮之笔。他在地理志第三小目《坊表》后用按语形式评点：“小邑文献销沉，断简残编，杳无所据，如《旧志》所载，不过本诸父老之传闻，略存大概而已。兹旁搜远讨，一名一物必穷源竟委，上下千百年，以供考证。”可见他治学的严谨和一丝不苟。他的文笔洗练，状写描摹，尽显不凡功力。县志中用“县东西两川，约长六十余里，阔二三里不等。罗水衍其中，南北叠起土冈，互相掩映。行至冈顶，忽然平原开阔，一望无际，往来通车辙”。“县北两峰对峙，势若耸肩，一涧中通，窈然而幽，豁然而开。县治适当洞口，登高视

之,如骊龙抱珠,在即离吞吐间”。“县南琴山,东至势欲西去,忽群峰向西逶迤,百折而来,至泰山,一峰陡落,与琴山作摩荡脱卸之状”。“县治二三里,山岗环列,层包叠裹,惟局面不甚开阔。且罗水西去,一往不顾,少回环,旋绕之”。对于清时罗川县治周遭地理环境的描述,精当准确,恰如其分,此种春秋笔法,让人品味不尽,借鉴不尽,感叹万千。再如《重建罗川书院碑记》,开篇气势非凡,用名木瑰宝作类比,“千寻之木非斧凿不备栋梁之选,万镒之宝非雕琢不扬球璧之辉,绝俗之材非媠修不窥圣贤之奥,人才盛衰视乎学校隆替,岂偶然哉?”然后用纪实笔法,记述罗川书院颓废荒芜,重修结果,周边环境。再记述招生授课的思索和情景。亲自对学子讲到:“儒者学道如器然,必隆然大而后可以有容;如墙然,必广其基而后可以有蔽”。接着由近到远,边叙边议,“方今圣天子崇儒重道,上自辟雍,下迄胶序,菁莪朴棫,振古未有。正宁僻居湫隘,无荐绅先生倡之于前,后生小子无所适从,如

木之混于麓,玉之杂于石。委而弃之,散樗耳,瓦砾耳。今诸生从名师学习,日有程,月有课。陶铸于道德之府,渔猎于艺苑之圃,谐今而嗜古,周规而折矩。”对当地人才的成长充满信心并热情展望。他任正宁知县两年,此地“地僻凉侵梦,天高露湿衣”,交通闭塞,民众贫苦,官衙清寂,官俸微薄,他还周济书院,常常到了“瓶粟从教罄”的地步。仅仅做一个地方知县,都让人感动的。何况他对于正宁文化史的贡献,可如日月昭彰。我站在罗川街道西侧,望着当年折遇兰君“骑驴上北坡”的北坡早已成了国家二级公路;他常常为之“叹息肠内热”的罗川民众,产业升级,生活优裕,纷纷住进了小康农宅;他感叹不已的“一生唯我拙,百代谁更论”,让我这个半拉子文人爱慕不已,崇敬不已,恨不能击节而歌;我把罗川秋天的丰饶献给你吧,献给你腾飞不息的文化魂魄!

(作者单位:正宁县委党校)



江西古戏台的乡土社会

杨沂柳

【摘要】江西古戏台主要分布在以乐平和弋阳为代表的赣东北地区。赣剧起源于“弋阳腔”，“乐平腔”又是赣剧的主要支派。随着戏曲兴起和流传，古戏台应运而生，并随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中，成为乡土社会人民主要的娱乐方式，并推动着乡土社会的文化、艺术发展。本文将从江西古戏台的分布、种类，来探究古戏台的源流、古戏台与地方戏的关系，以及在乡土社会中的所发挥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古戏台 地方戏 乡土社会 功能

自古以来，江西被誉为“人杰地灵”，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留下了浩瀚的文化遗产，其中境内迄今存在着众多的古戏台。古戏台飞檐翘角，金碧辉煌，气势恢宏，遍饰戏文浮雕，是融建筑、雕刻、绘画、楹联、书法、民俗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历史遗产，堪称古代民间祭祀欢庆舞台的“活化石”。

一、江西古戏台的分布和分类

江西是中国南方地区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份之一，仅乐平市尚存古戏台 412 座，被誉为“中国古戏台博物馆”。乐平古戏台以其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文化内蕴蜚声海内外，是独特的历史文化瑰宝和优秀的人文遗产。古戏台的建筑结构在宋元时期以勾栏剧场和神庙舞亭式建筑为主，直到明代之后走向多元化，平面也由原来的正方形变成了更宽的长方形，其发展也是明代戏曲艺术发展的结果。从古戏台的建筑类型和社会功能来看，总体分为三大类：

1. 祠堂戏台。“有宗必有祠，有祠必有台”。祠堂戏台是指坐落于祠堂内，与祠堂建筑连为一体的戏台，它是戏曲文化和宗族意识联姻的产物，将戏曲活动请进了森严壁垒的宗族祠堂。祠堂作为村落中气势最为宏伟的建筑之一，是宗族祭祀祖

先、行使族权的殿堂，在族人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无论是祭祖还是修谱，都必须在宗族首领的策划和组织下有条不紊地在祠堂进行，而连日的戏剧演出，则是将宗族祠堂活动推向高潮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就是要在铿锵的锣鼓声中强化族权、巩固宗法、凝聚族人。祠堂戏台建筑规模庞大，结构繁复，是当时祠堂建筑中最为精美的部分。江西的祠堂戏台在南方戏台中最具代表性，乐平、弋阳、玉山等地的大部分明代戏台都属于这一类。

2. 庙宇戏台。这种戏台是由僧侣募捐或施主还愿集资建造的，是修建在庙宇或庙宇建筑群内，或者修建在庙宇建筑外，但是必须正对着庙宇正殿的戏台统称庙宇戏台。每逢庙会或祭祀，便聘请班社前来演出。明代之后，随着民间宗教的发展，戏台与庙宇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如吉安的大禹庙、泰和的康王庙、上饶的白云殿等，都附有戏台，多为山顶式结构，这些庙宇大多都供奉着城隍、佛道等神像。戏台的演出时间与剧目都是与岁时节令的祭祀赛神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庙宇戏台娱神祭神的同时，又取悦了民众，如果说庙宇是人神沟通的媒介，那么戏台就是人神沟通的桥梁。

3. 万年台。万年台是坐落在村中心广场上的独立建筑，台下基本上不设任何看台设施，人们观戏需自带坐具或站立于风雨之中，易聚易散。万年台结构简单，上无顶棚后无舞台照壁，前为戏台，舞台后部或者旁边拉开帘子就是扮戏房，只有可供上下的台阶，没有神殿与观戏厅等建筑结构，更加注重表演区和观戏区，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更加接近。相比其他类型的戏台，万年台显得朴素、厚实、简陋，它冲破了祠堂太逼仄的束缚和压抑，因而受到更多民众的喜爱。其之所以被命名为万年台，表露了人民对戏曲的迷恋和这种戏台能万世

永存的美好愿景。

4.庭院台。当戏曲成为一种时尚艺术,便被宫廷和大富人家请进了深宅大院,因此,在宫廷和大富人家都建有戏台。这种私人建造的戏台,也称庭院式戏台,在住宅院内形成一个完善的室内剧场,舞台普遍没有顶盖,代表性的有宁王府戏台、益王府戏台、滕王阁戏楼等。这种戏台一般比较大气,演出戏剧规格也较高,赣剧作为一种地方大戏,常在这类戏台上演出。

5.会馆台。会馆台是戏曲文化和商贸活动联姻的产物,演出活动和商贸活动血肉相连。商人建会馆内,聘班演出,广泛联络同乡同行,畅谈商贸。如徽州会馆戏台,抚州会馆戏台等。

二、古戏台与地方戏的起落兴衰

赣东北有着悠悠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史。在宋朝,随着政治重心的南移,江右战略地位明显提高,这里的经济、文化也发生巨变,出现了“王侯将相竞相涌现,数百进士层出不穷”的盛况。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戏曲文化的滋生繁衍提供了沃土。

1.弋阳腔的诞生。弋阳腔是中国古老的汉族戏曲声腔,它源于南戏,产生于信州弋阳,形成于元末明初。弋阳腔诞生以后,即以其“杜撰百端”的连台大戏与“错用乡语”的艺术特色,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以其为首,在全国各地组成了庞大的高腔体系,影响着南北十三个省四十几个声腔剧种,推动着中国地方民间戏曲的发展进程。

东晋时期,佛教便传入弋阳。由于弋阳的钟灵毓秀,佛道两教很早就在这里扎根传播,后来还出现了弋阳人崇佛的盛况。宋朝南渡以后,南戏盛行,地处赣东北的弋阳县,为浙、皖、闽交通要冲,常有南戏演出活动。北宋时期,在汴梁流行的中元节演出《目连救母》戏南渡流入江西,立即受到当地乡民的喜爱与欢迎。到了明初,江右商人成为南方最先驰名于全国的大商帮,由江右商帮所建的江西会馆遍及长江流域及各大都市。此时的弋阳腔循着江右商人的商路流向全国。使得明清时期,弋阳腔在南北各地蓬勃发展,成为活跃于民间的主要声腔之一。至今在饶河班的十八本高腔戏

中,在明清戏曲书目中注明为弋阳腔的,就有《珍珠记》《长城记》《清风亭》《十义记》和《摇钱树》等。弋阳腔以擅演鬼怪戏和历史大戏最为有名,这些都是当时的重头戏,对于演出场所的要求也很高。为了方便这些大戏在城乡演出,江西各地大量兴建戏台。

随着弋阳腔的出现,许许多多古朴别致的戏台也应运而生。它们为弋阳腔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使得各地间戏曲艺术的传播和交流更加频繁。明清时期,弋阳腔的发展到了高峰,古戏台的兴建活动也达到了顶峰。由此看出,明代弋阳腔的诞生,成为古戏台涌现的重要推手。

2.乐平腔的发展。明末清初,由于社会动乱,清兵在江西的大屠杀,给弋阳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地从业的艺人骤减,弋阳腔遭到致命的打击,其演出活动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清光绪以后,弋阳县的弋阳腔班社转移到万年、贵溪、乐平一带。清乾隆年间,当流行于大江南北的乱弹腔来到饶河流域时,立即受到了当地民风的熏陶,便形成了地方风味浓郁的饶河戏。随后,与弋阳毗邻的乐平迅速成为饶河戏的流布中心,并使“赣剧以乐平腔之大名称盛一时”。境内班社林立,名伶辈出,班社多达三四十个,艺人两千余名,再加上串堂班、马灯戏,乐平艺人几近四千,而乐平的古戏台则被看做是弋阳腔戏台的缩影。

明王骥德《曲律》卷一“论腔调第十”：“数十年以来,又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之出”。在乐平农村,男女老少几乎都能哼上几段戏文唱腔。每逢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只要有节庆,城乡之间便热腾起来,亲朋好友纷纷赶来看戏。做戏时间少说三五天,多则十天半个月。这种传统民俗文化催生了各种类型的戏台,使得赣剧等地方戏曲在乐平有了更多的展示空间,同时也对赣剧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这是在江西民间广为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再现戏曲在乡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人们对戏曲的热爱。

戏曲在乡民之间越来越受欢迎,促使古戏台

大规模在江西各地开建,这得益于明代之后江西戏曲艺术的发展。从遍布于江西各地的古戏台就可以看出,江西地方戏曲的蓬勃发展和戏曲艺术氛围的浓郁。

三、古戏台的社会功能

随着戏曲在乡民社会中广为流传,古戏台也逐渐成为乡民赖以生存的精神殿堂。它不仅承担着社会教化和文化遗产的功能,还是乡土社会中民间信仰和民风民俗的重要依托。

1.祭祖修谱。宗祠是祖先灵位的安息地,是荣祖敬宗的连结点,一切族中的大事和隆重的春秋祭祀仪式都在宗祠内举行。乡村社会人民非常看重和依赖宗族血缘,主要体现在祭祖和修谱。千百年来,对人们思想和行为占据绝对影响力的是以家族血缘关系演化而发的祖宗崇拜和宗法势力,这种观念滋养出的种种文化现象,诸如对祖先的崇拜,对宗姓的亲,对非我种类的排斥,对儒家文化的执著等等,都有意无意地通过各种仪式和建筑而外化。古戏台便成为乡村社会这种文化现象的具体体现,并能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推陈出新,成为乡民的精神殿堂。

每次谱事和祭祖,都由地位崇高的族人操作,而戏曲演出是所有其间最隆重、最热闹、最壮观的活动,只有伴随谱事而起的戏事,才是人人得以参与的轻松热闹的盛事。在铿锵的锣鼓声中,戏台上下所有乡民狂欢庆祝,并以此来体现宗族在兴旺发达中显现的欢乐祥和,和谐升平。

2.神灵信仰。乡土社会中,人民对宗教神灵、历史人物的信仰崇拜始终居于民间信仰的核心地位。古戏台与敬神祭祀有直接的关联,其最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神灵祭祀。古代社会中,敬神祭祀有两个功能,其一是通过敬奉神灵与祖先,祈求得到他们的保佑以及赐福,祈祷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二是道德教化,即“神道设教”,通过对神灵的敬奉与祭祀而宣扬家国一体、忠孝节义的思想,戏台与敬神祭祀相联系主要从神道设教中体现出来。统治者为了维护现行统治秩序和传统伦理道德,利用鬼神之道对人们进行教化,这

就是神道设教的主旨所在。

3.社会教化。古戏台历经风雨几百年,还能在地方社会中存在和传承下来,不难看出它已然成为文化展演的一种载体。作为乡村社会的文化行为,地方戏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戏曲的社会功能而言,它却以功利为核心,强调的是过程必须负载道德内容。戏台演出的戏剧剧目,多以“礼、义、忠、孝”内容为多。除了上演的剧目,戏台的建筑环境,各种构件装饰题材,也充当了社会教化的道具。戏台的各种装饰雕刻都取材于教化类的戏曲内容,处处显示出社会教化功能。如表现耕读仕进的《渔樵耕读》《连中三元》;表现忠孝节义的《桃园三结义》《岳母刺字》;表现和仁的《八仙过海》《和合二仙》《二十四孝》;表现伦理教化的《五福供寿》《目连救母》等等。历史英雄人物也出现在各种雕刻装饰中,如“七擒孟获”“空城计”等。这些充斥着传统文化题材及戏曲题材的装饰雕刻,其目的在于“借以褒扬孝悌、忠信、仁义,昭示人伦之轨,儒家之礼,实现精神教化,使建筑的精神功能得到了强化,散发出浓厚强烈的封建伦理思想。”古戏台作为文化生态的一种符号,在江西的许多村镇成为社区“文化场”的心理依托之地,也是社区的地理坐标,构成了浓厚的人文意味,为乡村社会增添了更多诗情画意的文化灵气,推动着乡村社会的文化发展。

(作者单位: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西北地区端午汉人门口插柳条考辨

潘硕珍

南宋诗人陆游写道：“忽见家家插杨柳，始知今日是清明。”一般认为，“家家插柳于门，以招子推之魂。”（蔡元放编《东周列国志》）清明插柳之风，兴起于春秋时期，盛行于唐宋。清明节那天，中原地区及南方各地都有在门窗缝隙插柳条的风俗。洮岷地区的民众却于端午节打柳，“五月端午打柳呢，牡丹开在路口呢”（洮岷花儿）。有一首河湟花儿这么唱道：“五月里五端阳，杨柳插在铺门上”（《十二月》），表明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汉族地区）都有端午插柳的风俗。陇南市说春传承人唐东亮唱道：“五月里‘芒种’‘夏至’长，雄黄药酒过端阳；家家门窗插艾柳，无灾无殃人安康。”表明陇南各地过端午节要插柳条。甘南州各地的汉族人过端午节时：“家家门首插杨柳条、艾叶，儿童吊荷包，系束五色花线绳。亲友互送粽子、黏糕、甜醅等。”（《圣洁甘南之文化生态探考》，徐建群、恒考、杨维军编著）岷县与甘南州的临潭、卓尼、迭部三县接壤，民俗非常近似。端午节早晨，第一要事就是折杨柳，插于门窗缝隙，没有柳条的人家差不多信仰别的宗教。其次就是进入树林采集艾叶，挂在屋檐下令其自然风干，既可以灸病，又能做火镰的引燃物。甘肃秦安籍诗人雪潇的诗句“天水五月煮醅折柳”表明天水地区过端午节也有门窗插柳的习俗。清明时节，陇右各地气候寒冷，柳树尚未吐绿，不比贺知章笔下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西北地区端午节插柳于门窗，是在进行纪念介子推的补课吗？依我看，事过境迁，已没有这种必要。国风在其著作《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中写道：“插柳的意图有五点：第一，柳枝可以招魂，插在檐前及门上，使鬼魂知有归依，不致迷途；第二，柳枝可以避鬼或驱鬼，清明时无所归的野鬼甚多，

恐其闯入家里作祟，故悬此以驱之，使其不敢入而避去。第三，柳枝有避毒功能，挥柳可避疫虫。第四，插柳可以预测天气……第五，插了杨柳，可保吉利……”第一、二点陈述，仅适合清明插柳，后三点适合岷地风俗。该书还根据《大戴礼记·夏小正》介绍了端午节的民俗活动：“此日宜乘水临风，采艾、柳、桃、蒲等芳草，揉水煎汤为沐，以求避恶去灾。”又据国风考证，“因柳条常青，戴柳可得青春常驻之效。”有诗为证：“晴日清明暖，长河柳包匀。门娥妆已换，插鬓绿娉新。”因此，甘、青、宁一带的人们，端午节于门窗缝隙插柳的意图是辟邪，而不是纪念介子推。王志艳、张杨主编的《寻找“河西走廊”的足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提到河西走廊一带的端午节风俗为：“是日清晨，家家户户门头插柳枝，有为屈原招魂和避瘟疫之意。”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很有说服力。

四川人在端午节于门窗插柳另有说法：明末清初，张献忠怂恿士兵屠杀无辜百姓，百姓们携儿拖女，哭声载道。张献忠剿杀到安岳的时候，路过安岳的一个村子，看到一个农妇背着一个大男孩，却让一个小女孩自己走路，十分不满地喝问农妇为什么要这样做。农妇就说：她背的男孩是人家的，走路的却是自己亲生女儿。张献忠听了十分高兴，世上有如此善良好心肠的人不多，怎么能杀？便叫农妇赶快回家，在自己的房前窗户上挂上一束柳条，以示区别，避免自己的手下误杀。善良的农妇回家后，便叫村子里的人家家户户窗户前都插上柳条。张献忠军队到时，见家家户户挂柳条，更为农妇的善良所感动，便留下这个村子里的人不杀。那一天恰好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于门户插柳的习俗就流传下来。（《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范勇编著）

（作者单位：甘肃岷县二中）

《红楼梦》里的丧葬习俗

潘硕珍

“《红楼梦》丧事，唯秦可卿最风光，贾敬也算隆重，以贾母之地位，其丧事规格本应在此二人之上，但反不及二人，乃因家败之故。”（刘宏彬点评《红楼梦》）《红楼梦》里的丧葬习俗，遵从西周的礼仪，这可以从贾政的字（存周）得到暗示。其丧葬习俗有以下这么多种：

糊门神 旧俗，有丧事的人家，要用白纸把门神糊起来（防止死人的凶煞冲犯了门神，从此把不住野鬼）。贾母去世的噩耗一传出来，“从荣府大门起至内宅门扇扇大开，一色净白纸糊了……”（第一百一十回）。远在乡下的刘姥姥听说贾母逝世了，放下收割庄稼的伙计，带着外孙女进城瞧瞧，“一径来到后门，见识门神都糊了，我这一唬又不小。”（第一百一十三回里）

传灯照亡 旧时迷信，认为人死后走向冥途，黑暗无边，而佛法能破除黑暗，犹如明灯。《维摩经·菩萨品》：“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因此于人将死时在脚后燃灯以照亡灵，故云传灯照亡。岷地人叫做长明灯，大概由佛前海灯和燃灯佛演化而来。

藉草枕块 睡干草，枕土块，是古时居父母丧的礼节。不理家务的贾敬吃仙丹中毒身亡后，“贾珍、贾蓉此时为礼法所拘，不免在灵旁藉草枕块，恨苦拘丧。”（第六十四回）

伴宿 丧家在出殡的前一夜全家整宿守灵不睡，叫“伴宿”，又称“坐夜”，周礼曰“既夕”。第十四回写到秦可卿的死，出殡前一天，这日伴宿之夕，里面两班小戏，并耍百戏的，与亲朋堂客伴宿的看。第一百一十回写道：“次日乃坐夜之期，更加热闹。”贾母停灵期间，侄孙女史湘云抛下患痲病的丈夫，赶坐夜前一日过来了。此风俗流传至今，死者的亲友们多以打麻将等娱乐活动伴宿。

烧黄昏纸 旧时有丧人家，每天按一定时间在灵前烧纸钱，日落黄昏时烧的那一次，叫“黄昏

纸”。第十三回写道：“戌初烧过黄昏纸，我亲到各处查一遍，回来上夜的交钥匙。”第一百一十回又写道：“只听外头鼓乐一奏，是烧黄昏纸的时候了，大家举起哀来。”岷地人把烧黄昏纸叫做点夜纸，守灵堂的孝子孝女及媳妇们要动哭声。

功服、斩衰及服期间的禁忌 第九十六回写道：“况且贵妃的是虽不禁婚嫁，宝玉应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个月的功服，此时也难娶亲。”功服：丧服的一种。旧时遇有丧事，按宗族关系的远近，规定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不同的丧服，称为五服。功服一般用麻布略加工而成，为堂兄弟、未嫁的堂姊妹、已嫁的姑母等戴孝，均着此服。斩衰主要是子女为父母所服，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种，服期为三年。贾母死后，长子贾赦在外服刑，不能尽长子之孝，“贾政居长，衰麻（丧服胸前所缀的麻布）哭泣，极尽孝子之礼。”（第一百一十回）老人去世后，其子女孙子媳妇们要戴全孝，即浑身缟素。贾母死后，浑身孝服的宝钗，在宝玉眼里仿佛洁白清香的白梅花。由此他突发痴想：“但只这时候若有林妹妹也是这样打扮，又不知怎样的丰韵了！”（第一百一十回）贾政送贾母灵柩出发前，吩咐贾琏：“今年是大比的年头。环儿是有服的，不能入场；兰儿是孙子，服满了也可以考的……”（第一百一十六回）贾环的生母赵姨娘死了，他也得服斩衰，自然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衔口垫背 旧俗，在死者口中放珠玉或米粮叫衔口（亦即饭含）；在死者褥下放钱物叫垫背（岷地风俗：在死者褥子下摆七枚铜钱或硬币成北斗七星，此钱俗称垫背钱）。凤姐道：“我又不等着衔口垫背，忙了什么。”（第七十二回）

铭旌 按死者生前的等级身份制成一面旗，称铭旌，上书“某某之柩”，以竹竿置于堂前西阶上。《周礼·春官·司常》：“大丧供铭旌”。第十三回里，秦可卿死后，“贾珍因想着贾蓉不过是个黄门监

生,灵幡经榜上写时不好看”,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给儿子买了一个功名,榜文大书“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字样,在可卿的灵牌上写着“天朝诰授贾门秦氏恭人之灵位”,出尽了风头。

念祭文 晴雯死后,宝玉写了离骚体的祭文《芙蓉女儿诔》,得到了林黛玉的赞赏。

摔丧驾灵 旧日出殡,将起动棺材时,先由主丧孝子在灵前摔碎瓦盆一只,叫做“摔丧”;主丧孝子亲自抬扶灵柩或牵引灵车叫做“驾灵”。秦可卿死后,“小丫鬟名宝珠者,因见秦氏身无所出,乃甘心愿为义女,暂任摔丧驾灵之任。贾珍喜之不尽,即时传下,从此皆呼宝珠为小姐。”

按七作好事 旧时迷信,认为人死后还会转生。从刚死之日算起,每七天为一期,期满后即再降生;若一期届满未得生缘,须再等一期;最多到第七期,必定降生。由于已从死到再生之间祸福未定,所以死者的亲属每隔七天要设奠一次,请僧道替死者诵经修福,直到七七为止。

解冤洗业醮 一种请僧道设摊念经,祈福消灾的迷信活动。贾珍为儿媳办丧事,停灵长达七七四十九日,在天香楼上设坛场,由九十九位全真道士解冤洗业醮。在贾敬的丧礼上,和尚们进灵堂绕棺,贾宝玉站着,怕和尚们的气味熏了尤二姐和尤三姐这两个尤物。

辞灵 出殡之前,死者亲友向灵柩行礼告别。贾母的灵柩被寄放铁槛寺前,“到二更多天远客去后,便预备辞灵,孝幕内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阵。”

(第一百一十回)

埋葬方式 主要是实行土葬。埋葬之前,先将棺槨寄放在寺庙里,过一段时间再葬埋。安厝:安葬、停柩待葬、暂时浅埋以待改葬均叫安厝,别称厝葬。秦可卿、贾母死后,先不埋葬,而是将灵柩寄放在铁槛寺,派人看守。贾政利用丁忧之际,将贾母灵柩运回金陵安葬。宋人范成大说:“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铁门限即铁槛寺,土馒头喻指坟墓。患了重病的晴雯被撵出贾府,因无钱医治而亡,王夫人对贾母汇报说她是患女儿瘵死的,给晴雯的表哥赏了十两烧埋银子,即刻送到外头火化了。

殉葬“周因于殷礼”,即周人渐渐染上殷人殉葬的风气。贾府作为贵族之家,出现丫鬟、奴仆殉葬的现象,不难理解。秦可卿死后,目击过贾珍和儿媳奸情的丫鬟瑞珠触柱而亡,“贾珍遂以孙女之礼殓殡,一并停灵于会芳园中之登仙阁内。”(第十三回)贾母逝世后,服侍过老人家的鸳鸯自缢而死,“贾政因他为贾母而死,要了香来上了三炷,作了一个揖,说:‘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丫头论。你们小一辈都该行个礼’。”

丁忧 为官者遭父母丧事,须闭门谢客,辞官归里,守孝三年,期满起复,谓之丁忧。贾母死后,贾政即报了丁忧。

(作者单位:甘肃岷县二中)

(接 75 页)以避免自己之罪责。伪造证据系犯诬告罪之一种方法,依刑法规定,从重处断。而被害人因被诬告反革命而抑郁染病致死,处罚实觉过轻。据此改判李廉臣以盗窃罪为有期徒刑三年,以诬告罪为有期徒刑三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褫夺公权六年。

在林伯渠、李鼎铭、刘景范共同署名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终审刑事判决书上,为追究这起盗

钱案引发冤假错案的责任还加上了一句特别的文字:本案之县长,轻易将被害人批准逮捕,事后又不妥善处理,以致羁押被害人至三四月之久,应在核查明确后予以行政纪律处分。

注:文中李科长为真名,其又名李东明,李秘书真名李海山,王主任真名王震亭,罗副县长真名罗云耀。

西汉水上游婚姻形式析述

彭战获

摘要：婚姻是人类社会进入到一定发展时期后的必然产物，其形式有多种多样。甘肃西汉水上游遗存的和曾经盛行过的一些汉族婚姻的形式，同样也呈现出多样性。经笔者多年走访考察，初步归纳为包办、买卖、交换、表亲、转房、入赘、童养、抱养、掠夺、自愿、指腹、娃娃亲、招养夫、典妻、换妻、共妻十六种类型。有的虽被时代新风俗所替代、淘汰，为当今时代的人们所不齿，但若从地方民族历史、经济、文化等各种角度来看，其民俗研究价值是弥足珍贵的。

关键词：西汉水上游 婚姻形式 民俗 析述

婚姻是男女间建立的一种社会公认的夫妇关系，这种关系是家庭和子嗣相互依赖存在的基础。婚姻是人类社会进入到一定发展时期后的必然产物，其形式有多种多样。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婚姻的形态发生种种演变和变化。古时婚姻，是指婚嫁和男女之家。《礼记·昏义·疏》云：“婿曰婚，妻曰姻是也，谓婿以昏时而来，妻则因之而去也。”“婿之亲属名之曰姻，女之亲属名之为婚。”所以“女氏称婚，婿氏称姻”。《尔雅》云：“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可见，除了夫妇关系称为婚姻之外，双方父母家庭间及亲属间也随之存在着一种婚姻关系，这就是民间人们所说的姻亲。

从遥远的古代兄妹婚到群婚制和对偶婚，再到现在的自由恋爱婚姻，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婚姻形式上也呈现出多样性，每一形式无不展示了婚姻习俗发展历史以及与其相关联的种种轨迹。常言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笔者曾对甘肃西汉水上游遗存的和曾经盛行过的一些汉族婚

姻的形式，从历史、地域及构成的手段、方式和性质等方面作了一番调查，现梳理归类论述如下：

一、包办婚姻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和父母包办的习俗影响，当地汉族中包办婚姻是相当普遍的。直到今天，仍依然左右着农村许多家庭，可谓“根深蒂固”，积习难改。

“男不轻求，女不轻许”，“买卖凭仲人，嫁娶靠媒人”。过去，人们对“贞洁”看得很重，而谈恋爱男女一接触又势必引起别人猜忌，故此家长不让相互接触。《诗经·豳风·破斧》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礼记·曲礼》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媒人，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介绍人，过去一直称“月老”“月下老人”“伐柯人”“大冰”“红娘”等。在“父母之命”下，许多婚姻就是在两个家庭和媒人之间商议撮合成的，而婚配的男女双方本人就根本没有参与左右的权力，只有听人任其摆布，甚至连整个议婚过程也不晓得，直至入了“洞房”揭开神秘的红盖头后，才初识“庐山真面目”。这样的婚姻，其质量如何？人们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几千年来的中国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间婚俗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当然西汉水上游一带更不例外。

包办婚中，首先是双方父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才是媒人。有婚姻成时，人们总会问：“谁的大媒？”没有媒妁之言，婚姻往往不被人承认。过去，媒人多数是由上了年纪的女性担任，但当地却概由上了年纪的能说会道的男性担任，人们习惯性认为，“嘴上没毛，说话不牢”。媒人由男方家的父母请动说亲，谓之“发媒”；若女方父母请媒人说

亲,便是“倒发媒”,是十分罕见的。男女双方父母对待媒人都是非常热情和厚道的,尤其男方还有丰厚的酬谢之礼。如果哪一方慢待了媒人,婚事可能会被搅“黄”,还有一些很难般配的,因媒人受了一方的“特殊”好处,也会昧着良心瞒天过海,撮成婚缘。如果婚后夫妇感情不合,家长不满意,媒人也再不担任任何干系,因为古言说过:“媒人是个拄河棍,拄过河了没处用”,“只包入洞房,不包一辈子”。当然,从古往今来的大量事实表明,媒人也促成了不少和谐美满的姻缘。

据不少老人讲,儿女的婚姻大事上,过去有不少父母为了慎重起见,也有打扮成“货郎客”和“乞丐”模样,暗中察访味气、人品等情况的;还有在媒人和一方父母的鼓捣下使“眼前花子”,即以俊替代丑、以全替代残、以高替代矮等,不择手段来蒙骗成婚的。总之,离不开父母的包办。

二、买卖婚姻

买卖婚姻是古老的遗俗,往往和父母包办相伴随。尽管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婚姻形式上呈现出了多样性,但大多数离不开买卖,也无不受到包办或大或小的影响。时代发展到今天,移风易俗之下,自由恋爱多了起来,家长包办与日见少,在农村,尤其是一些偏远山区,买卖婚姻还是偶尔可见。

在封建社会包办婚姻盛行之际,首先注重“门当户对”的等级婚姻,超级婚姻是罕见的。尤其是地位高的一方,是忌讳找地位低的一方作配偶,俗称“低就”;地位低的一方也忌讳“高攀”。显而易见,一是恐怕婚事不成而让人耻笑,二是担心成亲后,尤其高攀的一方会受到对方的歧视和虐待。其次,是族外婚议婚的发展,建立在一定的数量财物之下的私有制婚姻的代表形式。它往往在繁缛的礼俗伴随下,男方一次又一次用相当数量的财物作为代价,来换取女方为妇的。古代将婚礼看作是人生仪礼中的大礼,“六礼”中的“纳采”“纳吉”和“纳征”等,完全是议定娶妇身价进行买卖的必定程式。财物多少取决于双方家庭,也在于媒人(有时还有帮媒)来往沟通决定——媒人由于职业的需要,他们对当地民间婚俗行情知之最详,记忆最

深,传统观念保留上是最完整的人物。一切身份及撮合事项,全凭他们在双方家庭间穿梭奔忙,有关风俗礼数也赖于他们的传播、提醒和协调处理。女家如数获得财物后,便将女儿出嫁给男方,从此正式脱离女家,等于财物与女子的议价交换,谁也不认为吃亏。过去,富户人家除了聘金及金银首饰、衣物、礼烛、礼饼等,还有用土地、牛马等作聘礼的。如今,买卖婚姻的遗俗在个别地方尤其偏远山乡还有影响,普通人家娶房媳妇,至少得花聘金聘礼三万元左右,甚至高达七、八万元以上。积习升级,大都迫于无奈,明知不可为,但都在为之。

买卖婚姻表面看来似乎是等价交换,其实反映出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首先表现在妻是用一定的财物买来的,是夫家私有财产,要受到夫家的控制约束。俗言说的“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任人欺来任人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其次娶妻的关键是延续香火,为了保证血缘世系的纯洁,妻必须严守贞操,受到夫家家族血亲的注视,生活处于幽闭状态,没有人身自由。第三,媳妇有机会熬成婆婆,从而又转过来强制和压迫自己的儿媳,依此沿袭成风。

“骡马有价人无价”。人非骡马,可以买卖。如今男女讲求平等,婚事提倡新办,此遗俗实在不能让人恭维。

三、交换婚姻

交换婚,俗谓“换头亲”,是一种古老的族外婚的婚俗形式。通常是两个血统家庭的男子互换其亲姐妹为妻,也可以说是双方父母互换其亲生女儿为儿媳。这种婚姻形式,不受严格的“六礼”缠俗约束,只要双方议妥,“插香”拜祖之后,逢吉日良辰便可迎娶,送入洞房。有的人家是大操大办,婚礼异常隆重;更多的人家则是一切从简,只招待主要亲戚。

过去,换头亲婚姻比较多,但没有走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藩篱,男女双方很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整个议婚过程中,媒人始终在双主家庭来回游说和奔走,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这种交换婚姻主要是以人换人,不要“财礼”,所以盛行于大多数贫困人家。媒人也乐此不疲,易得“劳

酬”。不过,有时在年龄、体质、相貌上悬殊太大,也让媒人颇费心计。媒人在民间虽然受人敬重,但也抛开不了“行规”制约。一般说来,婚事未成之前,尽量避人耳目,不便四处张扬,跟做贼似的。否则,婚事说不成,反要惹人笑话和唾骂。托人说亲的人家,尤其女方,更怕媒人嘴碎没遮拦,亲事还八字未见一撇,早让街坊邻居传了个遍,会坏了女方名声。如果最终说成也就罢了,否则还会酿成悲剧。直到现在,议婚大多数是隐秘的,到了一定的时间,关系彻底确定了,方可逐渐公开。其他婚式尚且如此,交换婚姻更是格外谨慎机密了。在交换过程中,如果有一方婚后不和或痛苦交加,也只能忍着过日子;倘若离异,势必使另一对关系良好的夫妻也得跟着离异。要不惟一之法,就得补送“财礼”,重新迎嫁。

交换婚姻男女双方绝大多数没有感情基础,也谈不上婚姻质量。至今个别山区农家仍有此俗遗存,那实在是贫困所致,买卖婚姻造成的恶果。要使此婚式消亡,只有消除贫困,才有希望。

还有另一种交换形式,在姑舅表婚中,表现为两代交换。换一种方式,就是姑姑嫁,生女回嫁舅家。这种婚姻家庭隐患太多,近亲遗传病也不少,往往会造成几代人的痛苦。

陇南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杂居,兵连祸结,旱涝虫瘟等,人们多数在贫困中挣扎,加上科学认识不到位,婚式多元化,出现交换婚姻并不奇怪。尤其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大饥荒,交换婚姻得以延续,就可想而知了。

四、表亲婚姻

表亲婚,属于近亲婚姻,通常称为“姑表婚”“舅表婚”和“姨表婚”等,是古老的亚血缘婚姻的遗风,是指兄弟的子女与姊妹的子女之间建立的一种婚姻关系。

姑舅表婚又称为中表婚,中表指的是内外,即舅子为中、为内,姑子为表、为外,俗以为姑母和父亲的血脉相同。过去,陇南的一些乡村曾经热衷于表亲婚,并称之为“亲上加亲”。这种近亲婚姻不仅以亲族感情和某种继承关系为根据,而且还有古老的观念作依据。通常把舅家娶姑家女儿为媳,看

作是对当年姑姑出嫁的一种补偿。众所周知,其实这种近亲婚配百害而无一利,尤其对子孙繁衍和人类发展的危害极大,像痴呆儿、畸形儿大都是他们的产物,夭折现象更不用说。但在特定的历史和环境,人们的认识不够清楚,兼或根本没认识到,这是情有可原的。

“姑妈女,顺手娶;舅舅要,隔河叫。”这是老年人传下的几句口歌儿。民间把舅家娶姑家女儿作媳妇,有的村里人称为“借姑过表”。即使舅表有一定的生理缺陷或者年龄间过大或过小难以般配,也不能更改,否则便采取强硬手段使其完婚。当然也有灵活性,若舅家主动不要时,甥女方可另嫁别人。民间把这种婚姻又称为“骨血倒流”。与此相反,姑母家儿子娶舅父的女儿为妻,民间又称为“姑母做婆”。另外,还有姨与姨间的子女相互攀亲和结亲的。凡此种种,聘礼可有也可无,也不存在父母包办买卖,完全是承袭于陋俗惯例。

陇南多为汉族聚居之地,但历史上多民族混居过,或迁徙或汉化,留下了复杂多元的婚俗。虽然在不同时代曾多次禁止过近亲婚配,始终难以彻底革除。如今,新的婚姻法有了近亲不能结婚的规定,加上人们有了科学的认识,才逐渐改变了这种弊俗,虽然眼下偶有所见,偶有所闻,但彻底将其革除之日,已经为期不远。

五、转房婚姻

转房婚姻,是古代“夫兄弟”“妻姊妹”“共夫共妻”的残余形式,学术上又称为“逆缘婚”。

据有关资料表明,氏族内婚和亚血缘内婚是原始公社群婚制的残余。再说清楚一点,就是婚姻关系多在同一氏族、家庭内部进行。除亲生父母、子女、亲兄弟姐妹外,叔伯舅姑姨中,从兄弟姊妹,再从兄弟姊妹之间均可以婚配,甚至不同辈分之间也可婚配。此外还普遍保留“兄妻弟妇”的转房婚。这是一种兄亡故嫂转嫁于弟,弟亡故弟媳转嫁于兄,姐亡故妹续嫁于姐夫的婚姻形式。这里曾多民族杂居,尤其藏民、蒙元,氏羌人人入居,恐怕也与其遗风有关。从汉代到清末,这种杂婚遗风确实不少。不过,转房之下,还可以续娶妻妾,富有的人家还形成了一夫多妻的婚象。

同父母兄弟和从兄弟之间都可以转房,但必须征得女方同意。辈份不同之间转房,有乱伦之嫌,除征得女方本人同意外,还需征得娘家父母的许可。娘家父母有的贪其家业,有的怜悯外甥,无奈之下只好默许,当然想方设法要寻找一些比较合乎情理的借口,于俗理和颜面上过得去。

过去的转房婚姻还可以这么认为,这是一种奴隶制、封建制财产转移的变形,一方面维护了原有亲族关系,子女仍为本氏族成员,不被人外看,劳动力也不会外流;另一方面又维持了两个家族间亲属之间的继续和好往来。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寡妇改嫁视为不贞,尤其程、朱理学之后,民间始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一而终”“好女不嫁二夫”之观念,这转房之举可以说也有其袭遗俗、反封建礼教,甚至还有其进步的一面。

新中国建立以来,实行婚姻自主,转房婚姻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已淘汰了它原有的多妻成份,发展成了一夫一妻制的自愿婚。时下,转房婚姻仍偶有见闻,但站在自愿婚的角度来看,并无多大弊害,还是可以存在的。

六、入赘婚姻

入赘婚,亦称“招养婚”“招嗣婚”“上门亲”。不同的年代,对其称谓亦不同,在秦汉时期谓之“赘婿服役”,在宋代谓之“舍居婿”“赘婿补代”,在元代谓之“赘婿养老”,现在谓之“男到女家”“指女抱儿”。

这是一种母系家族和从妻居服役婚的古风遗留的继承和发展。主要形式上女子不出嫁,招男子入女家为婿;主要目的是女方需要养老接代,继承家业。现在多数存在于有女无儿的家庭。招赘有两种情况,一种招赘改姓作儿子,这种有财产继承权;一种不改姓,以养老送终为目的,一般没有财产继承权,所生的孩子从母亲姓的,通常谓之“开门的”,有财产继承权,从父姓的,不开母亲家之门,但开父亲之门,继父亲原家应得的财产。西和县、礼县等地域,虽有男孩立门顶户,有些村子也有给女儿招赘上门的习俗。

在远古时代,是“男子出嫁,女子娶夫”。那时是男子随妻姓,子从母姓。比如曾疏导汉水的大禹

王就是这样,未婚时姓姁(从母),婚后姓涂山氏(随妻)。故此,如果远古时代亦有亲迎仪礼的话,无疑是女的迎娶男的了。当然,还有其它许多因素,这里就不赘述了。后来,随着社会发展、演化和越来越文明,亲迎的风俗仪礼全然倒了过来,现在的一些女娶男的婚姻,民间反而会呼之为“倒插门”或“上门汉”,这里的一个“倒”字说明了他“反风俗”的现象。在封建男权社会里,赘婿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汉书·贾谊传》中云:“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也。”赘,一说为质。可见这赘是有典质服役的一些性质的。西、礼一带曾是秦人的发祥地,过去的世俗对赘婿大都带着轻视、歧视的陋习。比如俗谚云:“上门汉,三年不成两年半。”显而易见,人们总是放心不下,无时不在担忧。也有例外的,比如与西和相邻的康南一带,入赘之俗甚为普遍,不光有女无儿户如此,就是有儿有女户,男子一律嫁于女家,并且要改名换姓,从一而终。男嫁女家,至今仍为时尚,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先后前往康南探秘。康南之俗,看其神秘,其实也不难破译:一是源自于“男子出嫁,女子娶夫”的远古婚式;二是太平天国的一支起义队伍在此一带消失,可能是隐姓埋名,入赘山区有关。“一个女婿半个儿”,在其他各地,现在赘婿一般没有典质、服役的性质了,却完全是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和传宗接代,受到了世俗的认可和法律的保护,成为一种移风易俗的典型和男女平等的象征。尤其实行计划生育国策以来,纯女户会越来越多,在农村来说自由恋爱的“入赘婚”是倍加受人欢迎的。“嫁”和“赘”基本一样,没有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分,女婿照样可以顶门立户,继承家产,养老送终。

入赘婚的仪礼极为简单,不受过多的“六礼”约束,只要男女双方同意,不送任何聘礼,择吉日良辰即可完婚。结婚时男方不备嫁妆,不收礼物,所需花销概由女方家里承担。男子出嫁那天,男子家里不摆筵席酬客,也不举行婚礼仪式,只需由家族男子和媒人陪着往女家即可。当日,在女家举办婚礼,筵宴厚待亲戚朋友和庄村族人。这一天,女方家长按常俗为赘婿改姓过继,签下“天理合同”,

视为己出,随女儿在家族中排行。从此,同辈与他称兄道弟,忌用“姐夫”“妹夫”之类的称呼,也忌用“上门汉”“倒插门”之类的语言,受人尊重。

入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寡妇不再出嫁,再娶一夫进门,养老抚小,顶门立户。此俗现在依然流行。

“男到女家”落户,婚仪简约,古朴无华,也可看出其世代承袭演变的艰难。如今时代不同了,在移风易俗中剔除其中的陋俗,加以传承,没有什么不好。

康南的“男到女家”是有特定历史原因的,也不是三言两语说清的,另有专篇叙述。

七、童养媳婚姻

童养婚在我国封建时代普遍存在,甚至这种恶俗相沿到新中国建立前夕。现在这种婚俗已近绝迹,只有民国过来的一些老年人时常在茶余饭后提起。这些老年人中,有些裹着小脚的老太婆里头,就有当年的童养媳。

童养媳的家庭,大多数是有了儿子后,才开始抱养别人家的女孩作为养女,成长到一定的年龄,便与自家亲生儿子结为夫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婚龄是不一样的。《周礼·地官·媒氏》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盈,任为人母”。齐桓公争霸天下,令“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越王勾践为了开阔兵源复国报仇,曾下令:“凡男子二十、女子十七不婚者,罪及父母。”再后来,到了南北朝时,婚龄降到了“男十五、女十三”的地步,直到明、清两代,最低的法定婚龄是“男十六,女十四”。建国初,新婚姻法规定婚龄为“男二十,女十八以上”。除了国家、民族的法定婚龄限约以外,其实边远山区民间的实际婚龄比这还要低。之所以要罗列以上史料,为的是说明不同时期的童养婚其实际婚龄比这更要小一些——因为男方父母急着抱孙子,让其早早传宗接代。

这种婚姻形式带有极大的包办、剥削和强制性。未成年的女子多为廉价购买或以别种因素抱养的,她一踏进婆家门,往往担负着繁重的家务活,甚至田间劳动,备受虐待、体罚和摧残,过着非

人的日子。

童养婚历史悠久,产生于哪朝哪代,未能确考。据《后汉书》记载,东汉献帝建安八年,曹操娶亲,娶的就是“少时待年”的童养媳。又据《三国志》记载:“沃沮国女,至十岁,婿家即迎之长养为媳。”明、清两朝至民国时期,童养婚事象就更不用说了。

童养媳婚姻之所以曾经孽生、繁衍,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不花分文“财礼”,也不受过多的包办、买卖婚礼俗的制约。现在,此俗早已消亡,但作为地方民俗文化遗产的一分子,才记入此篇,供后人借鉴。

八、抱养婚姻

抱养婚姻并不多,但至今在一些山村还有现实例子,我们可不能忽略不论。出现抱养婚姻的家庭,多数是父母婚后一直未曾生育,或虽然生儿育女,有的痴傻残疾,有的在成长中夭折,后继乏人。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抹着辛酸的泪水,鼓起生活的勇气,才寻觅多儿女的家庭,将其子女抱养家中,耐心抚育成人,然后婚配,以便传宗接代,养老送终。世俗中“母以子贵”,尤其女人婚后不能生育,将被世人看不起,世俗所鄙弃,在村人面前也抬不起头来。过去,遇到这种情况,丈夫可以顺理成章去娶妾生子,或者典妻生子,用以补救;否则,只有走抱养别人家孩子的这条道了。

抱养来的孩子,大多数是同一家族的,或者是亚血缘关系人家的,这跟传统古俗是有密切关系的。亲兄弟的孩子,俗称“过继”;姊妹以及姨家的孩子,仍然通称“抱养”。“姨”在西和及礼县龙王山一带俗称“娅娅”。俗言道:“娅娅怀里娘形的”,其意是再亲近不过了。抱养别人的孩子,虽然比不上亲生的,但俗信“骨头连着筋,亲的总归亲”,“咋打咋骂不变心”。

抱养婚姻比较特殊,归纳起来通常有三种形式——

1、抱儿娶亲式。这种婚姻最常见。通常是抱养别人家男孩,抚养长大到一定婚龄,再央求媒人提亲、迎娶。其婚俗礼仪和包办、买卖婚姻相同。不过,一般在迎娶时都是大操大办、收礼宴客,甚至

“双吹双打”庆贺,异常热闹。为什么要这样做,其理由显而易见,当父母的因“命苦”之故,心理长期受到压抑,平时觉得比别人矮了半截子,逢此喜事正好借机张扬张扬,冲冲霉晦之气,显示出自己和别人也是一样的。同时也期待儿子早生贵子,孙嗣满堂。

2、抱女人赘式。抱养别人的女儿改本家之姓养大,选择外族外姓男子择黄道吉日使其完婚。其礼俗和“入赘婚”相同,给男方家不送“财礼”,结婚之开销全由女方家承担。男子婚后改换为女家姓名,继承家业。所生子女,仍取本家之姓,也有第一个子女姓女方,第二个取姓为男方原有之姓的,意为两家门儿都开,后继有人。这种婚姻的形式,民间俗称“养女抱儿”或“养女招夫”。

3、成双童养式。既抱养别人的男孩,又抱养别人的女孩。但必须有一个是亲族的,用以维护本血统的传统亲情。双双抚养成人之后,择黄道吉日使其完婚。此种婚姻纯属养父母包办,子女根本没有一点选择配偶的自由。即使婚配之际,有一方仍一百个不愿意,在世俗的重压之下也只好认命。这种婚姻从古到今,多数都不怎么美满,时有悲剧发生。现在,这种婚姻极少。

九、掠夺婚姻

掠夺婚,俗谓之“抢婚”。这种婚姻,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认为,“是古代氏族部落外婚所造成的用战争形式掠夺妇女的遗俗”。在我国古代《易经》爻辞中,就有“匪寇婚媾”的记载,正好是这种古老抢婚习俗的真实描绘。现代抢婚和古代抢婚有着本质的区别,好些地方的抢婚,并不是真正的硬抢,还要动刀动枪的,而是作为一种习俗传承,取禳解避凶求吉之意,几乎全转变为自愿性质摹拟样的抢掠而已。这在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民间文学作品中也有具体的描述。

曾有过的抢婚形式是多样的。西和西部和礼县接壤的龙王山一带,过去由于西番和元人入居,对汉人欺辱严重,新婚夫妇为了摆脱“初夜权”的凌辱,曾进行过多次不屈不挠的抗争,同时偷偷在半夜间进行过隐行的“掠妻”壮举,也有夜间娶亲的。后来,时过境迁,积习使然,遂发展成了象征性

的抢婚习俗。不过,抢婚之前女方家是知晓同意的,抢婚时女方假装呼救,抢夺者便撒钱,诱使追的人拾钱缓步,借机逃走,完成大婚。笔者还认为这种抢婚形式,恐怕还与摆脱包办、买卖婚的遗俗束缚也有一定的连带关系。

抢寡妇也是一种婚式。寡妇改嫁,古称“再醮”,意见是再举行一次酒宴,并无彻底禁止之意。历史上娶寡妇的事例比较多,不论是宫廷还是民间,都是允许的。只是程、朱理学之后,民间受“从一而终”、“好马不韝二鞍,烈女不嫁二男”思想的影响,遂以为寡妇改嫁是大逆不道。如娘家愿让寡妇改嫁,原夫家不同意,所娶的男家就要“抢婚”。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掠夺婚”。不过,婚礼仪式极其简单,很少大操大办,也不收贺礼。这种婚姻,民间至今还是有各种说法的,必须待寡妇持服少则百日之后,或者三年释服后才能去“抢”,不然是不吉利的。抢寡妇的禁忌比较多,也很特殊,就不再一一细说了。

再补叙一点。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民国时寡妇改嫁不是件光彩事,有的被夫家或家族卖给了别的男的,有的再被光棍汉拐去,有的被卖路途上被邻村聚众拦截……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议婚、抢婚的渊源,正在于对偶制婚姻的确立。现在,抢婚现象已不复存在,但其遗俗仍然演变渗透于婚姻的各种过程中。不过,现在寡妇改嫁,大多数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虽保存了少量古俗遗风,但不存在被人“暗抢”,而是名正言顺地“再嫁”。由此来看,新婚姻法已逐渐深入人心,陋习劣俗为人们所不齿。

十、自愿婚姻

自愿婚姻就是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结成的婚姻。通常是以男女双方通过自由恋爱为基础,双方在经济、生活、感情等各个方面都保持了平等,消除了男尊女卑和门阀等各方面的传统观念。当代最好的婚俗,是提倡男女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夫妻关系,彻底破除包办、买卖等一些古老恶俗。因此,众多婚姻的形式中,当首推自由恋爱,但作为一种为人民大众普遍接受的进步婚俗,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开始实行的。

自愿婚的古俗形式，最早见于古代的“私奔婚”。如《周礼》记载的“仲春之日，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诗经·国风》中的私奔定情、自愿为婚的表现也不在少数。这种私奔婚，在一夫一妻制发展过程中，会遭到来自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种种阻力，要呈现出真正的自愿婚形式，必须使私有制解体。众所周知，一夫一妻的婚姻受到了社会制度十分有力的制约，妻的地位远不是母系氏族时期的中心位置。妻和财产为夫所有，只不过不同于其它财产而已，她的作用只在于生育儿女，延续继承家业的世袭，确保夫家血缘世系的纯洁；同时妻的位置也取决于是否生育子女，人们认为“母以子贵”。由此可见，妻的生活时时处于受强制的幽闭被动状态，这便是一夫一妻制在私有制条件下形成男尊女卑的原因所在。旧社会，由于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数和父母强行包办、买卖的婚姻习俗存在，青年男女是很难自由恋爱的。即使有个别自恋者，也只能在暗中偷偷相识相谈，山盟海誓之后，只好“私奔”异乡，别无选择。当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自由恋爱现象是屡见不鲜或公开化了的，那实在是独特的习俗所致，另当别论。所以可以这样说，真正体现经济、生活和感情上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自愿婚姻，在过去的时代是为数极少的。

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人类越来越趋向进步文明，婚姻的形式也在不停地优胜劣汰，传承递送。在移风易俗的今天，婚俗将会发生重大变革，作为理想进步的自愿婚俗，也必将为更多的人民大众所接受。

自愿婚是当今婚姻形式的主流，是最美好的让人推崇的婚姻。然而千百年传承遗存下来的种种陈腐的婚姻旧俗，至今仍使一些人难以从中彻底摆脱出来。封建礼教的束缚年代太久了，民俗的力量也太强大了，人民穷困的日月也熬得太漫长了……要想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真正使自愿婚为人民大众普遍接受，任重而道远，还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

十一、指腹婚姻

指腹婚，就是孩子在未降生之前，双方父母指腹相互承诺预定的一种婚姻。父母之命，一言九

鼎，天地作证。这种婚姻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时有所见。笔者在跟一些老人多次攀谈中，常常提起此种婚姻形式，他们往往说的有根有据，其中有个别高龄老人还是见证人和当事人。不过，时下这种婚姻形式早已被淘汰了，留给人们的只有民俗研究价值。

归纳调查所得，指腹婚的出现通常有三种情形：

1、门当户对，没有高攀低就之嫌。双方父母是故交或者是世交，又是官宦或富贵人家，在门阀的基础上，为了将友好感情不断沿续下去，设法将友情变亲情，一荣俱荣，便过早地迫不及待地指腹联姻。若两家所生孩子有男有女，此婚约不变；若都是男孩或都是女孩，只好等后生的一个了。至于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民俗多变，俗随人变，他们自有说法。

2、家庭贫困，交情甚厚。不同姓氏的两个家庭，由于平日交情深，来往互助频繁，便出现指腹为婚的婚式。孩子出生后，各自抚养成人，梳头成眷。此种婚式，往往重情而不重财，双方量力而行，婚礼操办上十分简单。由于家庭贫困，也讲不起繁缛礼节，有的干脆在腊月三十结婚，只图生儿育女续上香火，有个养老送终的后代就心满意足了。

3、知恩图报，结为亲家。这种指腹为婚，不存在高攀低就俗礼的非议，往往受到人们的称赞。为什么会这样？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家对另一家有大恩，甚至是生死的救命大恩。富贵之家无法用金银之类来加以回报，便指腹为婚，借机作为报答和补偿。如此以来，两家结为姻亲，就形同一家人一样。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特殊的地形地貌，复杂的历史，再加上多民族外来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一年有四季，隔里不同风”，西汉水流域曾产生指腹为婚的婚姻并不显得奇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十二、娃娃婚姻

娃娃婚，亦称“娃娃亲”。孩子未长大成人，大人便在幼年就定好了的婚约。娃娃亲女的往往比男的大好几岁，有些男的结婚时只有十一、二岁。在这类婚姻中，“宁可男大十，不可女大一”的传统

观念已荡然无存。男方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早些后继有人。

在封建社会里,女人的地位最低,受压迫和歧视也最深。统治阶级蛮横地推行封建礼教: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犹如四副枷锁一样束缚着人们,也紧紧地套在妇女的脖子上。劳动人民本身也受到影响,社会上普遍流行“男尊女卑”的观念。女孩子自幼就缠脚,“三寸金莲”的痛苦和不便,带来了许多无奈。娃娃亲的婚式,对女孩子来说,是别无选择的。但也有例外,其情可想而知。

娃娃婚姻,在过去的婚姻形式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往往和包办买卖婚姻紧密相连。这种婚姻,全是父母一手操办,表现在订婚早,幼小的孩子根本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直至入了洞房,生米已做成了熟饭,即使夫妻双方一百个不满意,也只好苦熬着过日子。

在山区农村,过去好多人是娃娃时定的婚。其婚姻的质量如何?说法各有千秋,但多数过来人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他们鼻涕一把泪一把地现身说教,留给了新时代人不少的沉思。

十三、招养夫婚姻

招养夫婚式是特殊年代的产物。这种婚姻形式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寻根问底,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和家庭原因。过去,在很长的一段年代里,“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习惯成自然。男子在家庭的地位至高无上,女人只不过是男子的附属品。尤其在农家,男子是全家人的梁柱子。倘若男子生病或发生意外伤残,长期卧床不起,全家人就失去了依托,生活自然就艰难了。为了生存,为了全家老少,于是妻子便再招一位家中无牵挂的“养夫”,负责农田劳作,创造财富,赡养老人,抚养子女。原有男子仍是主夫,在家里是名副其实的掌柜的,而“养夫”没有资格承继家产,变相的是一位不用付工钱的“寻活人”。这种多夫关系的维系是公开化的,是被家族和社会上承认了的,养夫有当一辈子的,也有在原夫恢复劳动力后退出。养夫不是家庭成员,但和主夫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

招养夫婚式源自哪朝哪代?笔者因资料不足,

难以断代确考,只好存疑。不过,在接触到的一些地方民间文学和文艺作品中常常见到一些情节,至少断定在明朝之前。据一些高龄老人说,民国时期就有招养夫现象,几乎每个山村都有具体的实例。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婚式消失了。

十四、典妻婚姻

典妻婚姻,多数人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续一脉香火。所“典”妻子,如果在一定年限内没有生育,双方两家将另有说法。

典出、典入大多数都是自愿的,也有迫于无奈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典出的原夫多数因贫困交加所致,无奈之下才把妻子典出,到期赎回;二是因无力偿还债务,干脆以妻充债典给债主;三是丈夫早亡,夫家将其典卖出去,替人生儿育女,但原有子女一概不能带走。

娶不起媳妇的男子是这样,有了媳妇但没生下“值钱的男孩”的男子也典妻生子。有妻再典妻、娶妾,其实又是一夫多妻的并存婚式。

典妻婚姻是比较特殊的。过去的年代,这种婚姻形式就显得很特别,现在早已绝迹。

十五、换妻婚姻

换妻婚,就是已婚的两个男子因各种原因,将妻子相互调换,重新结成的婚姻家庭。如各自未有子女还则罢了,若有了子女,则只换妻不换子女。这种婚姻形式,双方男子大多数是心甘情愿的,也有极少数是被逼出来的。

“男的不爱一张纸,女的不爱直到死;”“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人骑来任人打;”“草绳不是绳,女人不是人;”……凡此种种,都是老年人不断传承下来的俗谚。由此至少可以看出女人曾经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愚昧无知逐步过渡到民主平等,是多么不易啊!封建社会出现换妻婚姻,也就可以理解了。民国年间,也常有换妻婚姻出现。据西和、礼县等几位老人说,当地换妻婚姻曾屡见不鲜,有些当事人至今仍健在。

换妻婚姻是历史的“沉渣”,已被时代所淘汰。

十六、共妻婚姻

是古代血缘、亚血缘的残余,影响和变态形

式。多为兄弟共妻,兄为主夫,弟为副夫,所生子女依次排认:长子女为兄所有,次子女为弟所有,毫无争议,和睦相处。

共妻婚姻有的是家庭经济困难所致,有的并不是出于贫困,而是为了维护家庭财产的统一。过去的藏民多有此俗,这恐怕是曾受其影响有关,现谈不上此俗绝迹,但不公开。

赘言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辛亥革命以前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华民族正是在形式多样的复杂的婚姻习俗携裹下,才得以繁衍生息和发展壮大。人们重视婚姻形式,也重视嫁娶之俗,把它当作终生大事之一。不过,不管构成婚姻的形式如何,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并不看重男女间爱情的分量甚至质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婚姻的形式乃至夫妇间要求的基础,逐渐由外界条件、环境进而转向男女双方的内心世界;尤其新中国建立以来新“婚姻法”颁布实施,一些旧的婚姻形式和习俗大都被相应地改造或抛弃了。另外,车辆的出现,使得与围绕轿子、骡马相关的婚俗转化或消失了;西装革履的兴起,使得与围绕凤冠霞帔、红盖头之类

的一些习俗转化或淘汰了;自由恋爱的深入人心,使得婚式走向文明简单,媒婆(或月老)失去了“用武之地”……总之,现在婚姻的形式在变,婚姻民俗也随着在不断变化。尤其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以来,过去的许多婚俗在新一代年轻人的观念中已是所剩无几或者是面目全非,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时常给子孙传递着部分旧时风习的例规。不过,大多数只是独自感叹人心不古,口头上絮絮叨叨一番而已,其实也无奈无力再要求后代子孙去全部遵从。但是,有些习俗是很顽固的,也有着极其特殊的生命力,有的仍在不断传承递继,有的表面上看其似乎消亡,实际上又变换着形态或多或少地又挤进了人们的新生活中,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西汉水上游曾存在过的婚姻形式多种多样,以上归纳介绍了十六种。有的虽被时代新风俗所替代、淘汰,但从地方民族历史、经济、文化等各种角度来看,其民俗研究价值是弥足珍贵的。此文若有错误和遗漏之处,诚请同仁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西和县地方志办公室)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一任县长安·贯布什嘉

高自厚 贺红梅

安·贯布什嘉(1898—1958年),裕固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区红石窝乡人,裕固族最后一任世袭大头目。“安”为姓氏,“贯布什嘉”为名号,习惯上略去姓氏“安”,只称名号,“贯布什嘉”。新中国建立以来,贯布什嘉历任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筹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县县长。他是裕固族人民终止封建部落首领世袭制度、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带头人。

“大头目”即裕固族最高首领,是汉语的口语化称谓。最早记录“大头目”称谓的是清初的《平定朔漠方略》。在东部裕固语中,称作“诺彦”。大头目的本意是“王”。《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中的“宗旺”并非人名,而是“总王”之意。

大头目自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被清朝册封以来,子孙世袭,至贯布什嘉,共经历12代。现将清代大头目世袭排列如下:

- 1.厄勒者尔顺。1698年受封,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2月22日病故,袭职5年。
- 2.绰革样。前任嫡子,父死之当年继位,1725年(雍正三年)3月22日病故,袭职22年。
- 3.大申布。前任嫡子,父死之当年继位,1750年(乾隆十五年)5月28日病故,袭职25年。
- 4.端都扎什。前任嫡子,父死之当年继位,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7月22日病故,袭职18年。
- 5.达尔吉。前任嫡子,父死之当年继位,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12月10日病故,袭职21年。
- 6.扎布加。(缺)
- 7.木错。前任之弟,继位年代不详,1826年(道

光六年)5月6日病故。

8.诺尔段吉。前任嫡子,父死之当年继位,1874年(同治十三年)5月8日病故,袭职18年。

9.贡保什加。前任嫡子,父死之当年继位,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6月24日病故,袭职29年。

10.洛藏段吉。前任之侄,其父兄病故之当年继位,1904年(光绪三十年)病故,袭职1年。

11.索旦诺六。前任之族兄,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继位,时年38岁,1910年(宣统二年)病故,袭职5年。

12.安·贯布什嘉。前任之族侄,1910年(宣统二年)继位,至1954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建立,贯布什嘉荣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结束了清初以来延续两个半世纪的头目世袭制度的历史。

清代的大头目,祖系明代的安定王。大头目的姓氏“安”,正是“安定”(民间传为安江、安帐)的首音节。

明代的第一任安定王卜烟帖木儿,1375年(明洪武八年)受封,1377年(洪武十年)被叛乱部将沙刺所杀,袭职2年有余。

第二任安定王亦攀丹,卜烟帖木儿之孙,板咱失里之子,1413年(明永乐十一年)受封,1446年(正统七年)病故,袭职33年。

第三任安定王领占干些儿,亦攀丹之子,1446年继位,1490年(弘治三年)病故,袭职44年。

第四任安定王千奔,领占干些儿之子,1490年继位。此后不久,裕固族的先民撒里畏兀儿开始东迁,部众逃亡,同明朝失去联系,千奔卒年不详。

千奔之后,子孙自动承袭,得不到明朝的册封,以“赞吉”(太子)自称。又历5任,就是清初的厄勒者尔顺。

自明初的安定王烟帖木儿到新中国初期的贯布什嘉,共历21世。对此,贯布什嘉本人的记忆十分明确。

明初的安定王卜烟帖木儿,本是元末的威武西宁王(《明史》简记为“宁王”),是元中叶威武西宁王出伯之裔。自出伯至卜烟帖木儿,中经阿哈伯、亦里黑赤、纳忽里、安克帖木儿4任。

出伯又是成吉思汗之嫡系,其祖谱是“成吉思汗、拖雷(四子)、旭烈兀(五子)、蒙哥帖木儿(十一子)、出伯(四子)”。

安定王卜烟帖木儿的祖谱虽然可以上溯至成吉思汗,但是,从成吉思汗至卜烟帖木儿前期,是蒙古族的历史,或者说是元朝的历史,而不是裕固族的专史。只有卜烟帖木儿脱离元裔,向明朝上交元朝所授信印,被明朝封为安定王之后,才是裕固族的专史。

因此,大头目祖谱,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卜烟帖木儿至新中国初期的贯布什嘉的21世,是以“安”为姓氏的大头目世系,是裕固族特有的历史。从成吉思汗至卜烟帖木儿被明朝册封之前,只是远祖。

裕固族源流有两大支系,一是以药罗噶—亚拉格为首的古回纥支系,一是以出伯—卜烟帖木儿为首的古蒙古支系。这两大支系相互融合而成裕固族,构成裕固族全部历史。大头目世系是裕固族历史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头目贯布什嘉所在的部落,叫大头目部落,俗称“大头目家”。这里的“家”实为部落之意,是借自汉语的“张家”、“李家”之“家”,近似于同一家族之意。

大头目部落之称,取自本民族首领的最高职衔“大头目”。这是很有来历的。

在明初,裕固族的先民撒里畏兀儿有四大部,其中之一是阿真部,就是安定王所在的部落。“阿真”和“安定”之音,均出自地名“阿尔金”,只是汉译时用字不同。大头目与大头目部落同明初的安

定王与阿真部是一致的。从安定王部到大头目部落,恰好显示了这个部落的演变过程。

裕固族东迁时,阿真部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大、小苏干湖(《明史》译为“昔尔丁”,清代译作“色尔腾”)东迁至疏勒河源头,另一部分东迁至今青海省祁连县八宝山周围。在明代后期的史料中经常出现的“安定卫遗种”,正是指这部分东迁之众。

东迁至疏勒河源头的阿真部民众,是原阿真部的主体部分,安定王的子孙也在这部分民众之中。他们虽然远离阿真川,仍然保持原有部落的名称,只是人们在汉译时用字不同,译为“安江”、“阿金”、“安帐”。东部裕固语又称“什开鄂托克”,西部裕固语称“西盖尔道”。这都是大部落的意思,是安定王子孙所在的部落。由于安定王子孙得不到朝廷册封,民间称其为“大头目”,其部落也称为“大头目家”。

在明初至东迁的一百多年中,安定王虽然生活在阿真部之中,但并不兼任阿真部头目。在阿真卫基础上建立安定卫后,阿真部头目兼任安定卫指挥,身兼二职,安定王并不兼任安定卫指挥。安定王率领的是阿真、曲先、阿端三卫之众,其职在三卫指挥之上。东迁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部众伤亡,人口减少;二是原有的阿真、曲先、阿端各部均已离散,重新聚合起来的部落,变化很大;三是大头目的权势被大大削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头目与大头目部落的头目合二为一。一般情况下,大头目只是管理大头目部落事宜,而又不定期召集各部落头目议事,发挥各部落共同首领的作用。这同后来在蒙古族中实行的蒙旗制度有不少相似之处。

大头目部落在疏勒河源头度过了灾难性的半个多世纪。先是附属于盘踞在青海的蒙古忠顺王俺答汗,后又臣服于蒙古准噶尔部,始终未能摆脱被奴役的困境。至清初,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企图武力破坏清朝统一大业,被清军打败。据《清实录》卷176记载,噶尔丹败于漠西后,企图武力侵扰青海。这时的大头目,正是后来被清朝册封的厄勒者尔顺,他审时度势,率领各部落头目及民众6719人,统一于清朝。为避免噶尔丹的侵扰,清朝令厄

勒者尔顺由疏勒河源头迁居祁连山腹地，游牧于祁连山南北。

厄勒者尔顺受到清朝册封之后，开始了在清朝统一领导下的大头目世系。至清末民国年间，大头目部落游牧于今康乐区红石窝乡，共96户、516人，各类牲畜1.7万头(只)。另有游牧于古佛寺(黄藏寺)的曼台部，本是大头目部落的一部分，因东迁和甘、青分省，逐渐分离。

贯布什嘉出生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他自幼家贫，全家靠几十只羊和七八头牛维持生计。宣统二年，第十二任大头目索旦诺六从马上摔下来，伤势严重。因无人承袭，大头目建议推荐继承人选。各部落正、副头目多次协商，产生了三名候选少年，即贯布什嘉、安千瑙尔、斯多布迁瑙尔吾。大头目不久离世，遵其遗嘱，按程序把三名候选少年呈报迪萨寺，经寺主谢马旺迪活佛按宗教仪规验算后，确认贯布什嘉为大头目。他说：“贯布什嘉应该是喇嘛转世。他完全可以统一治理部落，能坚守和管理好整个部落的土地和草原，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充裕。但是，他晚年有些灾难。”至此，12岁的贯布什嘉承袭了大头目之职，其余两名少年出任辅帮。

以上只是大头目继任程序的第一步。接下来，必须逐级呈报中央政府批准，才是合法的大头目。民国政府建立后，根据历任大头目由清政府理藩院授命的惯例，各部落正、副头目联名向民国政府呈上清康熙年间颁发的印信，以示拥护民国政府，并请示换发文照，授命贯布什嘉为大头目。此时，民国政府初建，百废待兴，改由甘州提督军门代表中央政府行施职权。1915年(民国四年)，即贯布什嘉继任五年之后，甘州提督军门正式换发文照，任命贯布什嘉为“黄番总头目”，并举行隆重的文照颁发仪式。去甘州(今张掖)参加文照颁发仪式的除贯布什嘉本人外，护送和陪同者有其舅德力辅帮、杨康辅帮、牙勒格辅帮、贺尔力辅帮等，还有一批有威望的知名人士代表。

颁发仪式之后，贯布什嘉在辅帮的引导陪伴下，身着祖传的前清官服，手捧文照，沿甘州城4条街道游行后，离开甘州返回康隆寺。行至距康隆

寺约4公里的大岔河，来自各部落的正副头目、辅帮、各寺院的喇嘛僧人及牧民群众百余人举行迎接大头目受封仪式，敬献了哈达和青稞酒。之后，到康隆寺的王爷衙门，又举行了7天庆祝活动。17岁的贯布什嘉成为合法的第十二任世袭大头目，正式“亲政”。此时的贯布什嘉，年轻有朝气，英俊潇洒，中等个头，脸庞略宽，颧骨突出，具有典型的东部裕固人形象，是卓有才华的执政者。

无论前世大头目传下来的前清印信和官服，还是民国政府换发的文照，贯布什嘉都看作是权力和神圣使命的象征，是本民族人民合法地位的标志，像对待生命和神灵一样倍加尊敬和保护。平时保存在自认为最安全、最圣洁的地方，只有在重大活动时才穿用。如每年春节，各部落正副头目和牧民来拜年，他都穿着官服迎接客人，不分年龄大小、辈分高低、职位尊卑，一视同仁，问寒问暖。迎进家门后，敬上一杯吉祥的青稞酒，以示祝福。然后脱去官服，换上生活装，同客人共同欢庆节日，询问牧民家庭生活和牲畜情况。

裕固族待人接物有许多特定的礼仪。每一个人开始步入社会时，必须先学好这一课。大头目必须遵守的礼仪就更多了。例如拜见上司、面见下属百姓、会见外来宾客，既要尊重对方，又不失身份、不失尊严。贯布什嘉很快掌握了这些特定礼仪，这是一位卓越的执政者必须具备的素养。

由于繁多的礼仪和艰难的时局，中年以后的贯布什嘉少言寡语，小心谨慎，为维护各部落安全尽职尽责。一年夏天，贯布什嘉得知一名班弟在寺大隆靠黑河边的柳树旁偷种了一块大烟地，他当即派人调查核实，抓来班弟，在寺院召集僧人及牧民大会，按传统习俗，强令班弟身穿黑衣，在寺院外自右向左倒转一圈，将其错误昭示于众后，驱逐出寺院。从此以后，再无人敢种大烟。

贯布什嘉还得知有几个牧民勾结土匪、马家军(马步芳部队)士兵和不法商贩，在寺大隆、八个家等地偷牛盗马、危害民众，贯布什嘉派罗尔家头目将其抓获归案。经审讯后，将主犯处决，令从犯回家，改过自新。

贯布什嘉严格约束自己，勇于自责，知错必

改。有一次外出,正值秋季,他的坐骑膘肥体壮,他刚要上马,马突然受惊,为他牵马的小头目猝不及防,狂奔的马把大头目摔了下来,扯破了栽绒被包,摔破了精致马鞍。大头目当场出丑,十分恼怒,要小头目赔偿。小头目赔不起,只好把自己的草场划给大头目一片。后来,大头目感到不妥,他把部落的长辈和小头目请到家,由长辈出面说和,把那片草场归还小头目。为了补偿小头目的经济损失,又把自家的一匹马送给了小头目。

贯布什嘉的妻子忠厚老实,劳动牧民的本色很突出,操持家务也是一把好手。可是,她少言寡语,不善应酬。由于大头目的特殊地位,不仅要接待本民族各部落正副头目,还要应酬外民族上层人士和官方军政要员。每遇官场应酬,妻子往往束手无策,无所适从。另选一名贤内助,显得十分必要。

在一次庙会上,贯布什嘉看到一位裕固族女子眉目清秀、仪表大方、谈笑自若,银铃般的歌声引人注目。经打听,此女名叫尕尔昂,东八格家(东部裕固语称之为“乃曼部”)常曼氏族人氏。贯布什嘉遂纳尕尔昂为妾。尕尔昂后成为大头目的得力助手,大头目的许多事情都由她出谋策划,有时代替大头目接待客人,应酬军政要员,处理日常事务,巡视草原边界。人们尊尕尔昂为“哈敦”,即夫人。

尕尔昂状告韩起功,为裕固族人民解除沉重负担,在肃南草原有口皆碑,广为流传。韩起功是民■时期马步芳军队的一个师长,驻扎在张掖。他欺压裕固族群众,鱼肉乡邻,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裕固族民众居无宁日。尕尔昂和大头目商量,必须为民众解除痛苦。根据当时的形势,武力抵抗和消极抵制都是没有出路的,只能开展合法斗争。经过周密策划后,决定上告韩起功。尕尔昂带了几个助手,身穿华丽的民族服装,骑着一匹枣骝马,从康乐的古城坡出发,向东南行,翻山越岭,涉过黑河,到了西宁,寻找韩起功的上司马步芳。一天,打听到马步芳正在检阅操练的部队,尕尔昂立即赶往练兵场,求见马步芳。经过一番波折之后,见到了马步芳。

尕尔昂胆量过人,能言善辩,见了马步芳,礼仪周到,不卑不亢。她一桩桩、一件件控告了韩起功敲诈勒索、欺压裕固族百姓的血泪事实。她情真意切,恳请马步芳为裕固族百姓减轻负担,解除灾难,否则,她永不返乡,每天告状。马步芳横行西北,广交军政各界要人,见过不少女中豪杰,但是,像尕尔昂这种朴实憨厚、有胆有识的牧区女英雄,还是第一次见。他长笑一声,令部下写了一纸公文,盖上大印,交尕尔昂带回见韩起功。自此,韩起功不敢再欺辱裕固族百姓。

在贯布什嘉与世长辞之后的特殊年代里,尕尔昂曾横遭指责,受尽折磨。从1958年的反封建斗争至1980年平反昭雪,被强迫劳动改造20多年。一年四季,不避烈日严寒,背上自己心爱的小孙子,无偿地为生产队放牧,历尽艰难险阻,受尽冷言恶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时被批斗,肆意罗织罪名,横遭诬陷。可是,面对她的往往是未经世事的孩子,还有不少牧民子弟,使她有理无法讲、有冤无处申。她冷静地对待事态,不管什么场合、什么方式的指责,她都以长辈姿态、豁达胸怀、雄辩口才应付,往往使“红卫兵”哑口无言,或引起哄堂大笑,使批斗会不了了之。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女强人。

平反昭雪后,尕尔昂曾荣任自治县政协委员。那时她已84岁高龄,精力仍然充沛,被称作“84岁的委员”。

尕尔昂是一位著名歌手。她走遍裕固族各部落,把她优美动听的裕固族民歌传遍肃南草原。她又是裕固族特有的史诗《沙特》的最后一位传唱者。她每到一处,有两件大事:一是引吭高歌,用歌声激励人民,净化人们的心灵;二是说唱《沙特》,颂扬裕固族人民不屈的历史。至上世纪80年代,她已到了耄耋之年,她遍游肃南山川,走访裕固族人民,像一位颇有道行的僧人那样,在云游群山草原的途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贯布什嘉任大头目40多年,全力守卫裕固族草山,维护裕固族的民族利益和尊严,至今裕固族人民仍十分怀念。

民■年间,马步芳军队的叶团长率领部队,来

到裕固族草山的胡司台、八字墩办牧场,占去大片草山,使这里的裕固族牧民无地立足,难以生存。贯布什嘉决心为保卫裕固族草山而奋斗。经详细筹划,认为只有面见马步芳,打通马步芳这个关节,才能阻止叶团长抢占草山。于是,他派聪明能干的辅帮扎华带领一帮人,都穿上破破烂烂的衣服,带上800元银元,去西宁求见马步芳。扎华一行在西宁打通各个环节,终于见到马步芳,呈上800元银元的见面礼,陈述了叶团长办牧场后裕固族群众流浪乞讨的困境。言明长此以往,必然有人铤而走险。请求以稳定甘青大局为重,让叶团长停办牧场。一个多月后,叶团长停止办牧场,马牛羊全部撤回,草山重归裕固族手中。

韩起功驻军张掖时,强令康乐地区的裕固族各部落把“官毛官皮”送交张掖沿河墩,并派一名副官验收。大头目通知各部落按时按量交纳,并派辅帮牙勒格前去监交。由于路途遥远,运输工具只有牦牛,有的部落没有按时赶到。副官竟把辅帮牙勒格打伤,三天不能行动。牙勒格是代表大头目前去监交的,打伤牙勒格,等于打伤了大头目,打伤了裕固族人民。大头目立即赶到张掖,面见韩起功,据理力争,要求惩办打人凶手。韩起功自知理亏,不得不答应免去未交齐的“官毛官皮”,惩办副官。

1939年,临泽县县长章金泂以历史上管辖东部裕固族的梨园营都司裁撤后,各族户籍案卷“移本县保管”为由,带领一帮人来到祁连山中视察慰问,企图将裕固族置于临泽县管辖之下。甘青分省,已使裕固族分属两省,在甘肃省者,已有酒泉、高台、张掖先行一步,各代管一部分。混乱的统属关系,不仅迫使裕固族日趋分离,也给裕固族增加了赋税负担。临泽县的举动,既不报请省府批准,也不同先行代管的各县协商,自作主张,明知行不通,只是想借故收取赋税,必然要遭到大头目的拒绝。当章县长带着慰问品来到康隆寺时,大头目和各部落头目“或途远而未到,或怀疑而隐避,或藉故而他往,或畏某种势力深藏不出”,至第三日,才有几个部落副头目出面应付,章县长不得不草草收场。

1941年,临泽县又派一名科长为县长代表,前来督办,仍无结果。章县长又编制《整理南山番地计划》,收录于1943年刊印的《创兴临泽县志》中,企图既成事实。

章县长文韬未果,就想动武。他带领县衙役,突然来到大头目家中,使大头目未及躲避。他向大头目宣布:从即日起,康乐各部落归临泽县管辖。大头目只好用缓兵之计,说:“这是一件大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召集各部落头目会议,一起商量决定。”章县长把大头目“请”到康隆寺,令他通知各部落头目到罗儿家部落所在的转轮寺议事。

通知送到各部落,临泽县长“请”走大头目的消息也传到各部落。裕固族人民非常气愤,一些有胆有识的部落头目,共同议定了营救大头目的计划。当各部落正副头目如约前往转轮寺时,裕固族牧民从四面八方转轮寺合围而来。亚拉格部落和五个家部落头目领着几个牧民首先来到转轮寺前,要求先见大头目本人禀报事宜后,方能议事。章县长仗仗县衙役荷枪实弹,威风无比,允许大头目面听禀报,而无防范。当大头目来到两头目跟前时,跟随的牧民很快把大头目扶上早已准备好的快马,前呼后拥,一起向海亚沟飞驰而去。临泽县长的计划再次破灭。

贯布什嘉任大头目期间,正值我国历史大转折时期,严峻的历史现实使他面临新的选择,他的使命是光荣而艰难的。

贯布什嘉一生经历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晚清、民国和新中国时期,两次顺利度过新旧时代的变迁。他生于清末,继位于清朝和民国交替之际。那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年的封建帝制,却未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虽然辛亥革命未在西北引起大的动乱,似乎对贯布什嘉的影响不大。但是,因为他是清朝政府的世袭官员,手中仍然拿着清朝政府的文照,民国政府是把他当作前清的遗老遗少加以革除,还是因循旧制,承认他的社会地位?这也是摆在他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对他的政治态度和应变能力的考验。1915年(民国四年),贯布什嘉换取了民国政府的文照。照文称:“照得提属

所管梨园堡地方住牧黄番总头目贯布什嘉……将原领前清康熙年间住牧插帐地方执照一纸，禀请更换民国执照前来。查民国肇事，百废更新，自应如请更换执照，以资约束。”结尾是：“右照给黄番总头目贯布什嘉等，执此。”照文中的“黄番”指今裕固族。照文清楚地说明，民国政府因循前清旧制，承认贯布什嘉的社会地位。照文中的“黄番总头目”同前清的“七族黄番总管”是一致的。照文在贯布什嘉名后，还列有各部落正副头目名号，说明民国政府在承认贯布什嘉的同时，也承认裕固族各部落及其正副头目的社会地位。贯布什嘉带领裕固族民众稳定地度过了两朝更迭时期。

1949年，中国大地又面临划时代时期。这一次，贯布什嘉非常主动，他身穿前清官服，头戴前清官帽，远行河西走廊中部，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觉、主动地步入新中国。

贯布什嘉两次顺利度过新旧时代的交替，为裕固族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

清朝授封的世袭头目虽然在裕固族历史上发挥过很大作用，但是，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制度迟早要被历史淘汰。民国政府虽然为贯布什嘉换发了文照，但是，以他为首的头目世袭制度已失去昔日的光彩，日益衰落。至1925年，宗教界公开干预头目世袭制度，以贯布什嘉“体弱多病”为由，指令康隆寺活佛爱罗代行大头目职务。1937年，东八格家的世袭头目尚谢什嘉被甘州驻军革职，头目无定人。贺朗格家副头目无人承袭，由民众推选。头目世袭制度已走到历史的尽头。怎样合理地结束在本民族发展史上颇具影响的世袭制度的历史，能不能避免武力冲突、行政取缔等强制手段，以和平方式为延续200多年的头目世袭制度画上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圆满结束裕固族头目世袭制度的历史创造了条件，贯布什嘉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正确选择和在新中国初期的不懈努力，为圆满结束头目世袭制度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于1954年荣任肃南裕固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由世袭大头目转变为民众公选的主席，标志着头目世袭制度的圆满结束。

1949年秋季，贯布什嘉热情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开始了迎接裕固族光辉未来的新征程。

那时，秋高气爽，秋季牧场已到高山深沟之中。他不辞辛劳，奔走各地，向裕固族人民传递和平解放信息，动员裕固族人民生产自救，建设家园。

他非常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同各部落头目商量，请求在裕固族聚居区建立民族自治区。甘肃省人民政府根据本民族人民的请求，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在祁连山北麓建立裕固族自治区，由酒泉专署承办。贯布什嘉亲自迎来了酒泉驻裕固族地区的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肃南县委前身），具体办理筹建事宜。

在筹建裕固族自治区的过程中，贯布什嘉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威望，不断加强本民族内部的团结。他采取各种措施，同当时还分属各县的裕固族各部落头目增强联系、互通信息、密切协作。他还同当地其他各民族相互联系，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1953年，贯布什嘉代表裕固族人民出席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行政委员会在兰州召开的甘、青、新三省边境各族代表人士会议，共同达成了《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安置边境哈萨克族的协议意见》，并且代表裕固族人民在《协议意见》上签了字。这对甘、青、新三省边境的社会治安稳定和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生产日益恢复和发展，为自治区的筹建奠定了基础。1953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召开了祁连山北麓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选举成立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贯布什嘉被推选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1954年6月，经过一年的辛勤筹备，由他主持召开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他被选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这是裕固族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事，揭开了裕固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篇章。贯布什嘉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将成为千古传颂的佳话。

1956年和1958年，他主持召开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均被选为县长。从他出任自治区筹委会主任至1958年，领

导全县工作约6年,如果从他1949年迎接解放军、开始新的征程算起,他在新中国生活、工作、奋斗了约9年。

这9年期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从无到有,发展壮大,乡村基层组织和自治县权力机构日趋完善。畜牧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十分迅速,1949年,全县只有8万多头(只)牲畜,至1958年,已发展到36万多头(只),增加了4倍多。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千百年来的个体牧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康庄大道。地方工业、交通邮电、民族贸易、财政金融、文教卫生等事业也已起步,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所有这一切,贯布什嘉作为自治县县长、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功在千秋,不可磨灭。

1958年,新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特殊年代,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面临重大灾难。根据党中央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反封建斗争的有关政策,贯布什嘉是有影响的上层人士,明文规定要保护过关,

并已通知到基层组织。但当地又发动群众大批大揭,矛盾直指贯布什嘉。这种特殊的政治气氛,贯布什嘉是难以承受的。

贯布什嘉与世长辞了。裕固族人民痛失一位卓有历史功勋的带头人,在自治县建设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好县长。

时至今日,裕固族人民仍然十分怀念贯布什嘉,以不同的方式虔诚地为其祈祷。近几十年来,面对自治县的每一重大成就、肃南草原的每一重大变化,裕固族人民在庆贺之余,总觉得在每一重大成就和变化之中,渗透了贯布什嘉的心血,寄托了贯布什嘉的向往。裕固族人民愿以最新的建设成就告慰英灵。

贯布什嘉的一生,显示了裕固族由衰落走向复兴的里程。他的理想与追求,正在激励裕固族人民创造未来的光辉前景。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轰动陇东边区的盗钱案

赵田广

民国30年(1941年)8月,在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庆阳县发生了一起800万元赈灾款被盗恶性案件。此案后来轰动了边区,一是其案件情节跌宕怪异,二是其破获手法高明,系来自于延安,被誉为谍报界、保卫界“侦察三杰”之一的布鲁所破,三是此案不仅引出了一起所谓的国民党特务案,而且还引出了一起“民告官”案件,庆阳县县长因“民告官”案而被给予严厉行政处分。

民国30年夏,庆阳县发生了严重旱灾,县政府及时向市、区、乡受灾灾民调拨了救济款。8月16日,县人民政府民政科科长李廉臣携800万赈灾款前往其家乡所在地的高迎区指导救灾。当晚,李科长留宿于高迎区合作社,并与区行政公署李秘书、区合作社王主任下榻于同一孔窑洞。次日晨,王主任因上班最先离开窑洞。随后,李科长上了一趟厕所后返回又睡,但当其醒后发现其压在枕头下的800万赈灾巨款竟不翼而飞,而此时与其昨夜同睡的李秘书不见了踪影。

因巨款是在合作社专门留宿上级干部的窑洞中丢的,王主任闻讯后自觉脱不了干系,到区公署找见李秘书后一同寻找。因李科长说其上厕所前钱还在,而上完厕所后钱就不见了,那么李科长是不是记忆有误而把钱丢在了厕所里?二人直奔厕所后果然在一处隐蔽的地方找到了巨款,但清点核对时却发现少了200万元。王主任和李秘书此时觉得李科长不是丢钱,而是有意藏钱并嫁祸于他俩,遂直奔合作社附近的李科长家中。碰巧此时李科长不在家中,二人便对李科长弟弟诳语:“你哥刚才给你的那200万元钱是公家的救济款,他现在派我们过来取。”李科长的弟弟不知是计,痛快地交出了200万元钱。

按理,800万元赈灾款悉数追回,王主任和李秘书的嫌疑被排除,但二人还是气愤难平,认为县上下来的干部李科长实在太坏,不能因找回了本属于高迎区的赈灾款就便宜了李科长,两人遂不

但不将找到的和追回的赈灾款说出,而且提出应由李科长个人赔偿那800万元赈灾款。

可民政科长李廉臣却不是个好惹的主儿。他很快便去高迎区公署报案,言明其弟交给李秘书的200万元款项,实是其亲戚托他购买大烟土的款。区公署领导听了李科长的话感到难以决断,便将盗钱案上报。县长认为所盗款项数目十分巨大,且属灾民急需的赈灾款,于是指定县保安科从速侦办。

依法传唤了李科长、李秘书、王主任,因三人各执一词,又无其他旁证,县保安科一时也难以断明谁是盗贼,只好将李科长和李秘书同时收押。其实收押二人还有另外的原因:李科长是县政府留用的原国民党庆阳县政府人员,过去有狐假虎威欺压百姓的前科,其留用后又仗其共产党县府人员身份,在一次高迎区公署赴其家催收拖欠公粮时,对李秘书进行谩骂,现在的丢钱案有可能是其贼喊捉贼,并打击报复于李秘书。而李秘书呢,是一个好抽大烟的主儿,50多岁了还没讨上老婆,只因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粗通些会计账目,才被聘为了高迎区的秘书,一个抽大烟的老光棍自然会被人怀疑盗巨款是为了买大烟抽。

县保安科将二李关押在了同一孔窑洞的耳窑里,且两只耳窑均与主窑相通。由于二李在关押中寂寞难耐,曾经的仇人变成了棋友。李秘书年纪大,抽不到大烟就犯困,李科长便殷勤地打水侍候。但后来过了一个时期,出现了新情况:有一天县政府的罗副县长找到了县保安科科长李甫山,拿出了一封皱巴巴的烧焦了的信件。当李甫山摊开信件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此信的收件人是兴隆兄!而“兴隆兄”恰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驻平凉的头目!密信由于被烧过,其残件只能略微看到:“关于……的事……吃紧……保守秘密……我一定办……务必等待……切勿……”。

这封与国民党特务联络的密信虽未落款,但

罗副县长却咬定这是关押中的李秘书的笔迹。原本一起特大并恶性的刑事盗窃案件，现在陡然间上升为了性质更为严重的国民党特务案件。但这封信从何而来，又为何烧成了这般模样，罗副县长说信是李科长从监狱托人带给他的。

李甫山亲自提审李科长。李科长交代一次与李秘书下棋时，见李秘书慌张地将一张纸揉成团后扔进了炕洞，便疑心李秘书有什么事瞒着自己，于是趁李秘书上厕所之机，从炕洞内将信盗了出来，但此时的信已被柴禾烧得面目不全。接着又提审李秘书，李秘书虽承认信是自己所写，但为何要写这样一封信，又为何这封信成了烧焦的模样，李秘书张口结舌地说不出个所以然。

鉴于李秘书承认此信为其所书，县保安科认定李秘书实乃藏身于区公署的一个国民党特务，加之李秘书关押期间坦白上交了匿藏的800万元赈灾款，便认定了盗钱案系李秘书一人所为。保安科将材料上报后，县长批准了对国民党特务李秘书的逮捕，被认定无辜的李科长则无罪释放。

李科长被释放后，引来了一些人的议论。了解李秘书为人的人这样说，李秘书虽抽大烟却天生胆儿小，乡邻多年来从未听说其偷过人，况且800万元赈灾款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懦弱的李秘书借上贼人的胆也不敢去偷。而了解李科长与罗副县长是连襟兄弟关系后，有的人就这样说，官向官，民向民，乌龟对着王八亲！现时的共产党还不是跟赶到西峰镇的国民党县政府一个样儿，凡官家都会袒护他的坏亲戚的。

县政府一名叫杜承先的干部对此丢钱案也有不同看法，但其意见并未得到重视和认可，在听说庆城来了延安的巡视组后，其即赴鹅池洞的陕甘宁边区保卫处驻庆城外勤科，向巡视组反映问题。

边保巡视组组长布鲁接待了这位具正义感的干部。

听取了杜承先提供的情况及交谈了看法后，布鲁也感到当初的丢钱案和其后带出的国民党特务案确实有些诡异蹊跷，遂决定边保巡视组与边保外勤组共同复查“8·16”丢钱案，原办案单位陇东保安分处、庆阳县保安科回避。

案情分析会上，侦察员看法各异。有的觉得钱一定是李秘书所盗，其理由是假若李科长监守自盗，为何不把钱全部交给其弟，而要在厕所留下600万元？而钱丢后李秘书和王主任反又能在厕所轻易找到600万元，过程顺利得就像事先排练好的一样。况且李科长其弟交出的200万元，现在已有书证确系其亲戚托李科长购买烟土的钱。至于李秘书承认那封信是自己所写，却又不说出事实真相，恰说明了李秘书的奸诈狡猾，同时也印证了其确系破坏边区抗旱，隐藏在共产党队伍中的，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特务。

20岁出头的边保驻庆城外勤组组长葛申的看法与众不同：既然厕所找出的600万元赈灾款与李科长其弟交出的200万元票号相连，就说明这两笔必是从银行一次性提取，从而反证出李科长亲戚200万元钱托其购买烟土的话为假。至于李科长为何把所盗的钱分为两部分，盖因“8·16”案发生在盛夏，人们当时衣着较薄，800万元钱鼓鼓囊囊地带在身上，难免不被他人发现，于是就把大部分钱藏在厕所将来再取，而把少量的200万元钱带回了家中。

但对本案带出的这起国民党特务案件，特别是案中那封原本发给国民党特务头目的信件，侦察员们却一直理不出头绪，写信人既然承认笔迹是自己的，却为何对信的来龙去脉不作交代，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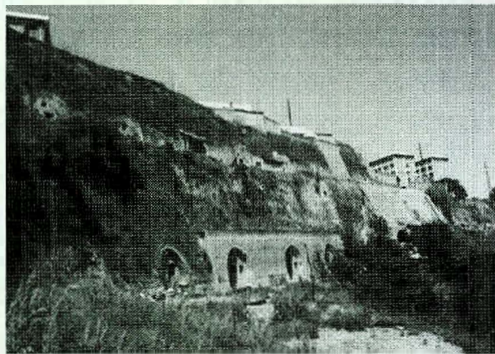
布鲁也在反复地冥思特务案中的这个关键证物，后来有一天他终于恍然大悟，就和巡视组女侦察员吕璜做了一个实验：把一张写有文字的纸张揉成团儿扔进火盆，发现凡烧透的地方均是圆洞，而没有烧透的地方，也就是烧焦的地方全是焦棱角，而那封密信的焦处一律是圆洞。但一个新问题摆在了布鲁面前：李科长大字不识一个，不可能具备这种匪夷所思的手段，那么又是谁在这封密信上做了手脚呢？

布鲁想到了一个人，庆阳县政府的罗副县长。罗副县长和他的连襟兄弟李科长一样，也是留用的原国民党庆阳县政府人员，在最近一个月的工作接触中，布鲁感觉此人相当狡猾，是一个不看见

事实不低头的狼角儿。

巡视组手头恰有一封罗副县长的信件：“布鲁同志，关于发现密信的经过情况，已经写出，请你审阅。是否面谈，请约定时间，再与您联系。”用烟头烧掉了抬头与落款，及中间的一些文字后，信的内容变为：“……关于……情况……请你审阅……面谈……约定时间……再联系……”，也像一封写给国民党特务的密信。

布鲁邀请罗副县长到鹅池洞面谈工作。当布鲁拿起桌上那封经过加工的信请其阅读时，罗副县长的脸色顿时大变，用火盆里的火筷子给其点烟时，罗颤抖的双手怎么也对不上火，布鲁遂戏谑地对罗副县长一笑：“如果抬头换上国民党负责人的名字，是不是就是我在用你的亲笔信陷害你呢？”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外勤组、陇东分区保安处
办公旧址庆阳县鹅池洞



被陕甘宁边区谍报界、保卫界“侦察三杰”的布鲁

罗副县长听了布鲁的话，吓得赶紧跪地磕头求饶，坦承国民党特务案中的那封密信的确经过了加工，并检举赈灾款不是李秘书所盗，而是其连襟兄弟李科长所为。

边保巡视组和边保外勤组再次提审李科长，

在揭露出的确凿证据面前，李科长终于坦承自己偷了800万元赈灾款，至于为何炮制所谓国民党特务的密信，是听信了连襟兄弟的计策。

原来，为了使李秘书盗钱的事儿坐实，早日解除自己的关押，李科长问计于前来探监的罗副县长，其连襟兄弟便饶有深意地讲了老戏《蒋干盗书》，于是李科长便用与李秘书同处一窑的便利，借口托其购买大烟土的一位叫兴隆的亲戚回信求其代写，因大烟在边区属于禁种禁吸禁贩的违禁品，于是便嘱李秘书在信中写上“保守秘密”的字样。而后根据《蒋干盗书》中的伎俩，用烟头烧掉信上的落款和其中一些字词，于是一封给国民党特务的联络信便炮制完成。罗副县长在收到李科长从监狱传出的信后，自以为得意便交给了县保安科，以为李科长这下便能很快出狱。

被重新收监的李科长和新收进法网的罗副县长很快就被批准逮捕，县保安科从速做出了判决并以县人民法院的名义公布：李科长盗窃属实，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但对于诬告李秘书的国民党特务破坏抗旱案，则“查无实证，不予追究”。

但“8·16”丢钱案并没有结束，李秘书虽在关押数月后县上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被宣布平反，但洗清冤屈的他在释放后的第三月中突然病故。李秘书的突然病故使居于县城东河湾的其兄不能接受，极为震怒的兄长认为其弟的病故显与盗窃罪犯李廉臣、特别是其诬告其弟是国民党特务有关，故以“8·16”案件判处不公上诉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设在延安的高等法院在接到上诉状后，很快重新进行了审理，其结果除维持盗窃案中原审判处李廉臣两年有期徒刑外，又以伪证罪加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两年十个月。但判决书下发后李秘书的兄长还是不服，要求边区高等法院再审。

边区高等法院对李秘书兄长二次上诉的理由十分重视，在后来的“8·16”丢钱案的再审中纠正了二审认定的李廉臣所犯的伪证罪案。审判委员会在终审的法律文书上这样表述了前后这两起案件：就法理而言，被上诉人李廉臣诬告被害人与反共分子有关，意在转移审判之目标，藉（转56页）

拯救独臂红军战士刘嘉伟

营救西路军战士之一

银开源

“救——命——嗷，救命……”

……

这是一九三七年深冬(一月)一个冰天雪地滴水成冰的寂静的朗夜，空气中还夹杂着血腥的味道，恐怖还笼罩着高台县城和吴家场院每一个人的心头，听到这样的呻吟声，谁敢出声，人们都知道蜷缩在炕上，用被子捂住头颅，心在打鼓、在蹦跳，谁都知道这个喊救命的人是肯定是红军的伤员。白天马家军来过了，叽里呱啦撂下一句话：“啊格(谁)看到赤匪不报的话，就枪毙啊格。”“抓住一个赤匪，奖励一个大洋。”

离城三里，有一个银家屯庄，银家屯庄在当地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庄子，这一姓人家在道光年间从酒泉迁之高台县，一门子三十多口子人，有一半为官一半为商，过着自收自支的生活，因为为官正直、为人厚道，行医有德，经商童叟无欺，所以在当地也算作名门望族了，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三更半夜传来这样的凄惨声，搅得附近每一个人都心惊肉跳睡不着。作为银氏家族的老大，又是医生的银得寿老先生，他感觉到，这声音就在自己的屯庄附近，实在不忍心就悄悄地爬起来，穿好衣服，溜出上房屋，顺着声音找了过去。来到庄子的北墙根借着月色一看，是一个穿着破烂的叫化子模样的人，一只手抱着右肩膀，左面的肩靠着墙根，已经迷迷糊糊快不行了。走到近前一看是一个没有了右臂的红军战士，这一看不要紧，吓得他倒推了五六步，马家军搜查得这么紧，他是怎么躲过去搜查的？他又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呢？怎么办，是救还是不救，不救他很快就会被冻死，救很有可能就会给自己一家带来杀身之祸。这么大的事情，需要和家人商量一下，于是他就悄悄地退回了家里。

黑灯瞎火里，银得贵老先生猫手猫脚地叫出了睡在厢房里的弟弟银得钱，银得贵两人，把自己刚才看到的情形说了一遍，然后试探着问：“怎办？是救还是不救？”银得贵是县衙里的稿宗，银得钱是粮食局的局长，他们一直在官场上混饭，深知此举的重要性，经过一番的利弊分析，最后然人决定“救”——“只就三人知道，不告诉任何人。”“马家军万一知道了，就说是他是找来

看病的，我们是医生不能见死不救，就收下了。我们不知道他是红军，别的什么也不说了。”“我们信佛的不就是信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

于是三人悄悄摸到北墙根下，将那个受伤的人抬到了上房屋里的菜窖里，安顿好后，换衣服的换衣服，烧水的烧水，煎药的煎药，擦洗的擦洗，包扎的包扎，……一个时辰以后，一切就绪，他们三人才惴惴不安地睡去了。

马家军虽然天天来搜查、询问，但这件事似乎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天衣无缝，七天过去了，竟然没有一点儿暴露消息的迹象，银得寿甚是欣慰。就是有一点，这个伤员说话叽里呱啦地太快，一句也听不懂。不过几天下来，他慢慢地知道了一些这个被救人的情况：这个小伙子名叫刘嘉伟，十五岁，四川广源人。十九日晚，在拼杀时，被马家军的骑兵砍掉了右臂，二十日早晨战斗结束时，他还在深度昏迷，不省人事，他被当作死人被背出城来撂在了乱葬坟，冻醒以后，他们没敢动弹，坚持到深夜，马家军站岗的打盹时才连跌带爬地到了这里，由于太饿，没喊上几声就昏死过去了。

经过银氏三兄弟的精心照料，十五岁的刘嘉伟伤势好多了，能自己吃喝走动了。到了第十九天，银得贵决定送走这位红军战士。要不他怕夜长梦多。

四月九日半夜，银得寿准备好馍馍，盘缠，套上大轱辘牛车，拉上刘嘉伟一直把他送到了南沙窝，安全了，才看着他一拐一瘸地走了。为了掩人耳目，他拉了一车沙回家来。

【作者注：解放前，三位老人相继去世，这件事只有银得贵的儿子银珏知道，银珏又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作为他们的后人，今天把它写出来，公布于众，权算作对先人的怀念。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人证或物据(刘嘉伟不识字，没有留下字据。)能证明这件事，再加上我家成分高，更不知道那位红军战士刘嘉伟后来怎么样了，一直没有他的点滴消息，所以父亲一直也没有敢向政府提起过。】

(作者单位：高台县南华镇中心小学)

假如没有中国的抗日战争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车安宁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们有时为了说明一些问题和历史现象，不妨假设一下，并按照假设的思路去进行推演和判断，以说清楚一些道理。

为什么要假设没有中国的抗日战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真实存在过的，并且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取得最后胜利的。但是，在纪念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一些西方“学者”仍然坚持自己多年的偏执观点，幼稚地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无足轻重，甚至可有可无，是美苏的力量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他们看来，中国只是一个受害国，对打败日本军队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因而在最终胜利时，中国的国土反而又一次被人侵蚀、分裂。直到今天钓鱼岛都还被小日本纠缠着。

本来我们不愿意提及这些过去的历史。但为了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的重要性，也为了厘清事实，分明是非，伸张正义，那么我们就不妨假设一番。

假如没有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种假设我们可以分别以以下三种情形进行推演。

第一种情形，假设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实力强大，日本帝国主义不敢贸然入侵中国。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盘踞地域狭小的日本，不会满足现状，发动侵略战争是它野兽的本性。于是，它必然会向东南亚诸小国悍然动兵，这当然就会损害到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利益。如果中国不参战，至少在缅甸的那些被日军包围的英军是回不到老家了。而日本人欲霸占东南亚及周边地区的野心会更大。同时，日本海军还要展示它的强大，偷袭珍珠港的行动也不会改变。其后，由于日本军队没有了在中国战场的牵制和消耗，它一定会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去和美军交战。也许最终美国还是会战胜日本，但所付出的代价将会大得

多。

美国或许不在乎财力和物力的损失，但是，青壮年士兵的生命和健康损失却是受不了的。如果这样，二战以后，美国国内的劳动力就会大大缺乏。同时，美国民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将数倍于今天。

当我们今天在回顾中国的抗日战争时，许多人都会感激当年美国为我们提供的“无私”的军事物资的援助。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此之前，当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和爆发初期，美英等国不仅不援助中国，还给日本卖出大量的石油、橡胶、金属等战略物资和军火，包括飞机、坦克、汽车等。不仅是隔岸观火，并且还发战争财。哪里有什么正义和“无私”可言！

其目的无非是既发战争财，又让中日开战相互消耗。只是由于后来感到日本帝国主义胃口越来越大，又怕日本占领中国后继续“做大做强”，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才有了1939年2月和1940年3月，美方对中国的2500万和2000万美元的两笔贷款，并且是中国以出售桐油与锡矿作抵押的，史称“桐油贷款”和“滇锡贷款”。之后，在中国方面的积极要求下，美方又给予信用借款一亿元，其中包括5000万美元金属借款和5000万美元平准基金借款。这些贷款是有条件的，一是有商业利益的抵押，二是美国害怕疏远日本，特别禁止中国人使用这些借款购买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

从1940年开始，西方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的蔓延于己不利，对华援助逐步增长。美国允诺的贷款1940年为4500万美元，1941年前期为1亿美元。1941年后期，美国按照新近的租借法案条款，开始向中国发送军械和其他物资。但这也是在宋美龄对美国总统一的提示警醒下进行的。当时，蒋介石

政府为了争取美国的援助,在私下里与日本方面进行了多次半真半假的媾和谈判,并有意把这一消息透露给美国方面。美国人当然也害怕蒋介石政权不抵抗而直接投降日本,于是便有了上述的援助。但是同时,美日间的“军火贸易”依然在进行。可见,当时美国的策略是既想卖军火发战争财,又希望中日战争继续打下去。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同日本正式交战。这时候当然是多消灭一个日本兵就多一分胜利,于是国力强大的美国人便“慷慨”起来,不断地给予中国各种物资援助,其目的就是让中国成为牵制和消耗日本的战场,让中国人拿着美国的枪炮去和日本人拼命。事实上,中国的抗战也正是以自己巨大的牺牲牵制和消耗了日本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为二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奠定了日本帝国主义必然战败的基础。

网上传有美国的兰德公司有一份报告认为,如果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中国就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打败日本,那样美国就不会卷入冲突,和花费很多,珍珠港事件也就不会发生。

这真是一番不合逻辑的屁话!首先,20世纪初的中国为什么不富裕和统一?这与包括美国参与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有无关系?如果美国当初指望中国能够单独打败日本,那你一直给日本卖军火物资又是为什么?这就是一方面给强盗提供杀人凶器,另一方面又希望被强盗侵犯的人能够打倒强盗。不使强盗再来侵犯自己。这算什么逻辑?

实际上,美国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是纵容日本的,只是后来日本这只狼不知满足,又咬了纵容它的人。

由此看来,没有中国的抗日战争,日本就无必要买那么多的美国军火。美国要想战胜日本也是极为困难的,也许等不到美国的原子弹研制成功,就已经被日本打垮了,甚至被日本打到美国的本土去,那样的话,美国人可就惨了,也就不会嘲笑中国人的软弱了。

第二种情形,假设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

9.18侵占了中国东北后,不敢再进犯中国华北等地。甚至与中国当时的政府达成了某种协议,互不动武。这时的日军屯兵百万在苏联边境上,肯定对苏造成巨大威慑压力。当苏联在西边受到德军入侵,疲于应战,莫斯科面对兵临城下的危难时,日军随时都可以趁火打劫向苏联的远东地区发动战争,因为那里地广人稀,更容易占领。斯大林岂不是面临两难?如果不从远东分兵支援莫斯科,那么莫斯科战役的结果会是怎样,还很难说。如果苏联战败,那么世界历史必将重写。

这也是在中国抗战初期,苏联为什么会“慷慨”支援中国军队飞机大炮的原因,包括早先就开始的对东北抗联的支持。无非也是想让中国拖住日本,以保全自己。这种“国际主义”其实并非是无私的,而是有着自己的国家战略利益。只是后来因为日本这只自不量力的蠢兽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苏联看到远东边境没有了压力,又疲于应对德国的入侵,同时美国也不得不援助中国,故不再提供对中国的援助。

第三种情形,假设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国民政府力不从心,不抵抗,打着“为保国民生命安全”的幌子立即投降了日本。其结果会如何呢?可以想象,中国有辽阔的国土和无尽的资源,有当时世界上最巨量的人口,如果都被日本所用,几百上千万军队全部变成“皇协军”,并受到“武士道”训练和洗脑。那么,以日本军阀的做派,一定会向西进攻苏联,向南发动太平洋战争。如此一来,二战的结果会是个什么样呢?

当然,无论是哪一种假设情形,法西斯主义的邪恶最终会被人类正义文明的力量所消灭。但是,其二战的过程一定会不一样,人类文明所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更惨,拖延的时间可能更长。

在此我们还可以追加试问一句:如果中国的抗战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美英苏等大国对中国的援助也就毫无意义,当年白花那么多钱扔在中国干什么?

写到这里,你还会觉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吗?

(作者单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省志办组织书画家赴甘谷县大庄乡杨家坡村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

近日,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邀请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张翀(正厅级),甘肃阳明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兰州文化联谊会副会长王东升,兰州市安宁区物价局原局长、甘肃阳明书画院副秘书长刘庆祖一行秉承“传统文化进村庄”的理念,在省志办秘书处处长、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张正龙带领下,来到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双联帮扶村杨家坡村为村民赠送墨宝,开展省直机关基层党组织与贫困村党组织双联行动结对共建活动。吸引众多群众前来围观、索求字画。大庄乡党委书记张海平陪同。

群众得知书画家们要来村里赠送字画的消息后,一大早就等候在杨家坡村小学教室里。在现场,书画家们挥毫泼墨,为村民书写了“上善若水”、“知足常乐”、“厚德载物”、“天道酬勤”等书法35幅,包含隶书、行书、草书、篆书等,画了“腊梅图”、“对虾”、“寿山石”等水墨画12幅,受到了群众的广泛赞誉。此次活动的开展,拉近了党组织之间的相互了解,拉近了党组织同人民群众之间的感情,给广大群众办了一件实事、好事。同时,丰富了乡村文化活动的內容,传承和弘扬了传统文化的思想,对乡村文化活动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康乐县“三个一”全面填补地方志工作“三空白”

近年来,康乐县把全面提升地方志工作作为文化大县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大力度、创新举措,做到一年一稿、一鉴、一书,“三个一”全面填补二轮修志、年鉴编纂、丛书编写“三空白”。

一年一稿,填补二轮修志空白。2012年以来,该县按照打造全州精品志书的要求,县志办成立四个资料收集组,先后10多次收集、补充、核对各类资料。在《民族日报》、中国康乐网刊播补征资料通知,共收集图片350副、单位和人物资料118份及碑文、方言、传说、补遗等资料4万余字。主编结合实际,借鉴学习、摸索设制、五易其稿,设置了《康乐县志(1986—2005)》新篇目,并总纂通稿、文字改稿、电脑修改“一条龙式”全程工作,有力地推进了修志进度。先后对州志办提出的294条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完善。制定人志人物标准,并在康

乐县人民政府网发布。编写人员从统一语言表述、规范文字单位等细微之处入手,通力改稿、精雕细刻,仅用三年时间,将150万字的资料整理为120万字的初稿,将初稿第一稿压至90万字,第二稿压至51万字,将评审稿第一稿压至50.9万字。今年,已召开了《康乐县志(1986—2005)》评审会,完成《康乐县志(1986—2005)》评议稿,共17编、67章、278节,50.8万字,向省志办、州志办、各县市志办、全体县级领导及编委会成员发放;即将召开省州县三级评审会,二轮修志实现时间、质量大提速。

一年一鉴,填补年鉴编纂空白。按照打造全州高质量年鉴的标准,从2014年起启动《康乐年鉴(2013)》编纂工作,主编大胆创新、借鉴学习,制定篇目、精心编纂。组成6个资料收集组,采取上门

督促与帮助编写相结合的办法,收集 160 个单位资料 90 万字、图片 280 幅。所有资料由主任修改把关后,将电子邮箱发送各乡镇、各单位补充审定。然后,由编辑进行改稿,再由主任逐字逐句修改,完成 41 万字的首部高质量《康乐年鉴(2013)》编纂任务,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上海大雅文化艺术公司印刷。今年,按照编纂积累经验,再次大胆创新,完成 44.2 万字的《康乐年鉴(2014)》,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发放到省志办、州志办、全体县级领导及各乡镇、县直单位,年鉴编纂

实现保质保量大创新。

一年一书,填补丛书编写空白。按照打造多形式丛书的目标,主任利用五个月时间,精心编写、通力组稿,出版共 16 万字的首部《康乐县地情丛书——新闻辑录》。今年,按照上年编纂经验,再次精心编写,完成第二部《康乐县地情丛书——文苑花絮》,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发放到省志办、州志办、全体县级领导及有关单位,丛书编写实现从无到大转变。

首部《榆中年鉴》(2012—2014)出版发行

近日,榆中县人民政府主办、县地方志办公室承编的《榆中年鉴 2012—2014》卷,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该县第一部综合年鉴。榆中县从 2014 年 4 月启动了年鉴的编辑工作,全县 80 多个单位提供了资料,内容涵盖年度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是对

2012—2014 年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的概括性的记录。《年鉴》的编订对广泛宣传榆中县各乡镇、各部门的工作亮点和成就,扩大该县对外交流和招商引资,提高榆中县知名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康乐县志(1986—2005)》评议会召开

2015 年 11 月 12 日,《康乐县志(1986—2005)》评议会议召开,省志办县市指导处副处长陈谦,临夏州志办主任谭得胜、副主任马建军,县志编委会主任、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县志编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彩霞,县志编委会副主任、副县长张睿,临夏州各县(市)志办负责人及康乐县志编委会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

会上,康乐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马晓春汇

报了《康乐县志(1986—2005)》编纂情况,省志办县市指导处副处长陈谦,临夏州志办主任谭得胜分别作了指导讲话,各县(市)志办负责人发表了意见建议,县志编委会主任、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从加快速度、严格评审,彰显特色、打造精品,统筹安排三个方面,对地方志编纂工作作了严格的要求。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举办老干部座谈会喜迎九九重阳节

2015年10月21日，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机关党委、机关工会以举办茶话会、职工书画作品展的形式，组织机关离退休老干部和在职干部职工喜迎九九重阳节。

茶话会上，办党组书记、主任李虎首先向老干部通报了今年以来办机关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落实“两个责任”以及业务工作开展情况，并代表全体干部职工祝愿离退休老同志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福乐长寿！

退休干部、办原巡视员张克复、原副主任周云凝代表离退休老干部发了言，他们对单位近年来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认为在办党组的正确领导下，机关各项工作都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优异成绩。对老干部的日常管理、生活照顾、解决急需困难等方面都非常重视、非常关心，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希望今后继续保持下去。

退休干部、办原领导金庆礼、郝玉屏、王杰及办班子成员车安宁、李振宇、孙奇明，副巡视员李拾良参加了茶话会。

茶话会上，与会人员一边饶有兴趣地欣赏书画作品，一边热烈交谈。部分老干部即兴挥毫泼墨，创作了多幅书法作品。大家亲切交谈，打扑克、下象棋，气氛非常热烈，共同度过了一个美好愉快的重阳节。



张海平书法作品



张海平，男，1973年生于甘谷县，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甘谷县大庄镇党委书记。甘谷县书法家协会理事，天水市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考级中心培训学习，取得专业二级考级证书。

自幼酷爱书法，几十年来，一直将书法艺术作为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乐趣和业余爱好，不管工作任务多重，都挤时间，临池不辍，法古自化，坚持不懈地临习二王、赵孟、颜真卿、孙过庭、王羲之等历代大家名帖，在注重吸收古代大师营养的同时，师古而不拟古，不求其索怪，放纵于自然之妙，规矩矩写字，本本分分做人。

先后多次参加陕西省书协、天水市书协、甘谷县书协举办的书法作品展出活动并入选，2012年获甘肃省人口文化艺术节书法作品优秀奖。

